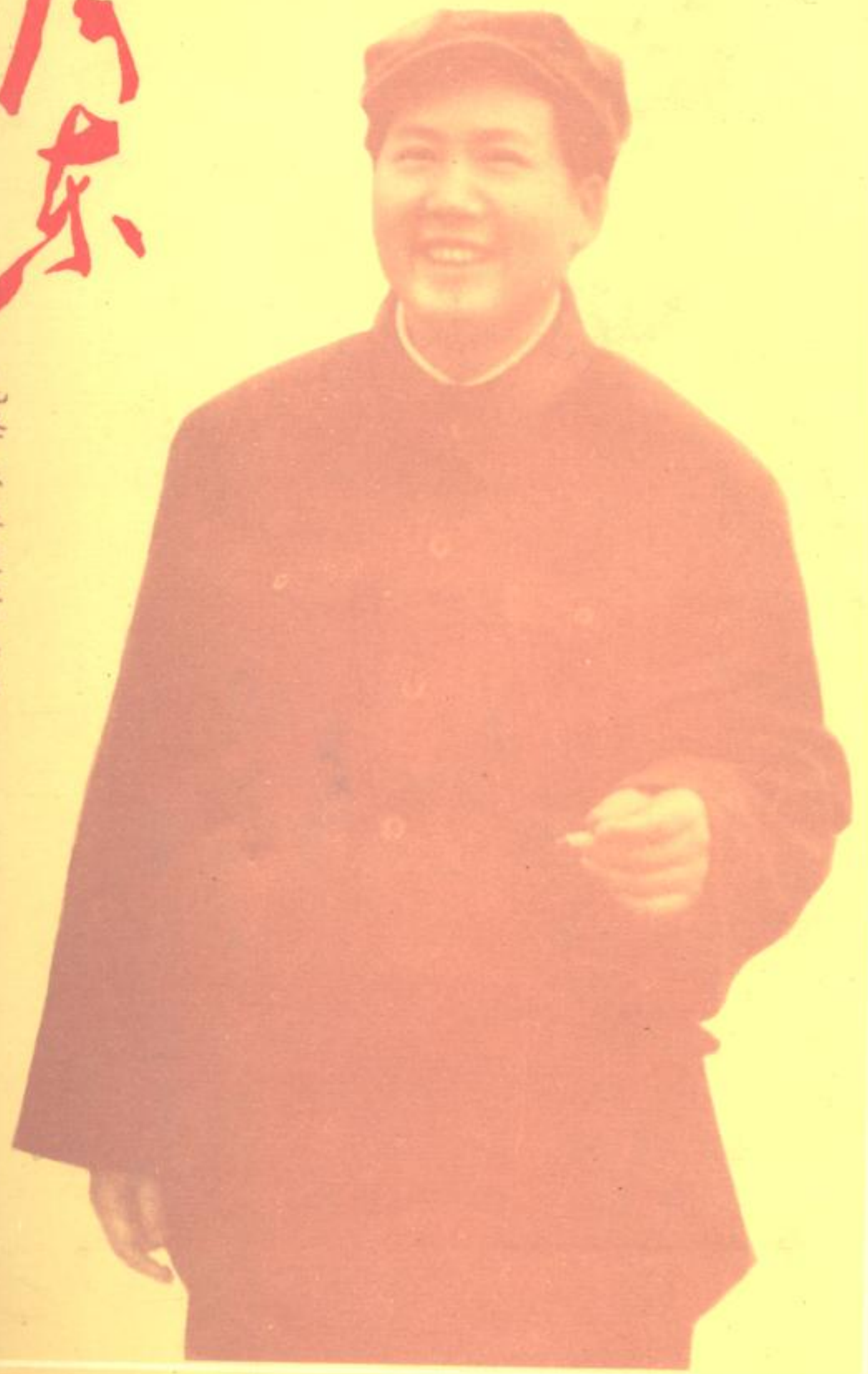
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

毛泽东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89343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

罗忠敏　崔　岩　主编
吴　木　　审定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

罗忠敏　崔　岩　主编

吴　木　审定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0印张　6插页　227千字

1993年12月第 1 版　1993年1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5073－4/G・4363

定　价：12.00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总　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

胜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 年 7 月 1 日

目　　录

第一编　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形成

第一章　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3）
一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3）
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1）
三　党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 ……（15）
第二章　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渊源 ……（22）
一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丰厚土壤 ……（22）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33）
第三章　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过程 ……（42）
一　延安精神的先声（1921—1928年） ……（42）
二　延安精神的雏形（1928—1935年） ……（44）
三　延安精神的形成（1935—1945年） ……（52）

第二编　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内容

第四章　共产主义精神 ……（63）
一　最高类型的爱国主义 ……（63）
二　共产主义理想是延安精神的革命灵魂 ……（71）

三　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造就一代共
产主义新人 …… (79)
第五章　实事求是 …… (84)
一　实事求是是历史经验的结晶 …… (84)
二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 …… (88)
三　实事求是在延安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 (91)
四　实事求是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概括…… (102)
第六章　密切联系群众…… (108)
一　群众路线的形成…… (108)
二　延安时期对群众路线的理论概括…… (113)
三　群众路线在延安时期的娴熟运用…… (123)
第七章　批评与自我批评…… (135)
一　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形成…… (135)
二　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延安时期的显著
特征…… (140)
三　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历史作用…… (151)
第八章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54)
一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
精神的根本内容…… (154)
二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历史
经验的总结…… (159)
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延安
时期的实践特征…… (162)
四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延安
时期的理论特色…… (169)

第九章　民主团结……（174）
一　民主团结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74）
二　民主团结在延安时期的体现……（178）
三　民主团结是党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189）

第三编　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实践

第十章　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延安精神的实践……（195）
一　毛泽东是实践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195）
二　周恩来对延安精神的实践……（202）
三　刘少奇对延安精神的实践……（208）
四　朱德对延安精神的实践……（213）
五　任弼时对延安精神的实践……（219）
第十一章　一代共产党人对延安精神的实践……（226）
一　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226）
二　平凡岗位上的劳动模范……（228）
三　廉洁奉公，艰苦奋斗……（231）
四　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233）

第四编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承发扬延安精神

第十二章　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239）
一　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和实践……（239）
二　延安精神的曲折发展，延安精神发展的典型形态……（245）
三　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中丰富了延安精神…… (253)
第十三章　延安精神的现实意义…… (259)
一　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
成果武装全党…… (259)
二　实事求是，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
建设道路…… (266)
三　结合新的现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271)
四　艰苦创业，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
克服消极腐败现象…… (281)
第十四章　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286)
一　时代呼唤着延安精神…… (286)
二　为弘扬延安精神鸣锣开道…… (291)
三　全部的工作在于教育和实践…… (300)

第一编

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形成

第一章　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烽火岁月中，培育和弘扬的一种革命精神。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一、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延安，地处我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在中华文明史上，它曾是炎黄子孙的始祖轩辕黄帝的生息之地。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它亦是革命发动较早的地区之一。但是，假若没有本世纪 30 年代那次至关重要的革命重心转移的话，它很可能至今只是我国西北的一个无名小镇。然而，历史毕竟在那场变动中，将中国革命的坐标指向它。

（一）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

193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中惨遭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被迫率领红军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目的，旨在彻底摆脱敌人的“围剿”，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但当时，在哪里落脚，到何处去重

建根据地，将主要取决于敌情的变化和敌我双方的军事较量。

按照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原定计划，红军突围后的行动方向是到湘西，与先行转移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红军的战略意图很快被蒋介石窥破。他迅速调集40万大军，几十架飞机，沿着红军的前进方向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由于红军巧妙地利用了敌人的内部矛盾，得以较顺利地通过前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湘西一战，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兵力折损过半，鲜血染红了湘江。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7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此时，蒋介石又已在湘西通道以北地区，集结了近20万兵力，以碉堡群为依托，摆好口袋形阵势，横刀立马，等待中央红军钻入。

面对这种形势，中央红军落脚湘西的战略意图事实上不可能实现。如果硬要坚持，就会招致灭顶之灾。

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于危难，毛泽东在被剥夺实权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中央军委，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此举打乱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置敌重兵于脑后，使红军得以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对此，刘伯承曾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刘伯承回忆录》第5页）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会议上，正式决定放弃原定"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计划，拟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436页）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

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会议在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时，刘伯承、聂荣臻提议，中央红军应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开创革命根据地。他们的理由是：“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们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加之，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48页）会议接受了刘伯承、聂荣臻“渡江北上”的建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拟定的以黔北为中心重建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为阻止中央红军渡江，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封锁长江。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避实就虚，四渡赤水出奇兵，于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中央红军又克服重重困难，斩关夺隘，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终于在四川懋功地区与已经退出川陕根据地，正向西转移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川西北地区的总兵力达10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增强。

此时，全国正处于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的前夜。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红军所处的战略地位，决定将红军的战略转移同北上抗日的大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迅速形

成指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打开革命的新局面。

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对中央确定的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阳奉阴违，处处作梗，顽固坚持其向川康边界退却的南下主张，甚至不顾党中央的多次劝告，企图以武力要挟中央。在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红一、二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连夜行军，先行北上。

9月17日，毛泽东等所率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上通道。于19日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在这里，中共中央意外地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余万人"，以及"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吴志渊著《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第97—98页）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虽然知道陕北、陕甘边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但在全国苏区损失达90%以上，连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等大块革命根据地都丧失殆尽的情况下，陕北、陕甘边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还存在不存在？详细情况如何？党中央是不清楚的。得知陕北革命根据地还在，红军还在，而且还有相当的规模，这个新情况，对中共中央做出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他代表党中央宣布，将所率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又称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下辖三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由林彪、彭德怀和叶剑英兼任。在报告中，毛泽东诙谐地说道："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

地！”（杨成武：《记长征》第226页）他铿锵有力地向红军指战员发出号召：“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肖锋：《长征日记》第121页）

两天后，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做出将红军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并初步提出了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任务。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的陕甘支队突破驻守六盘山的敌军最后防线，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紧接着，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密切协作，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一仗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完成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此，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的党和红军，终于找到了一块新的立足之地。尽管这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贫瘠而荒凉，但它却为身负民族解放重任的共产党人提供了一块实现其抵抗日本侵略者誓言的“绿洲”。延安也由于数万名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中坚的到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再生之地。

（二）民族解放战争的“出发点”

在红军到达陕北前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中日民族矛盾已急剧地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国难深重，使整个中华为之震动。

在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高擎起抗日救国的旗帜。

早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

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倡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呼吁各党派间、各界同胞间、各军队间，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党的《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处于华北前线的万名爱国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毅然奋起，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猖狂进攻，国内民族革命高潮的兴起，激烈地变动着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它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而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把握革命的领导权，争取最广大的同盟军，就必须对新的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并在政治策略上实现从国内阶级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本性转变。

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立足陕北后，立即于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等问题。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问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延安，由此确立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非同凡响的特殊地位。

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芦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揭开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御外侮，正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客观形势的发展，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获得了恢复与发展的机会，而且有可能通过合法的途径，突破地域的局限，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国革命的进程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这种形势下，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重要作用，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突出地显现出来。

首先，延安成为中共中央制定和实施抗战政策的策源地。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一场殊死战争。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延安的窑洞里，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先后制定出一整套推动抗战、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一步步地引导抗战走向胜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及各阶段的一切大政方针，都由这里产生，一切重大行动都由这里部署。延安成为整个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

其次，延安成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和总后方。

1937 年 8 月，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编制 4.5 余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自同年 9 月到 11 月，八路军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先后从陕北出发以后，在山西新军的协同下，按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从而形成对日作战的敌后战场。在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辟敌后战场的整个过程中，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始终是它们的战略总后方，是为其提供兵源、输送

物资的主要基地。

最后，延安还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及各类人才的革命熔炉。

毛泽东曾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民众的伟力只有通过千百万干部去发动、组织和领导，才会真正释放出来，成为战无不胜的物质力量。抗战前，党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但是对于抗日战争，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观的民族革命战争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党中央一到延安，就把培养千百万抗战急需人才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二十几所院校。在延安这个面积不大，偏僻落后的山沟沟里，兴办如此众多的学校，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识青年和政治、经济、军事、理论等各方面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延安地区的文化层次，使延安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熔炉。

正是延安所处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它及边区的各项工作，不仅能及时地接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全国总的形势，以便在把握革命全局的前提下，更稳妥地解决本地区的实际问题，而且使延安及边区的各项工作方针和工作作风，既具有延安的地区特色，又较好地体现了党的整个战略意图，反映出革命战争的共同规律。这是延安成为延安精神发祥地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也是延安精神能够不受地域局限，而成为代表全

党风范的革命精神的原因所在。

总之，正是由于延安在中国革命重心实现战略转移的历史性变动中，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中国革命的再生地；在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特殊环境中，它又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出发点，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这就使它成为当时中国经济上虽然落后，而政治上则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民主的地方，从而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必备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提起延安，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中共党史上极其重要的“延安时期”。所谓“延安时期”是指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始，到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止，将近13年时间。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战争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既承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的军事扫荡和军事进攻的压力，又承受着物资匮乏、经济严重困难的巨大压力。中华民族面临着生存危机，人民革命力量面临着危机。正是这种严峻的客观形势，构成延安精神产生及形成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延安所在的陕北地区，是我国最贫穷落后而且多山的地区之一。千百年来的水土流失，使这里沟壑纵横，地瘠民贫，仅能维持少量人口的极端贫困的生计。

周恩来在谈到这里农民的生活时，曾说过：他们“极端贫困，土地产量很低，……在江西和福建，人们参加红军的时候随身带着包裹，这里，他们连双筷子也不带来，他们简直是一无所有。”

（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 42 页）

1935 年 10 月，红军落脚陕北后，使这一地区骤然间增加众多人口，其经济上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为摆脱极端贫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共中央曾多次酝酿向外扩展根据地的问题。从当时陕北周围的情况看，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缘，是少数民族回族的聚集地，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只有向东，去山西。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不仅能够较好地解决经济供给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北上抗日，及策应平津一带的抗日爱国热潮。（《聂荣臻回忆录》（中）第 304 页）这正是中共中央于 1936 年春决定进行东征的考虑。然而，由于山西方面阎锡山的拼命抵抗，以及蒋介石调兵入晋，企图与阎锡山相呼应，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致使党中央试图向东扩展根据地的设想未能成为现实。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心，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后方和一切进步人士、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更大大地增加了延安及边区的财政负担。它必须承担边区政府、中央机关和留守部队财政开支的全部或大部分。当时在延安及边区的脱产人员众多，经常保持 7 万人左右，最多时达 13 万。这么多人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必需的事业经费，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边区人民每 10 人要负担一个脱产人员。庞大的财政支出远非群众所能负担得起。

这种经济贫困、财政匮乏的状况，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新情况的发生，变得愈发严重。

自 1939 年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调整

其侵华策略，把主要兵力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他们持续不断地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伴之于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军民生存的条件。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顽固派，出于对迅速发展的人民抗日力量的恐惧，也一再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甚至多次掀起反共高潮。自 1939 年起，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抗日军饷，截扣海内外进步人士给根据地的各项捐款和物资，并调集 70 万大军配合日寇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及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困死、饿死根据地的军民。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华北地区不断遭受的自然灾害，使延安及边区军民的经济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人民抗日力量的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困难的时期是 1941 年和 1942 年。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黑豆、秕糠和野菜。大批战士由于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患上夜盲症，而各种中药品和基本的生活日用品又十分短缺。寒冬腊月，冰天雪地，还有不少干部、战士不得不身着夹衣，打着赤脚，夜间则靠稻草来抵御刺骨的寒风。

由于革命根据地内部生活艰难，加上外部敌人的猖狂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八路军 1940 年为 40 万人，到 1942 年就降至 30 万，根据地人口也从 1 亿减到 5 千万以下。

严峻的形势，严峻的考验，回避不能，低头不行。否则，人民革命力量就难于坚持，抗战胜利就没有保障。

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面临危急的时刻，在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受到饥饿与死亡的挑战之时，迫切需要一种伟大的革命

精神，去振奋中国共产党人，振奋中华民族，从而渡过难关，走出低谷，争取胜利。

面对饥饿与死亡的威胁，延安和边区的军民们毫无畏惧和退缩之色。他们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奋起开展大生产运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硬是咬紧牙关，凭着“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战胜了困难，赢得了胜利。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在我们的党和根据地军民中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延安精神”的——崭新的思想风貌。它成为中共党人和亿万革命者在革命战争的年代中，团结战斗，经受各种考验，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谈到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件事时，曾这样说过：“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语，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解放社 1944 年 1 月延安版）

严峻的困难，迫使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下定战胜困难的决心，这正是延安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客观条件。正所谓：革命的时代需要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时代又造就了革命的精神。延安精神既是革命战争需要的产物，又是革命战争造就的结果。

三、党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

延安精神的形成，固然与延安时期党所面临的严峻的客观形势有关，但它绝不是客观形势的消极结果，也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在特定的主观与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党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决定性的主观条件。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便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它继承了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在 1935 年遵义会议以前，它还只是一个处于幼年的不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的不成熟性，集中表现在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国革命的特点及规律尚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亦缺乏完整统一的理解，以致在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的共产党内，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得以盛行。这种状况，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然而，也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的反复斗争中，在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党逐渐成熟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政治上的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了。1962 年，毛泽东曾回忆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期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页）这段话说明革命实践的发展，及其对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延安时期的党在政治上日趋成熟的根本原因。而延安精神本身，诚如彭真所指出的，正“是近代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斗争和胜利经验的总结，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彭真文选》第6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可见，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延安时期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党已经形成了稳固的领袖集团。列宁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上万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那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332页）

领袖是党的旗帜。政党的成熟，首先是领袖集团的成熟。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我党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正是以这次会议为起点，我们党在经过多次选择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杰出领袖——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并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领导集体。它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一大批党的卓越领导人。他们也同毛泽东一样，既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既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具有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领导集团，有力地保证了党

的各项决策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以及党的正确领导的实施。这是延安时期的党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稳步地将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党能够在这一时期将以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迅速升华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作为党的最高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已经成熟。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日益丰富和发展并达到成熟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这个期间，毛泽东等同志从事了艰巨的理论创造工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情；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特点；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明确地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概括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完整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

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和一系列有关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及政策。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毛泽东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并据此规定了中国革命长期性、持久性的战略思想和一整套军事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在其它著作中，还阐述了关于经济工作、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等方面的理论和原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邓小平文选》第256页）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一是关于现代世界及中国国情的分析；二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三是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四是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五是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六是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七是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八是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九是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刘少奇选集》（上）第333页）从上述这九个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是关于某一方面的理论，而发展成为有关中国革命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能够在延安时期得到系统化并达到成熟，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具备了以往所不曾有的条件。这个条件，除了上面提到的，此时的党已经积累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能够比较充分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和党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成熟的领袖集团之外，还包括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空前增强了对理论的需要；党始终处在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以及毛泽东的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等因素。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获得了持续十年的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它为党全面、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是举世公认的。

就毛泽东的个人素质而言，他具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智慧，丰富的经历，渊博的知识，高度敏捷的思维能力，以及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精神。但是，在到延安之前，他的卓越才能受到所处地位的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加上战事繁忙，流动性大，书籍报刊极其匮乏等因素，使他既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条件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更难以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大批马列主义原著，各种书籍和报刊资料明显增多。而此时，毛泽东也已经稳固确立了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通晓全局，高瞻远瞩。这一切都为他进行开拓性理论研究，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条件。

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常常通宵达旦地写作，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他在延安时期的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至四卷的有112篇，占四卷总数的70%以上，没有出版的论著为数还不少。其数量之巨，内容之丰富，水平之高，在党内是无出其右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创立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卓越贡献。

随着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贯穿着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典范；党有必要对毛泽东总结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正确的评价和命名。于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共产党主义。”同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国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讲话中，也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毛泽东思想，最早见于194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其中，提到延安整风学习时说：“这次整风学习运动是我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思想上的革命’，其目的在于克服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肃清三风不正的残余，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这种思想改造，又必须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联系起来，每个干部，特别是犯过某些错误的干部，一定要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工作经过深刻的反省，才会获得整风的成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41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此后，这一概念为党的其他领导人和中央及各地党的文件广泛使用。

1945年6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正式确定下来，并被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毛泽东思想，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稳固的理论基础。延

安精神的许多基本内容，如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实行自我批评，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等等，正是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在党的作风中的生动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就不可能有延安精神的形成。

此外，在谈到延安精神形成的主观条件时，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倡导和千百万共产党员及延安军民的身体力行。伟大的延安精神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实践，才得以展现，并升华为先进的民族精神。

第二章　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渊源

一定的主观的精神意识，虽然是一定的客观物质存在的反映，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凝聚着中国革命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延安精神亦然。它是悠久的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实践中的升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丰厚土壤

一般来讲，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积累性和变革性的特点。积累性是指，每一代人都会在继承前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知识内容。变革性是指，不同时代的文化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而更新和变革。当人们考察文化的积累和变革时，就会发现其中有某些相对稳定、长期延续的要素。它们在文化积累中一再被肯定，在文化变革中也仍然被保留。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文化传统”的东西。所谓“民族文化传统”，正是指在该民族历史文化中那些相对稳定、影响深远的内容要素。它主要包括：民族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及生活情趣等。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潜意识的东西，但对该民族成员的心理、情感和行为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恩选集》第1卷第603页）民族文化传统，就是这种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之一。它既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又是一种对现实发生作用的客观存在。它是培育民族新文化灿烂之花的沃土。

众所周知，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年，中华文化历经盛衰变迁而延续不绝。这一简单的事实足以证明，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必定有其值得肯定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成分。延安精神便是孕育、滋长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片沃土上的一朵奇葩。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举其要旨，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追求理想，热爱祖国

确立理想，并为之不断努力，持续奋进，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根本特性。中华文化弘扬人对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为追求理想而矢志不移、至死不殆的仁人志士如丝如缕，代代不绝。

春秋孔子云："朝闻道，夕可死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战国屈原在《离骚》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们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为后人所效仿和崇敬，逐步积淀为一种民族意识。

纵观历代杰出人物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往往是与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表现的尤

为突出。

在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频繁侵扰，中国内部的爱国浪潮空前高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千百万民族精英的座右铭。

在外寇侵入，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他们奋起抗争，血染神州大地。如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甲午战争中的左宝贵、丁汝昌、邓世昌等。

在国家贫弱，人民生灵涂炭之际，他们又主张改革故旧，维新图强。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愿以自己的鲜血为改革铺路。他题词狱中：“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封建帝制，实现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历尽千难万险，视失败与挫折若等闲，愈挫愈坚，奋斗不已。

正是这种追求理想、热爱祖国的文化传统，不仅造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历史的“脊梁”，而且通过他们的实践，形成了中华民族一种极为可贵的性格和风骨，使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吞并、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始终未能得逞。

（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涵盖民族心理基本层面的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我国早在春秋《周易大传》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记载。意喻：天体运行永恒不息，体现着天道的刚健本性。人也应该仿效它，奋发向上，永不停止。“自强不息”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内在本质，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国古代有许多优美的神话歌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这样的实例更是比比皆是。

战国末年，越王勾践在吴越之战中败退会稽山，国破家亡。然其并未气馁自卑，而是卧薪尝胆，刻苦图强，任用范蠡、文种等人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亡吴国，成为霸主。

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历来被人们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而，这部不朽之作，却是在他身心均遭受莫大摧残和凌辱之后，发奋而著就的。

明代李时珍用 30 余年的辛勤劳动，刻苦钻研，翻阅了 800 多种书籍，走遍祖国名山大川，采集药物标本，方修成《本草纲目》。

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在举家皆食稀粥的困苦条件下，坚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完成传世之作《红楼梦》。

可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引导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祖先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凭借简单的劳动工具，创造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文明成果，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举世公认的杰出贡献。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们，能够身处逆境无畏无惧，奋进自强，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历经劫难而不衰，上下绵延五千年且代有高峰的奇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特例。

（三）求是务实，经世致用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中，朴素唯物主义始终是思想主流之一。

先秦时期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

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著名论题。（《荀子·天论》）肯定自然界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日月星辰的运转，春夏秋冬的交替，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并不因为圣明的帝王在世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暴虐的君主执政而消亡。他认为，自然与人各有其职能，彼此不能互相代替。但人能够以完成自己职能——即认识、利用、治理万物——的方式，来参与自然过程。这叫做“天有其时，地有其力，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同上）

荀子的学生韩非进一步发展了老师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参验”说。“参”是比较，“验”是实证。“参验”即是指：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客观规律，通过实际的功效来考察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韩非子·六反》）显然，他在肯定自然界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同时，更强调人对自然界认识的“实在性”与“可行性”。

此后，历代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如东汉的王充，宋代的范缜，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都坚持和发挥了荀子和韩非的上述观点。

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和注重“知”的实在性，反映在历代思想家的治学态度上，就是倡导“求实”学风。东汉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记述：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将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汉朝的河间献王刘德，治学时，注重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力求从事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这是目前人们所找到的“实事求是”这一提法的最初来源。

实际上，历代著名的学者之所以能有所成就，都是与其“求实”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如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自幼泛览各种书籍，对记载山川名胜之书尤感兴趣。此后，他又潜心攻读了大量的古今地学专著，在地学知识上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然而，他

并不以此为满足，立志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作实地考察。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年年外出考察，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终于在地理学的研究上，特别是对我国的岩溶地貌和水文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集中体现在他以日记体裁写下的《徐霞客游记》一书中。

这种在学风上重视“求实”的文化传统，在明末清初得以发扬光大。这一时期涌现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早期启蒙学者，进一步强调学与用的结合，主张“经世致用”，“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欲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返之实。”他们痛斥宋明以来“空谈性理”的腐朽学风，发扬注重实证的求实精神，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和历史考察，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实学”思潮。

19世纪初，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针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剧烈动荡局面，赋予“经世致用”之学以新的时代内容。他们猛烈抨击脱离实际，侈谈理性的宋学和囿于繁琐考据的汉学。大声疾呼要关心社会现实，睁眼看世界，“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魏源《古微堂文集》卷20）并从救亡图存的愿望出发，提出了“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务实主张。（魏源《海国图志》）将“经世”的重点指向“师夷长技”，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先导。

尽管上述历史人物在强调“求是务实”、“经世致用”方面的立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对客观实际和思维活动规律作出正确反映的唯物主义意向，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重实际，轻玄想”的优良的文化传统。

（四）民贵君轻，民为邦本

“民本”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早在周灭商后，以周公

旦为代表的西周初年的执政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夏、商两代的兴衰进行反思。他们通过反复的比较和思考，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决定一个王朝兴衰的关键力量，是人不是神。有德者得民，得民则得天命、有天下。夏禹、商汤的成功就是典型。反之，无德者失民，失民则坠天命、失天下。夏桀、商纣的亡国之命便是先例。故而，自周朝起，便有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郑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的议论。在这里，周朝的统治者虽然仍把“天”看作是意志之天，但将“民”的问题提到一定的高度，主张既要敬天，又要保民，使“天”和“民”两者沟通起来。这种“敬天保民”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孟子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当时众多的有关“民”的地位与作用的探讨中，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孟子·尽心下》）与“敬天保民”的思想相比，他更肯定民的主导性，也更强调统治者“得民”的重要性。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章句上》）

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是他对历史上一些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所作的理性概括，对后代产生颇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承袭和发挥，而且为历代贤能的君主和政治家所肯定。

如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对朝臣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

19 世纪初，地主阶级的开明政治家林则徐，面对中国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在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了“用民心、恃民力”、“民唯邦本”的思想。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国计与民生，实相联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唯邦本也。”（林则徐《江苏奏稿》卷五）在禁烟和鸦片战争中，他将“用民心、恃民力”的思想付诸实践。针对英国侵略的海上封锁和武力威胁，他鼓励沿海人民“群相集议，购置武器，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宣布“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转引自邵德门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第42页）林则徐这种“用民心、恃民力”以抵御外侮的思想及实践，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是卓具政治胆识的。

此后，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中，进一步赋予“民本”思想以近代资产阶级的特色。他指出，人类进化的必然趋势是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国民革命必须发挥民众的力量。只有“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其“革命维新，兴邦建国”，才能“断无不成”。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孙中山选集》第82页）

当然，在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提出的“民本”思想与主张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对此应有所认识。但“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毕竟揭示了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民心向背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因此，在客观上，对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之一。

（五）注重修养，自我完善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反映和代表了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素质和社会心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儒学的

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人的内心修养，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并把它作为一个人能否立身处世，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的根本。

孔子十分注重培养弟子的品德修养。当子路问他君子的修养是什么标准的时候，他谈了三个层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敬"指"敬业"，即认真地对待事业。"安人"的"人"指上层人物，统治阶层，隐喻社会。"安人"便是符合统治阶层的需要。"安百姓"指能博施于百姓，使人民得到安乐。

孟子将人格修养归纳为：善养"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修养就是使人具备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充溢于天地之间，贯彻到人的灵魂中去，表现于品质、情操、人际关系等诸方面，使人格力量变得崇高伟大。他认为，秉有此气的人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样的人才能完成天降的大任。

上述可见，儒学的"修身"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目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学倡导的人格完善的全过程。

这种为平治天下，实现政治抱负而努力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道德追求，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竟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曾参的"吾日三省吾身"，较典型地代表了士大夫阶层不敢须臾松懈对自我严格要求的心境。中华文化这种过分注重自我克制的道德规范，在相当程度上扼制了人的个性发展，产生一定的历史惰性。对此，后人应引以为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倡导社会成员通过自我完善来与社会需要相协调的道德追求，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其积极作用也是应予肯定的。

（六）追求和谐，崇尚仁爱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农业文明在我们这里发育得既早而且成熟。艰苦复杂的自然条件，使我们的祖先养成了凭靠有组织的集体劳动来战胜自然，创造自身生存条件的习惯。而集体劳动的单位，由最初的氏族、宗族直到后来的家庭，都是靠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来联系的。因此，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始终是深藏在我们这个农业民族心理底层的内在要求。

《周易·坤卦》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地"的德行是顺育万物，大地以博大的胸怀包孕万物，以丰富的养料哺育万物。人也应该仿效它，要有淳厚的德性，能包容天下万物。"厚德载物"表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敦厚宽容的气度，是中华祖先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基本准则。

如《尚书·尧典》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之说，是讲民族与民族，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友好相处。《中庸》讲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有九项，其中两项是："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柔远人"是讲大国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小邦国的态度应该友善，对于他们还做不到的事情，要给予帮助。"怀诸侯"则是指大国收取小邦国纳贡的礼品不妨少些轻些，而回报的礼品却要厚重。这里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对外关系上热爱和平的思想品格。在历史上，中国即使在国力很强盛的时候，也很少对外国发动侵略性的战争，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处理国家或民族各成员间的关系上，人们尊崇儒家主张的"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何谓"仁者爱人"？孔子的解释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这里蕴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和别人都是人，都具有相同的欲望，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良好的道

德素质。

当时与儒家声望相近的墨家学派，在人际关系方面，还提出了“爱无差等”的“兼爱”主张。其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这里，墨子所说的“爱无差等”是不彻底的，他并不要求废除差等，而是认可存在贫富、贵贱的现实，只是希望人们和睦相处，不相欺凌而已。

可见，无论是儒家的“仁爱”，还是墨家的“兼爱”，都具有阶级的局限性。同时，他们对统一、和谐的单向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忽视对立与斗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的意向，含有不利于民族发展的文化因素。对此，我们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去把握。

然而，即便如此，这种在人际关系方面，追求和谐相处，崇尚仁爱的道德规范，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对全社会的和谐运转，人际关系的友善和自我调节产生积极的作用。

总之，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极其丰厚和富赡的。延安精神正是深深地植根于这片沃土之中，构成了它由以出发的最深层次的根基和文化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的缩影，是悠久的中华精神的一种积淀。

但是，作为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革命传统与作风结晶的延安精神，又决不是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低层次重复。它是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自觉地进行更新与提高的产物。如，共产党人将中华文化中对社会理想执著追求的传统，提高到为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的高度；将求是务

实，经世致用的传统升华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基于维护统治阶级目的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改造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从追求自我完善为主要内容的修养传统，更新为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勇于自我批评的作风。至于热爱祖国和自强不息的传统，可以说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得到了空前程度的弘扬。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寻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共党人积极促进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在人民抗日力量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中，面对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共产党人毫不畏惧，顽强拼搏，用自己的双手，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五谷丰登的“陕北江南”，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凯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也在八年抗战中成长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可见，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在革命实践中的升华，是民族精神与革命精神的最佳结合。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对世界各国内部的革命运动产生深远影响。斯大林在谈到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时，曾指出：“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它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

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6页）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到来。

由此开始，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55页）

毛泽东说得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很少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总是把目光投向西方，在那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可贵的尝试，然而行不通。于是，他们傍徨、顿足、失望。

正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惊醒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们，促使他们思考，既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那么中国可不可以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既然俄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赢得了工农大众的解放，那么中国人能不能运用这个武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革命因素不断增长，已经具备了广泛传播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条件。经

过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而且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这对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促成其世界观的转变，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于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严密而科学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共党人用以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进行一系列的继承和提高，使之升华到更为科学的高度，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党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深刻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论证，为中共党人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确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是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我们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在绞刑架下，对杀气腾腾的敌人说道："我告诉你们的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说完，他登上绞刑架的长凳，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微笑着告别了人间。（《祖国在我心中》）

著名共产党员夏明翰就义前，写下诗篇："砍头不要紧，只要

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美妙的理想和信念的支配下，无数党的优秀儿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奋斗不息，直到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验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8页）

共产党人的这种理想和信念，绝不是对人类美好前景的乌托邦式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的深刻论证，为这一理想和信念的确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来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后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时起，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

无产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和体现者。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其它阶级将日趋没落和消亡，而无产阶级则将日益壮大。由于它的阶级利益，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决定了它在历史上是一个最革命最先进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只有它才能真正承担起埋葬资本主义，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剥削，创建一个新的社会的历史使命。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

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马克思主义上述观点的确立，使人们不再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把社会主义只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罪恶的道德愤慨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性追求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阶级关系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从此以后，以科学的历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由此决定了共产党人确立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信念的革命性和科学性。

（二）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的科学阐述，为中共党人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党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想人民之所想，干人民之所需。如1933年4月，毛泽东到江

西瑞金沙洲坝，当他在与群众的闲谈中了解到当地人民“吃水难”的问题时，立即让红军战士就地取材，先后打了两口井。当老乡们用双手捧起又清又甜的井水时，感动地说：“毛主席，您真替我们把什么心都操到了。”沙洲坝的群众为纪念这件事，在井台上竖起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8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是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点所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和革命运动的特点时指出，以往历史上的一切社会革命，革命的果实最终都为少数剥削者所攫取。虽然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被推翻了，但另一个剥削阶级又取而代之。尽管在革命过程中，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民群众也参加了这些运动，但他们始终只是某个剥削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而被暂时利用的一种工具。一旦革命成功，劳动人民仍然摆脱不了继续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命运。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则不同。它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思想、政治、文化的巨大发展，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这正是与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者，它不仅代表着

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忠实地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由此决定了它必然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

（三）马列主义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党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方面的论述，为党的三大作风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党风是一个涉及到党的自身建设各个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所谓党风，就是指一个政党和它的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作风。党风既是党员个人意识的表现，又表现为党的整体或大多数党员的共同作风。它体现着一个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中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的优良作风，最主要的就是毛泽东概括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党的三大作风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性格和作风。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两个侧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中，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对认识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决定的作用，表现在：一是人的认识，尤其是科学的理论，往往产生于实践的需要，是以实践为出发点的；二是理论一旦从实践中产生出来，它的任务、使命就是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三是理论形成之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

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其真理性的程度。

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以及人的认识，特别是上升为科学理论之后对实践的反作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党的实践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否则，实践活动就会失去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就会带上盲目性。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必须面向实践，为实践服务。否则，理论就会成为空洞的不着边际的东西，成为僵死的教条。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关系，好比“矢”和“的”的关系，理论是“矢”，实践是“的”，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就是有的放矢；如果理论脱离实践，不能为实践服务，那就叫做无的放矢。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我们党形成这一优良作风的理论根据。它是我们党的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

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和体现。它是以马列主义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科学肯定为理论依据的。

肯定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由此出发，唯物史观认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这同一切剥削阶级所主张的，只有英雄人物才是历史的主人的唯心史观，是根本对立的。

正是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科学肯定，为我们党确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党的又一优良作风。它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一观点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早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列宁也说过："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朝气、生气勃勃的政党都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全集》第8卷第421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敢于运用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因为它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它没有自己特殊的私利。所以，为了人民的利益，它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勇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上述可见，延安精神的形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为指南，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行更新和提高的结果。这就是延安精神生成的基本轨道。

第三章　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过程

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它的基本方面是随着党的诞生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而逐渐萌发、形成以至完善起来的。共产党人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机制。

一、延安精神的先声（1921—1928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自成立之日起，便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昭告世人：中国共产党将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责任。从此，中国革命抛弃了屡走不通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上一条到达胜利彼岸的光明之路。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在中国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以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政党从未使用过，也不可能使用的、全新的革命方法，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方法，将党的一切活动都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之中，由此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中国革命由于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奋斗目标；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采取了相信、依靠群众的革命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革命的前途、对象和动力等问题，整个面目为之一新。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作为旧中国反动统治的对立物出现的，它所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所处的环境异常残酷，从而迫使党从一开始就处于非法的、秘密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它的生存时刻受到威胁。然而，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革命洪流之中，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开始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领导数十万工人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斗争，由此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运高潮。在二七罢工失利的情况下，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在被敌人残忍地连砍数刀后，仍不屈服。他对敌人斩钉截铁地说道："头可断，工不可复！"志气轩昂，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反帝反封建的坚定性、彻底性，以在北伐战争中敢打硬仗，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在中国人民面前树立起自己的革命形象。人民从共产党的主张和行动中，从那些优秀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和英雄事迹中，明白了共产党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党，是一个不谋私利、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党，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

然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1927 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

把数万共产党人推进血海。据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6万人。党的著名活动家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肖楚女等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全国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鲁迅先生曾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在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之际，革命队伍中那些意志薄弱者，有的叛变，有的颓唐。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却奋然前行。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了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中国人民在茫茫黑夜中看到高高擎起的革命火炬。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为追求理想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和在危难之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革命风貌，无疑是后来形成的延安精神的胚胎和先声。

二、延安精神的雏形（1928—1935年）

从1928年到1935年，是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创造性地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使中国革命顺利地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全国。但是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使中国革命再次遭受严重挫折，党和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由此开始了举世闻名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在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先后形成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由此构成了延安精神的雏形。

（一）井冈山精神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原定计划是攻取长沙。但在起义军遭受失利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毅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做出“引兵井冈”的正确决策，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实践上成为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起点。党正是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著名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精神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信革命的星星之火必能燎原的信念和善于在困难的环境中看到光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井冈山根据地处于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是闪烁在黑暗中国的一点星星之火。由于井冈山的斗争是在敌强我弱、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始终面临着来自四面的白色政权的威胁，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

当时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的敌军，经常有七、八个团，最多时达十八个团，而红军主力不足四个团，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没有为追求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很难生存的。

在革命队伍中以林彪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就因缺乏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一度产生右倾悲观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及其在促进革命高潮方面的决定作用。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观察、分析和判断政治形势，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论证了当时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的观点。

毛泽东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即将到来的光明："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页）这里，他把共产党人那种对自己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充满自信的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

同时，毛泽东还正确地指出，不承认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这个客观现实，把低潮当作高潮，搞"左"倾盲动主义是错误的；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观察事物的本质，怀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前途，不相信革命高潮会到来，同样也是错误的。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军民们，所具有的这种坚信革命的星星之火必能燎原的信念和善于在困难的环境中看到光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力拼搏。到1930年初，全国已形成大小十五块根据地，红军总数计十万余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燃遍全国。

第二，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开辟

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精神。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一个关系着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若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必须正确解决和回答这一问题。

依据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学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是武装夺取政权，或简称为暴力革命。这一点，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是适用的。但是，由于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这一普遍规律在各国的应用过程中，则不会千篇一律，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个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

1917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这条道路的特点，是通过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首先夺取城市政权，然后再将革命推向农村。城市是其积蓄力量，发动革命的中心，城市无产阶级是其革命的主力军。

这样一条道路是否适用于中国革命呢？对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是缺乏清醒的认识的。党内不少同志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不顾中国的特殊国情，坚持"城市中心论"，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进行了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们从实际出发，深刻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

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大胆的、开拓性的探索。

1928年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初步经验，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科学地论述了红色政权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1927年，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到1930年初，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经验的积累，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提出“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从而把“工农武装割据”与夺取全国政权联系在一起，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里是找不到的，这是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创造性贡献。这一理论的产生，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可以说，离开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党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难以成功的。

第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处在四面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物质条件非常艰苦。“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毛泽东

选集》第1卷第53页）当时，人们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有油盐的南瓜汤，即便如此仍难以维 持，只好靠野菜充饥。

在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等领导者带头吃苦菜，和战士同穿粗布衣，官兵一致，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怕苦。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坚持长期的斗争，井冈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军民大打粮食仗，送粮、背粮、护粮的战斗紧张而又繁忙。当时四十开外的朱德军长，为储备粮食粉碎敌人“会剿”，亲自挑粮上山，长途跋涉，留下“朱德的扁担”美名四扬。他们还自己动手，办军工厂，用土办法制造梭标、大刀和单响枪；办被服厂，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布，生产军服；办红军医院，聘请当地土郎中，上山采药。就是靠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井冈山军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1页）这里所说的“共产党的力量”，不仅是指党的军事力量，而且是指党所具有的坚定的信念、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和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这是党团结自己，争取群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

（二）长征精神

1934年底，当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损失殆尽，苏区根据地丧失90%，革命濒临绝境之时，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的率领下不畏艰险而北进，以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起点，又一次使革命从困境中崛起，并为党实现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基础。

在长征这种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

扬井冈山精神，使之升华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蔑视困难，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开篇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里一个普普通通的"难"字，不知概括了多少世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长途跋涉，体力极度疲乏之难；缺衣少粮，疾病伤痛之难；千山万水，攀援跋涉之难，……。再加上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阻截，更使红军的"远征"难上加难。然而，面对重重困难，红军将士的回答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不怕！"而且不是一般的不怕，乃是等闲视之。这是何等豪迈的气概。"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题词中写道："没有什么困难事情能阻挡我们去路的，问题只在于坚持正确方针，艰苦奋斗，就能达到目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长征再清楚不过地向世人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斗志。

人们在谈到吃苦时，常这样说："苦不苦，比比长征二万五。"的确，在长征中，红军将士们吃尽了天下苦，历尽了世间难。但在他们身上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爬雪山时，高山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有不少同志的脚被冻得僵硬，鞋袜与肉粘在一起。但当巍峨的大雪山踩在英雄们的脚下时，红军战士举起手中的木棍，自豪地笑道："雪山高，但没有我这根木棍高。"过草地时，遍处沼泽，荒无人烟，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散发着腐臭气味的淤黑色污水。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

降。稍一不慎，踩进泥潭，就很难拔出，甚至会被泥潭吞没，献出生命。尽管如此艰难，总参谋长刘伯承竟触景生情，畅想起草地的未来。他兴奋地对朱德总司令说："将来开发草地，您当总指挥，我还当您的助手——参谋长。"（《艰苦的历程》（下）第81页）那时，战士们只有一个念头：走出草地，就是胜利！他们就是这样，以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和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所具有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第三，为革命理想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

红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蔑视一切困难的革命情怀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斗志，来自他们对革命理想的忘我追求。

1938年4月，张闻天在给陕北公学学生的一次讲演中说道："长征中，我们的确碰到了无数困难，……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论青年的修养》）

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在长征期间，牺牲的人比活下来的人多得多，幸存者们意识到，如此多的人牺牲了，而他们却活了下来，这种意识使他们的革命使命具有神圣的性质，并且产生了一种几乎是宗教性的献身精神。"这种心理遗产对延安精神的形成有特殊意义。（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0页）

毛泽东在阐述红军长征的空前的历史意义时说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之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

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150页）毛泽东这篇充满激情的讲话，是对革命危急时刻共产党人和红军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的高度评价，字里行间，闪烁着长征精神的光辉。

中国革命经过长征的严峻考验，造就出革命的栋梁之材。他们个个都经过了千锤百炼，人人都是中国革命的精萃。当红军即将到达陕北时，周恩来对那些活下来的同志，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红军象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周恩来传》第297页）正是这些革命的火种，把党的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带到陕北，带到延安，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延安精神的形成（1935—1945年）

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来说，延安时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党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群众性的大党，党员人数由4万增加到120万；而且在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一时期更系统化和普及化了，并且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新的内容，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一）延安精神的初步形成

从1935年10月红军落脚陕北到1941年全党整风之前，是延安精神初步形成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以及抗大精神的形成。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解决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这次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所以只对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红军落脚陕北后，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说明党的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特别是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来制定党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新策略的问题。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实现了党在政治策略上从国内阶级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本转变。毛泽东根据会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上详尽透彻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问题，奠定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从党中央决策的高度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2 页）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危及中国存亡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起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同上第 153 页）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阐述党的路线、

方针和策略的制定，不应当从“本本”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出发，从客观事实出发的思想。

可见，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正是我们党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独立自主地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制定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开始成为党中央观察和处理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从根本上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利用到延安后工作环境相对稳定的条件，刻苦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于1937年先后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以科学的总结。

他在《实践论》中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由此得出结论：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坚决反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这种统一的集中体现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尤其着重地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强调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就从理论上批驳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在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为在思想理论上彻底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938年，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抗大由此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被称为“抗大精神”，并在延安所有干部学校中迅速传开。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远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近期目标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但在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都因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作指导而受到限制和阻碍。毛泽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结合在一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如何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问题，而且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文化基础。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连续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形成了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备的理论体系，由此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已初步完成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任务，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已经成熟。

上述情况表明，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延安精神已经初步形成。

（二）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从1941年整风运动开始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召开，是延安精神正式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期间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对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早在1938年6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如果我们党有

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7页）

但在整风运动之前，我们党的许多干部由于过去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缺乏对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鉴别能力。当机会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时候，他们常常被蒙蔽以致盲从。这种状况严重危害着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也极大地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

例如：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写道：“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 的。”（《毛泽东选作选读》上册第411页）他要求全党总结由于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后期的两个极端政策，使党和革命遭到极大损失的教训，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党内有些高级干部却认为，王明的“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上的错误。毛泽东为了等待这些同志的觉悟，在这个指示中就没有提“路线”二字，而只提“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思想史》第2卷第47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这种情况，说明当时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对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实质尚缺乏统一而深刻的认识，其严重影响还远未清除。“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起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04页）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引导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反思，展开怎样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重大问题的探讨。使全党通过这个讨论，切实感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533页）这样一个认识，在吃尽了教条主义苦头的广大干部和党员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彻底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从根本上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

通过整风运动，在延安地区，存在于广大党员干部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得到了全面的清算，实事求是，注重调查，遇事同群众商量，处处倾听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得到了全面弘扬，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得到全面的培养。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关于

“延安精神”的论点，并号召全党学习延安精神。他说：“延安县的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象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么！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们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22、23页，东北书店1949年3月版）可以说，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对延安精神的性质、内容作了明确的界定。由此也可以看出，整风运动对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还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及边区军民的革命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著名的“南泥湾精神”就是大生产运动中树起的一面旗帜。

大生产运动，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基本上实现了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自给，为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培养了延安军民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是党的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精神的一曲赞歌。

中国共产党在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培养和弘扬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得到了全面的理论升华。这就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

三大作风，体现着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科学概括和论证，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第二编

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内容

第四章　共产主义精神

精神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体，是一种强烈的、稳定的、支配人的行动的核心意识或心理状态。它在人们的活动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巨大力量。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历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并形成了由毛泽东亲自倡导、中国共产党共同培育的延安精神。她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思想、优秀品质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成果——共产主义理想的完美结合。她既反映了摆脱旧的生产关系的影响，即脱离一切低级趣味而铸成共产主义新人的品质，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所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的准则，表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延安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融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

一　最高类型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列宁说爱国主义“是千

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列宁选集》第3卷第608页）这种感情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它是从古至今人类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逐渐产生、发展、巩固下来的。爱国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0页）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有奴隶主阶级的爱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前面三种类型的爱国主义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唯独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才是最值得称道的。因为，与前三者相比，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更具有先进性，更具有科学性。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作为先进阶级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她抛弃了偏狭的阶级私利，具有更广阔而坦荡的胸怀。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洞悉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以开阔的视野、犀利的眼光、深邃的洞察，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又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为中华民族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注入新鲜血液，把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直接联系起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目标密切联系起来，从而使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爱国主义。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忠诚、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抒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他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

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2页）“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63页）毛泽东赞扬“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深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1936年，毛泽东为实现红军直接对日作战，准备率部东征，临行前夕，面对白雪装裹的山川，触景生情，欣然挥笔，写下《沁园春·雪》这首气壮山河的诗篇。不仅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更赞美了今朝的抗日英雄，充满了建立新中国的豪迈决心和革命到底的必胜信心。无论是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还是诗词里，我们都可以领略到一个共产党人对祖国、民族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激励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志要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而奋斗，立志为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孕育出毛泽东伟大的人格力量，使之具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襟和“胸中日月常新美”的奇怀。

（二）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延安时期，正值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为转嫁1929年波及日本本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中

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首先占领我国东北三省；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攻占北平，占领华北大片土地；同年8月13日，侵略者又在上海发动进攻，占领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华东、华南、华中等地告急。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中华民族的半壁河山沦陷于魔鬼之手。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的中国，“唯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4页）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誓死不做亡国奴。为了民族的独立，祖国的尊严，人民的自由与幸福，中国共产党人毅然高举起爱国主义大旗，站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最坚决、最勇敢地为维护民族利益而奋斗。

早在“九·一八”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用民族自卫战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口号；1933年，华北告急，中国共产党又迅速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此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适应革命阶段的不同，变换斗争策略，为了尽早结成抗日救国阵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大义，捐弃前仇，耐心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国民党爱国将领，不杀蒋介石，逼其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结束内战，实现抗日时局转换的枢纽。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的理智和宽广胸怀，教育了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体中一切有良知的爱国人士，使他们愿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抗日。与此同时，为了表明我党的抗战决心和诚意，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在

军事上，中国共产党把红军主力3万人左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进攻，维护了抗日大局。当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正面战场上由于片面抗战路线所致而溃不成军之际，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领导发动爱国军民，坚持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抗击着大部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在这八年中，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就同敌人作战125，665次，消灭日军527，422人，伪军1186，995人，解放土地104．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亿。他们以自己的英勇牺牲，换来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颂歌。它向世人表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辉业绩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民族战争。它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8页）

（三）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根本特点是与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紧密结合

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爱国主义。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它摒弃了以往历史上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从各国无产阶级

的共同利益出发，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坚持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统一。三者的统一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本质特征中最主要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因此，就内容而言，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国际性的，这一国际性运动的最终目的旨在消灭国际资产阶级，消灭一切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都是对国际资本的打击，都是完成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同时，若就形式而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要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各国的革命和事业是在本国、本民族范围进行的，因此要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本国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支持。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3页) 延安时期的抗日战争，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的时间最长，而且是亚太地区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称霸梦，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战略上配合、支援了欧洲，太平洋及亚洲其它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国际奉献。延安时期的抗日战争，既是为保卫祖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战，又是为世界和平而战，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的光辉典范。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

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帮助了外国的人民。”“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0、521页）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强调和坚持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共产主义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共产主义立足于民族大地的基石。其次，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阶梯。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各国共产党人领导本国人民进行爱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这种爱国主义运动的深入广泛开展，必将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延安时期，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决战，既是爱国主义斗争，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当时并不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却是朝共产主义目标前进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和阶段，而抗日战争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重要一环。第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因此，只有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才能和共产主义运动保持一致。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这是伴随现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而在先进的

人们的思想上都经历的过程。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都是中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他们从亲身经历和历史教训中认识到，除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它任何形式的道路都无法改变中国的面貌。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他们才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中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从任何个人来说，不成为爱国主义者，就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就根本背弃了共产主义的原则。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来看，不争得并坚决捍卫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彻底的爱国主义促进了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爱国主义本身在这一实践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彻底的爱国主义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同阶段的实践又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事业，这就是历史给人们的启示。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走过的光辉历程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最伟大的爱国主义政治集团，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忠诚、最坚定、最卓越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事业的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在这方面所曾达到的高度。如果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的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实施，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则是国际主义在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过程中的实施。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永远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今天，我们中国倡导的

爱国主义就是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因为，这是中国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28页）

二、共产主义理想是延安精神的革命灵魂

鲁迅说：“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不过其中有“高下不同”（《鲁迅选集》第1卷第8页）。中国共产党人毕生追求的是崇高而远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这一理想来自现实，又高于现实，它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激励人们甘愿为理想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一）党从成立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奋斗目标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立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学说。他们第一次提出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后，这一理想就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立即明确宣布：中国革命必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她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她的敌人是强大的，困难是严重的，这一切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105页）但是，所有这一切吓不倒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对共产主义理想有着

执着追求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肩负着人民的嘱托和历史的重任，恪守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凶残的敌人面前，在险恶的条件下，在革命一次次地遭受挫折和失败时，中国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永不退缩，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方志敏烈士在被敌人杀害前引吭高歌："敌人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王若飞、叶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除忠实于我的理想之外，一切都办不到"的誓言。先烈们的浩然正气来自于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来自于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们党的缔造者毛泽东，更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杰出代表。为了中国革命他先后牺牲了六位亲人。延安时期，他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在窑洞里，油灯下，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写出一篇篇光辉著作，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朽篇章，建立起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共产主义的论述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和力量源泉。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重要时期。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指南。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中，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内涵和层次的理解，并从理论上进行了精辟、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任务和前途，指出中国革命 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渐次达到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两个革命过程既不能合并，又必须衔接，只有把文章的上篇作好，才能继续完成下篇，从而最终完成向人类最高理想的过渡。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民主革命的成功呢？毛泽东在文章中做了回答，他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已更清醒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坚定了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民主革命的最终目的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652页）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她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终解放全人类。但是，共产主义事业又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的事业，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经过与敌人的顽强拼搏才能完成。鉴于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党人必须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政治素质。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此作了丰富而深刻的论述。

首先，共产党员必须加强思想修养。因为，共产党人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8—99页）他要担负历史赋予的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所以就必须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

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革命的实践中“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加紧学习和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9页）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发现自身不正确的思想、品质、习惯，并认真改正，从而提高自己的觉悟，培养革命的品质，改善革命的方法。共产党人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共产党人的责任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更快地实现。”（《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3页）为了尽快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每个共产党员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加强自身修养和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革命运动中遇到的问题。

第二，共产党员应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努力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共产主义事业是一项“百年大业”，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它不仅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具有最雄伟的气魄和革命决心，同时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际的实际工作。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最伟大的气魄和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我们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实现过程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又清楚地了解这种困难是一定能够在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发动中完全克服的，绝不为困难所吓倒。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依靠，完全有信心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中一段大工程，同时也完全相信我们的后代能够完满地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全部工程。”（《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7—128页）而对于一切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理想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8—129页）

第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自身的性质决定她除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外，没有其它特殊利益。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是以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社会发展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0页）每个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把党的利益，全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利益置于服从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准则。”（《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0页）在这种准则指导下，使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一致，使个人利益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甚至可以为党的利益，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1页）这种为党、为阶级、为民族、为人类解放而作的无私奉献，在共产党员看来，是最值得最应该的。

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延安时期，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内涵深刻的理论，它更成为人们共同的心声和自觉的行为准则，成为贯穿延安精神的主线和灵魂。

（三）延安精神处处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辉

共产主义理想是延安精神的最高层次，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和支柱，延安精神的每项内容无一不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体现。

实事求是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根据。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是从实事求是中创立，从实事求是中发展的。没有实事求是，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创造。离开实事求是，共产主义就陷入空谈。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

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复杂历史和丰富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后提出来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延安时期，实事求是精神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例如，在抗日战争中，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确立，就是从当时中国实际出发，作了正确分析后制定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其出发点就是实事求是；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和“三三制”等都是应客观形势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决策。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更是实事求是的典型范例。延安时期，党的大政方针的制定遵守的是这一原则，而工作人员做工作也是如此。他们凡事一切从实际出发，使各项工作生气勃勃，正如毛泽东所说，延安同志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延安时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这一思想路线，才制定出一整套正确的，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而奋斗的献身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言人，是人民利益的忠实执行者。她一成立就宣布，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最终目标，以彻底解放全人类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除了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决无任何私利可图。延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道德原则为依据，总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高度概括列宁关于共产主

义道德的基本精神，明确地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并且把它确立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唯一宗旨。

延安时期，“为人民服务”成为人们的座右铭，成为社会的时尚。无论是党政工作人员，还是部队的干部战士；不论是领袖、高级干部，还是普通一兵，都能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办好事。他们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上。真正做到，一切言行都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襟怀坦白，克己奉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人民极端负责，极端热忱，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关心人民比关心自己为重，他们是人民的公仆，民众的朋友，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献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精神风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赢得了民众的心，延安时代成为党群、干群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这种精神也深深感动了到过延安的外国记者。美国进步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后颇有感触地称赞共产党常说的“为人民服务”是“货真价实”的，“我要是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共产主义事业既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又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奋斗过程才能完成。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它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灵魂，集中表现为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和陕甘宁边区革命军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发扬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0页）延安时期，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就是这一精神的伟

大创举。为生存、为斗争、为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时刻，向全体军民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凭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和革命必胜的坚强决心，凭着压倒一切困难而决不被困难所屈服的拼搏精神，胼手胝足，辛勤劳动，克服了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终于取得了大生产运动的辉煌胜利。

民主团结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争取民主。有了民主，才能促进团结，而促进和实现民主团结的办法，则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在艰难的革命进程中坚持斗争，除了共产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而发扬民主的办法，则是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民主团结是我党历来用以倡导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口号之一，也是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武器。

延安精神的丰富内容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科学的概念。而作为这样一种科学概念的延安精神之所以经久不衰为世人称颂，是因其来源于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断。她是共产主义理想在延安时期的充分体现。因此，我们说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就不可能产生延安精神，共产主义理想是延安精神的革命灵魂。

三、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信仰、理想在革命队伍中的表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密切相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就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无产阶级政党就失去了正确的奋斗目标，因而也就无所谓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丝毫不动摇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的信念，才能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延安精神，是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紧紧连在一起的，延安精神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方向。

（一）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

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不过150万，是有名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物质条件差，生活十分艰苦。但是，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大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无论是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够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斗志，顽强的毅力坚持战斗、工作和生活，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坚定的乐观主义气概，折射出时代的光辉和革命的精神风貌。他们住的是窑洞，穿粗布衣服，吃土豆小米，但他们以苦为乐，风趣地称大米加小米煮熟的饭为国共合作饭，小米锅巴是“列宁饼干”。在日用品奇缺的情况下，他们用空墨水瓶做油灯；用草木灰过滤水洗衣服；用猪鬃制成牙制，以食盐代牙膏。有一年过冬，被服厂的

棉衣缝制不出来，就把棉布、棉花和针线发到个人手中，自己缝制棉衣。一时间，炕头、树下、操场、田边，到处呈现出捻线、缝衣的繁忙景象，给艰苦的延安生活平添了一片欢乐、繁忙景象。抗大办校初期，没有校舍，自己动手，仅用了两个星期就在山坡上开出了175个坚固的窑洞，修筑了长达3000米的“抗大公路”，解决了近2000人住宿问题。没有桌椅，就用砖头、石头做凳子，用自己的双膝当课桌。纸张困难，就用马兰草造的纸，或用桦树皮订作各式“小本子”写字、写诗，并打趣地称这种不花钱的纸为“油光纸”。没有笔，大家就以树枝代笔。物质生活尽管艰苦，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很充实，很丰富，到处洋溢着欢快向上的欢乐气氛。青年们自制胡琴、提琴、象棋、扑克，自己编写文艺节目，鲁艺学院创作演出具有广泛社会意义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白毛女》、《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劳动工作之余还经常举办篮球、排球比赛。朱德、贺龙等领导经常和干部、战士在一起打篮球。宝塔山上，延水河畔，处处洋溢着亲密无间的同志情谊。美国友人访问延安后，对人们留给他的印象这样说：“他们的幸福仿佛是无穷的，好象有一种秘密来源似的。”“他们过着世上最艰苦的‘苦力’生活，几乎一无所有，然而，他们都是全中国最快活的人，这个事实是没有人怀疑的。”（《续西行漫记》[美]尼姆·威尔斯著，第35、38页）这个秘密来源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共产党人对信仰的追求。

（二）革命青年奔赴延安

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使延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能以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同甘共苦，共渡艰辛，而且还象一块强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他们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全国及海外华侨，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中间

有些人离开温暖的家庭，放弃优越、舒适的生活、学习条件，不畏艰难，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人生的真谛，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一个广州青年，在赴延安途中，因长途跋涉，气候不适，一病不起。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执着地朝延安方向，双手抠进黄土地，十分艰难地爬了 28 米，最后倒在通往延安的路上。一批上海青年宣誓："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他们历时 13 个月，行程一万多里路，终于到达延安。从西安到延安，蜿蜒崎曲的八百里山路，成为追求者用鲜血铺成的信仰之路。据统计，仅 1937 年到 1938 年一年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来的全国青年就有 2288 人。这些人里有母女相约、姐妹相约、夫妻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来到延安，投身革命，献身于革命理想。毛泽东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到延安，这是最好的考试。"（《时代的精神支柱》第 101—102 页）

（三）窑洞大学，革命熔炉

延安不仅是理想的化身，更是革命熔炉。延安，不仅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更为抗日战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材。

延安时期，大批青年为寻求真理，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来到延安，他们迫切地需要学习革命理论和本领。同时，由于战时的环境，急需增加后备力量。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

的战斗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毛泽东指示根据地要尽可能地开办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和领导下，延安创办了一所所“窑洞大学”，大规模培养和造就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志士和精英。这些大学包括：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其中，延安的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都是直接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自领导和教育下锻炼成长起来的。他们每人都有三件宝：第一是镢头，拿起镢头能开荒种地，建设校舍；第二是枪杆子，拿起枪杆子能够保卫边区，打败日本侵略者；第三是笔杆子，拿起笔杆子能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在这些新型学校里，倾注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他们下大功夫总结历史经验，向全党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同时他们还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刻阐述了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者的斗争方向，大力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特别是以思想教育为中心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有效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在这些学校里，学员们学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革命创业精神，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英才。他们从“窑洞大学”出发，把真理和革命精神带到全国各地，到处生根、开花、结果，为革命作出卓越的贡献。所有这一切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革命，就是一所学校，延安就象所革命大学，它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培养造就了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美国作家弗朗西斯·苏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新中国以巨人的姿态昂首阔步地登上国际舞台，引起全世界的注视。……中国人民怎么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那暴风雨般排山倒海地冲刷着中国大地的力量的源泉在哪里？那使旧中国的反动势力一触即溃，土崩瓦解的秘诀是什么？”（《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美]弗朗西斯·苏，第1页）一句话，就是延安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过去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有强大的战斗力，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共产主义精神作支柱。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仍然离不开它。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在创建新世界的整个历史时代中永远不能丢掉的法宝。

第五章　实事求是

延安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但是，其最根本的内容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石，延安精神是从实事求是中创立，也是在实事求是中发展的。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延安精神，也就谈不上延安精神的发展。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实事求是，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从哲学高度概括出来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实事求是是历史经验的结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苦苦地思索：为什么中国革命曾经得到迅速发展？为什么中国革命又多次遭到严重的损失？怎样才能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必须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

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而与此反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则“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801页）毛泽东郑重地告诫全党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宗教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成现作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到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治百病。”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817页）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地回顾了自己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历史。

一次成功是在1921年至1927年，特别是在1924年至1927年，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1922年党的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奋斗目标和远大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始结合的标志。接着，党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帮助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错误，自

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对农民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惨痛地失败了。这是第一次失败。

另一次成功是在1927--1930年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考验面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在黑暗中国的夜空，独力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党由此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时期。在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独树一帜，有胆有识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积极推行一条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虽然英勇作战，最后仍不得不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王明“左”倾错误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这第二次失败教训多么沉痛！

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深刻教育了党。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迅速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国革命为什么胜利了又失败，失败了又胜利呢？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明确回答。他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这是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为什么陈独秀会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因为陈独秀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而对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则认识不足，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步步退让，最后惨遭失败。

为什么王明会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因为王明等人自己不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简单照搬外国经验，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意见。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虽然一"右"一"左"，是两个极端，但是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指出："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290页）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就是实事

求是。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民主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价之宝，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概括出来的。古人虽然也说过“实事求是”，但他们指的是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赋予崭新的科学内容，使这一概念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概括，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毛泽东“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邓小平文选》第109页）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经过周密的实际调查写成的。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1929年12月，毛泽东总结两年多来建党建军过程中的丰富经验，在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他还明确提出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形势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古田会议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声。因为

它既强调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又注重调查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

毛泽东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比古田会议前进了一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思想路线这个概念首次被使用，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第二，明确反对了当时党内和红军内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本本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第三，提出纠正本本主义的方法——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

应当看到，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虽然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还没有来得及作严格的理论论证，毛泽东到达延安后，为了总结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经验，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的著作，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实践论》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则不是从实践中来，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并拒绝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样，《实践论》就从认识论上揭示了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分歧。《矛盾论》则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认为客观世界充满了矛盾和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这种矛盾和变化。一切正确的思想，只能以时间、地

点、条件为转移，任何离开具体条件的绝对的僵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主观主义则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和表面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这种观点不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内部联系，不仅违背了辩证法，也违背了唯物论，陷入唯心主义。《矛盾论》就从辩证法方面揭示了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分歧，这两篇著作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证了我们的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实践论》和《矛盾论》，虽然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了充分可靠的理论基础，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还需经过一个过程。这是因为党内有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并没有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而改变他们的立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41、1942年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就是这次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他在当时给中央党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以后又给《七大纪念册》题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两句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实际上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思想保证。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指“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121页）。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

三、实事求是在延安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党和人民改造世界的全部活动中。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恩格斯说过：唯物辩证法是"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列宁也说过，"马克思的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全集》，1959年版，第19卷，第5页）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在空前未有的规模上把认识论和辩证法同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到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去，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通过这些重要环节和桥梁，走出了理论论述和论战的范围，真正成了党和人民群众科学地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从而格外富有生气和巨大的实践价值。

第一，实事求是，实现重大战略转变。

对于这个问题，彭真同志曾作过精辟而生动的论述。他指出："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同国民党打，你死我活。'九·一八'事变，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战争发动了，打起来了，怎么办？我们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样，好多新的问题就产生了。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是杀是放？为了争取蒋联合抗日，把蒋放了，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土地政策也改变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开始时，有

的农民明减暗不减，白天减了，夜间又偷偷送回去，因为他怕地主。后来农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他又不交租、不交息了。中央又提出，要交租交息。从没收地主土地，到减租减息还要交租交息，这是多大的变化呀！还有，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成了‘国军’。过去我们红军的帽花是红五星，抗战时戴的帽花是青天白日，这又是多大的变化呀！”“抗战结束以后，是打是和？全国人民，包括我们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都希望和平，全世界都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到重庆谈判，搞了个停战协议。但是，蒋介石、国民党还是要打。解放战争打起来以后，我们的土地政策已不再是减租减息，而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土地。这时我们的帽花又恢复红五星了。打了三年半，我们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这个时候和抗战期间完全不一样了，和土地革命时期也不一样，就是这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各地也不完全一样。新解放区在两年以内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先不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分浮财，因为那时新区农民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如果没收地主土地，分浮财，果实会被少数‘勇敢分子’得到，不容易分到真正勤苦劳动的广大贫雇农手里，而战争负担却要落在他们身上。所以，新区两年以内还实行过减租减息，以后再搞土地改革。好复杂呀！但总的是一条，都要实事求是。”（彭真：《事实求是，不尚空谈》，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参阅资料》，1990年第5期）

第二，实事求是，发展统一战线。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总结了其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独创性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统一战线理论、原则和策略。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十分艰

巨。这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1937年底，王明到达延安后，全力贯彻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政策”。毛泽东敢于破除迷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对王明的右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页）所谓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敢于放手发动群众，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在处理有关抗战的具体问题时，共产党根据不同情况，对国民党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不同办法。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坚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根本原则。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虽然留在抗战阵营内，但是非常动摇，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如何处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矛盾，关系到能否把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的问题。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客观形势，指出在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情况下，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规定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进攻，限制了蒋介石反动政策的实施，把抗日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又联合又斗争，是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者之外，还有一个中间派。毛泽东特别重视中间力量。他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他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 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 尊重他们的利益；(3) 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7 页) 只有争取了中间力量，才能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鉴于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即无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数量很小，而中间有着数量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张“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最大限度地孤立当前最主要的敌人，而反对“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根本战略思想。

第三，实事求是，进行革命战争。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革命战争，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制定了一整套符合这个特殊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

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同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战争。面对强大而凶恶的民族敌人，我们依靠什么力量去打败它？蒋介石集团单纯依赖外援，党

内的王明教条主义者则单纯依靠国民党军队，他们都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512页）他又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同上，第480页）毛泽东在分析了客观实际情况之后，得出的鲜明结论是："兵民是胜利之本。"（同上，第498页）这就是说，打败入侵强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亦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为了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首先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抗战一开始制订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动员全国军民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纲领。要动员广大军民积极抗战，还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把抗战与人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三三制"、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广大军民的积极性。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还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种体制既有利于主力军的发展，又有利于发挥各自的长处，同时还有利于适应战争形势，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由于坚持了人民战争的路线，以仅有5万余人之兵力，在全国创建了19个抗日根据地，歼灭牵制了大量日军，并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20万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的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是弱国打败入侵强国的正确战争指导路线。

在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

观点有着相当大的市场。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在1938年5月写了《论持久战》。他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1）敌强我弱。（2）敌退步我进步。（3）敌小我大。（4）敌寡助我多助。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在此基础上，他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实践证明，战略持久战是弱国战胜入侵强国行之有效的战略指导方针。

中国革命战争要赢得最后决定性胜利，必须依靠正规战争。但这种正规战争只有从中国 的游击战争发展而来。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个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9、499、405页）在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正是由于坚决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方针，因而取得了敌后抗战的伟大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毛泽东依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和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条件，制定了内线作战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

积极防御方针，使我军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能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不断地歼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当敌人在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仍在继续，在敌我兵力的对比上，敌强我弱的情况虽已有所改变，但我军仍处劣势的情况下，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及时抓住敌人战略布局上的致命弱点，作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的主要战场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从而使中国人民战争出现了由战略防御发展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敌人则在我内外线兵团联合打击下逐步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以后，又不失时机地指挥解放军先后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的巨大胜利，奠定了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毛泽东用以指导解放战争的各项战略决策之所以正确，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解放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做到了主观指导同客观实际相符合，这种主客观的一致性，来源于对战争各阶段敌我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的深刻了解，和对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可靠基础上的，因而能适应战争发展变化的规律，成为驾驭战争并赢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制定战略决策，并据此适时地提出新的战略任务和实现这一任务的方针和方法，是毛泽东实施战略指导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四，实事求是，发展经济。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经济工作，制定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由于日寇的连续“扫荡”和严重摧残，由于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加上水旱灾荒，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在 1941 至 1942 年间发

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叙述那时情况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

针对这一严重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生产自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发展生产，克服困难。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规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同上，第891页）为了实现这一总方针，毛泽东提出，一是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这是保证财政、供应的根本办法。二是组织群众建立生产合作社。三是部队、机关、学校开展自给的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各解放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掀起了空前的生产热潮。这不仅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而且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实事求是，搞好党的建设。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党的建设，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产生"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提出了克服和纠正这些错误倾向、解决党内矛盾的根本方法。

抗战爆发后，由于共产党坚决抗战，在全国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广大革命分子纷纷要求入党。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大党，党的主流是好的，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党处在他们的包围中，不能不经常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些还没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是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其表现为：思想方法方面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

治倾向方面的“左”右摇摆和组织生活方面的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思想，也时常通过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传到党内来。所以，党内矛盾的本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主要的又是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曾经在党的历史上多次形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虽然中共中央已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影响还没有肃清。因此，这个时期党内又表现出几种不良的作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

鉴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提出，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整风运动的对象是全党，首先是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毛泽东创造性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方法，清除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广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比较清醒地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同时，整风使大批党员从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转为无产阶级立场，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使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整风运动中，我们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秀作风。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党的建设，使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

业的坚强核心。

第六，实事求是，做好领导工作。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中去，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其主要点是：

——调查研究，胸中有数；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承认差别、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要有远见卓识，反对持一孔之见，要把远大理想同当前的实际的任务结合起来；

——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

——领导者注意的重心应当放在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上，捉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环节，善于“弹钢琴”；

——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中和分散的关系；

——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要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

——抓两头带中间；

——抓典型、解剖麻雀；

——留有余地；

——波浪式前进，……等等。

说到底，这些方法体现了一般和特殊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一

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就是调查研究。

延安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对于制定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性。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任务。他说："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在毛泽东大力倡导下，在全党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设立了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张闻天率领一些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陕北和晋西北开展调查研究，整理出许多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和分局，也组织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在延安时期，调查研究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土地改革中去，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调查研究成为各级领导机关普遍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经常的工作

制度，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中国共产党人最杰出的代表和学习楷模。

毛泽东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于确立和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四、实事求是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括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党的一切工作中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概括，体现了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统一，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实事求是是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何为第一性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第二个方面是思维能不能反映存在，即世界的可知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简明而又通俗地概括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实事"即客观存在着的一切

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客观事物总是遵循着它自己所固有的内部规律性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同时，人们在实践中，完全可以探求到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可以用这种关于“是”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指导人们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这就是说，世界是可知的。这样，实事求是的命题，既唯物又辩证地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时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实事求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第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而且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端重要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即存在和思维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做了充分论述。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展开论述，毛泽东则系统地阐述了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标准等理论。

实事求是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这些基本观点，它是以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世界并进而改造世界为根本目的的。实事求是中的“求”，就是指要去认识世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如

何才能做到这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基础上，遵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逻辑的原则和规律，进行能动的反映（认识），揭示事物的真理。我们从“实事”中求得了“是”，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

以求到的“是”（即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是认识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如果把求得的“是”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是”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在阐述实事求是时，毛泽东不仅强调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出发，而且强调“求”。就是说，要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在理论上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唯心主义，所以没有更多地论述主观能动性问题。到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因而他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毛泽东在延安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主观能动性的理论，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这个概括，突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基本的特点——实践观点和辩证方法。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里，能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关系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他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

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毛泽东既反对了那种认为人只能消极地顺应客观条件的摆布而无所作为的机械论观点，又反对了那种认为人可以不受客观条件限制的盲目的唯心主义观点。

由于种种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求是”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客观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实事”变了，“是”也会变，人们根据实际情况探求事物规律的认识活动也就永远不会停止。因此，实事求是是永无止境的。

第三，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

在延安，毛泽东具体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他特别强调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研究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而深刻阐明了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的必要性。

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只承认事物的位置移动、数量变化，否认事物性质的变化，因而它否认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反，不仅承认事物的位置移动、数量变化，而且阐明事物性质的变化，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自身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因，事物的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外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毛泽东关于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分析，正确地说明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社会自身矛盾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了矛盾普遍性的含义。“矛盾的普遍

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这是辩证法思想史上关于矛盾普遍性的最简明、最准确的概括，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性。毛泽东在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后，着重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特殊性与矛盾普遍性的互相联结。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从大的方面看，有种种运动形态的特殊矛盾，各个事物发展过程的特殊矛盾，各个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事物发展过程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特殊性，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等。事物是无限复杂的，就因为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无限多样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区别与相互关系，也是矛盾特殊性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只能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特殊性中必然具有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互相联结。事物的特殊本质，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上的特征，则是由矛盾发展过程中各阶段上的特殊性决定的。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科学分析，从理论上充分地论证了各国革命都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调查研究中国国情，着重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以及各个革命发展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绝不是哲学教科书中某些观点的简单复述，而是包含了中国革命丰富经验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它与中国革命有着血肉联系。把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加以系统化，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经验结合起来，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的突

出贡献。

总之，实事求是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又包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一句话，实事求是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原理，它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培育了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

第六章　密切联系群众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小米加步枪，何以得天下？人们都想找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获得胜利的“秘诀”。国外一些学者也在探寻这个“秘诀”。有人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其特点是完全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创造力。（马克·塞尔登：《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见《党史通讯》1984 年第 12 期第 44 页）延安窑洞、延安小米、延安人民是共产党人成功的基础。延安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延安小米养育了千千万万个民族栋梁，人民母亲孕育了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曾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1096 页）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

一、群众路线的形成

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相对弱小。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党员只有扎根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求生存、求发展、求胜利。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明确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1922年党的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近代革命运动屡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真正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放手发动群众。一个只有几十名、几百名成员的党，便掀起了有30万人参加的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孙中山正是从这一时期党所领导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页）在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席卷全国，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然而，这时党尚处在幼年时期，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完整地结合起来，以致在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自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瓦解消灭的危险。中国向何处去？党的八七会议提出，发动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群众路线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第一，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出发，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第二，必须使人民群众从根本上翻身得解放。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八十以上，他们最关心的根本利益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必须坚决领导和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只有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真正的翻身和解放，革命战争的开展和革命政权的建立才有牢固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中国革命仍然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第三，革命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主要的不是搞合法斗争，而是武装斗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同上，第136页）为此，毛泽东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同上，第86页）

第四，在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第五，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反复阐述了在工作中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反复论证了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对群众不断进行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同上，第138页）与此同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

第六，初步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1929 年 9 月，周恩来等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 指示信》中，在讲到筹款工作时，强调“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还说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同年 12 月，毛泽东在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也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见 1948 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548 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逐步由军队工作推广到各项工作，推广到工会工作、农村工作、经济工作以及白区工作等方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群众路线看作是我们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经常和普遍遵循的原则。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还没有来得及对群众路线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党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以及党对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加重，党越来越重视自己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注意总结领导群众的经验，从而使群众路线的思想进一步完善起来。1943 年 6 月毛泽东为党中央所写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党的群众路线达到成熟形态的标志。这个决定，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这个总结中，我们党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得到了认真提炼，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精深的理论内容。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步骤，科学地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做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

一个创举。

1945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写进党纲和党章，这标志着群众路线的理论已为全党所接受，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把密切联系群众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态度与正确的方法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以上分析说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在延安时期已经形成与成熟。

二、延安时期对群众路线的理论概括

什么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根据毛泽东的一贯论述，刘少奇概括为四项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

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党自建立之日即宣布：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为各族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

然而，第一次使用“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则是在延安时期。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烈士的会上指出，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的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最广大的人民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各种资产阶级政党，不论其纲领多么好听，它们都是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阶级的局限性，它们的政党也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这一阶级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它受着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什么私有的东西需要加以保护，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天然对立物。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必然是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由此就决定了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必然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那么，如何处理好全局和局部、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根本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呢？刘少奇指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

群众路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5页）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了理论概括。一方面，必须不说空话，多办实事，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使群众认识到党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从而使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斗争。毛泽东曾要求边区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另一方面，为了群众的长远的根本利益，又必须善于说服群众放弃或减少某些暂时的利益。例如在抗日期间，说服农民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只实行减 租减息，以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在私营厂矿企业中，说服工人实行劳资两利政策，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借以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发展经济。这些对工农的暂时利益来说，是放弃或减少了一些，但对保障工农的根本利益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党是他们的利益的最真实最完全的代表，因而热烈拥护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把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为了革命利益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时，就自觉地抛弃个人利益，维护革命利益，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

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需要同时树立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思想。这是因为动机和效果要相一致。有这样的情况，从动机和愿望来说，做某件事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却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树立向人民负责的思想，就

必须用实际社会效果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毛泽东指出："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4页）他又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那么，如何处理向群众负责和向领导负责的关系问题呢？毛泽东提出了"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向人民群众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是来源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人民群众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说，两个"负责"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时两者会发生矛盾，至少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党的领导机关或党的领导干部有缺点错误，他们制定的方针政策不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否则，就是对人民没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不能借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改正。因为任何缺点和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们党员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对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第二种情况是：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决定、指示和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只强调向领导机关负责，机械地、"不走样"的贯彻落实，

而不从实际出发，不去顾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人民群众的情绪、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社会习惯等等，也就是说，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贯彻执行领导机关的方针、政策。这种做法，既不是向人民负责，也不是真正向领导机关负责。真正向领导机关负责同时又向人民负责，就应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三种情况是：群众提出一些落后的不合理的要求，只顾暂时利益而有损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迁就群众意见，满足他们要求，就无法履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职责，就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种做法，既不是向领导机关负责，也不是真正向人民负责。正确的做法是采取疏导的方法，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说服群众、教育群众、启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方针政策。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了我们党的长期群众工作经验后，从理论上概括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1096页）怎样区别共产党人的言论行动既不是命令主义又不是尾巴主义呢？毛泽东提出了两条

标准：一、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二、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他强调，这是“最高标准”。总之，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归根到底，决定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是人民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上，第1031页）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根本区别，也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重要分水岭。历史证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理所应当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自己的天职，把密切联系群众看成是党的生命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总是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批判各种英雄史观的谬论。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热情歌颂了正在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诬蔑，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把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制定了一套人民军队的

建军原则和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抵制和批判了王明轻视农民的革命力量和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批判了王明看不见人民力量，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在敌后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并使革命力量有了极大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国支持世界上最大的反动派蒋介石来势汹汹的进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有些人对美国产生畏惧心理，不敢斗争，甚至主张妥协退让，解散军队。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明确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坚持一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呢？当然不是。这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强调依靠群众的同时，又提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同上，第1098页）这两者是先锋队和群众队伍的关系问题，是核心力量和群众力量的关系问题。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理论上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收集在《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中的158篇文章，其中92篇是在延安写的，占了近2/3。若算上在陕北其他地方写的，达112篇。毛泽东

的智慧从何而来？1944 年 4 月，共产党的挚友续范亭将军指出：毛主席“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 505 页）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意见、办法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了丰富营养。群众的知识最丰富，群众的经验最实际，群众的创造能力最伟大。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90、791 页）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这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

为了真正做到以上四点，必须有正确的领导群众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上，第 899 页）

“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以形成符合人民需要的系统的意见，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到群众中去”，就是把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再回到群众

中去，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工作，使它变为群众的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群众经验、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拜群众为师、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过程。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使共产党的领导方法成为科学，他又用群众路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这条路线唯物辩证地解决了一般和个别、领导和群众等重要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

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又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310页）毛泽东在这里论述的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秩序即“个别——一般——个别”，正是“个别指导——一般号召——个别指导”的领导方法，同时又从辩证法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认识——实践”认识过程的理论。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群众观点引入了认识论，并把他所创立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辩证法的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样，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党的工作路线三者完全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易于被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所掌握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三、群众路线在延安时期的娴熟运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群众路线的理论付诸实践，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她是如何运用群众路线的呢？

第一，根据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党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之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她始终站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抗日战争刚一爆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全国人民和军队总动员，改革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这与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认真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到党的七大时，发展为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通过党的纲领及其对纲领的实践，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最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她最坚决、最勇敢地为维护民族利益而奋斗，于是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而共产党一旦赢得人民的支持，她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二，制定具体方针政策时，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纲领、路线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毛泽东指出：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3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民主制度，拥政爱民；减租减息，扶助农民；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她切切实实地研究和解决“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同上，第564页）。党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并帮助人民提高文化水平……这每一件事，都是关心群众的切实利益。人民群众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因而坚决拥护党。

第三，根据群众斗争的历史发展进程，提出每个时期的纲领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处于从属地位。党根据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对于团结各阶层人民，巩固抗日根据地，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区群众对此已逐渐感到不满足，要求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同时，当时也具备了消灭封建剥削的条件。于是，中共中央便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当时的客观情况，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战以来在解放区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又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后，潮水般地参军、支前，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源泉。

第四，倾听人民呼声，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习仲勋在纪念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故事。1942 年 8 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延川县长刘彩云不幸触电身亡。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劈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他并没有派人追查咒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派干部了解群众“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过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调查清楚原委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 20 万担（每担 300 斤），减至 16 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亲近，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宁高原》，1978 年 12 月 20 日《人民日报》）

解放战争时期，尽管中共中央总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向在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中央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坚决纠正“左”的错误，有效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全国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五，在政治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海外华侨，甚至僧侣，都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如七七事变后，五台山的和尚也要求参军打日本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出家不出国，抗日救国也有我们一份。”在长

期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团结抗战，共同对敌。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促进了人民抗日力量的巨大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指示全党要“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不断发展，并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场的第二条战线。这一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集团，使蒋介石陷入了全民的包围之中。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结果。（《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50 页）

第六，在军事上，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使军队和人民打成一片。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参加战争，在政治上使得敌人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军事上，迫使敌军处处分散和消耗兵力，士气降低，便于我军集中兵力歼灭敌人；在经济上，造成了我军物资供应的来源。毛泽东指出：“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2 页）

为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战争，毛泽东把军民一致列入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1937 年 10 月 25 日，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

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9页）

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挺进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用战斗来开辟抗日根据地，而且用群众工作来建设和巩固根据地，除了人人动手做群众工作外，还抽调大批干部战士组成民运工作团、战地服务团、武装工作队等，分散到广大区域，开展工作。主要是：1. 宣传群众，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必胜信念。2. 组织群众，帮助地方建立抗日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3. 武装群众，组织民兵、自卫军，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4. 建党建政，发展党员，帮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5. 协助政府实现经济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使农民从切身利益中体会共产党的正确。6. 为群众做好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帮助遭受灾难的群众恢复家园。7. 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各部队派出纪律检查组，走访群众，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人民子弟兵的出色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出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打东洋”的生动场面。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发挥了无穷的智慧，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围困战、破袭战等巧妙的游击战法，造成了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第七，在经济上，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克服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要同强大的日军进行艰苦的战斗，而且还要克服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实行集体互助，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所谓组织起来，就是把一切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力和半劳力，只

要是可能的，就统统动员起来，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毛泽东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2页）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成立合作社。集体互助的形式除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一是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二是运盐合作社；三是手工业合作社。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同上，第932页）

第八，在工作方法上，贯彻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的工作中，既善于把广大群众的要求愿望集中起来，化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善于把领导机关的决策化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表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

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即是一例。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期间，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率。议案提出后，反响很大。有人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进攻，提案却要实行精兵简政，岂非束手待擒？甚至有人怀疑李先生动机不良。毛泽东对此提案非常重视，用红笔把重要段落圈了起来，又一字一句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同时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

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毛泽东指出，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他又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中共中央采纳了精兵简政的建议后，规定：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百分之二，党政民系统人员占百分之一。精兵简政政策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后，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同样适用于军事战略指导方面。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作出重大的作战行动的决定之前，不但经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集体研究，而且总是反复征询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同他们磋商。在一个重大军事行动结束后，又总是要求前线指挥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便从中吸取营养，指导新的实践，这样做，不仅使战略指导的正确性有了可靠的保证，而且也能使前线指挥员充分了解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及其精髓所在，更完满地实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娴熟地运用了群众路线的理论，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它使中国共产党象磁石一样吸引了亿万人民群众，保证了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那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有哪些经验可资借鉴呢？

第一，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这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基础。只有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教育党员，才能增强党员干部

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延安时期，党坚持不懈地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教育各级干部，这是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保证。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强调“这是唯一的标准。”这里说的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就是指和人民群众的主体相结合。从此，是否密切联系群众成为鉴别党员干部言行的准则。

为了更好地教育党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1943年1月为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受表彰的同志题词。其中有：“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面向群众”、“为群众谋福利”、“善于领导群众”、“以身作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等。毛泽东还撰写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重要著作，悼念伟大而平凡的战士张思德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使张思德和白求恩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学习榜样。这两篇光辉著作，在中国大地上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在树立无产阶级正确思想的同时，还必须破除非无产阶级的旧思想。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对危害党群关系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军阀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揭露和批判，使它们有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藏身之地。正面教育和克服错误思想的有机结合，使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在党员干部的思想深处牢牢地扎下了根，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第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是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保证。中

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指出，按照这个制度，“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9页）这就保证了“从群众中来”。另一方面，我们党的所有的组织都是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的所有党员，又都是群众的宣传员、组织员和骨干分子。党的方针、政策与决议决定之后，又要交给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去贯彻执行，这就保证了“到群众中去”。因此，刘少奇又指出：党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同上，第359页）。健全民主集中制，可以为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提供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第三，加强廉政建设，它直接关系到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决定着人心向背。

首先，健全制度，制定法规，确保廉洁。毛泽东和王稼祥亲自签发《中央关于严格遵守财经制度的通令》，严禁贪污浪费。各根据地逐步完善了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预算决算制度、报告制度和统一贸易制度，从而严格划分了收入、支出、保管、审核四大系统，并使其相互牵制、相互制约，使贪污浪费者不易有可乘之机。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贪污行为，一些根据地还颁布了反贪污法。如1938年8月15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3年3月13日公布了《淮北苏皖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前者规定，贪污千元以上者处死刑；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贪污500元以下者，视数量多寡，分别处以五年以下不等有期徒刑或苦役。并规定，共

产党员有违法者从重治罪，党龄、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赦罪、开脱的借口。

其次，严惩腐败分子，毫不手软。某团政治委员刘振环，参加过反“围剿”战斗和长征，在平型关战斗中身负重伤，荣立战功。但后来贪污公款，被八路军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开除党籍，并受到法纪制裁。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惩处了王华亭等贪污腐化的党员干部。这些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提高了党的威信。

再次，建立监督机构，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各级干部的监督。一是各级参议会的监督。参议会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复决之权，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员的职权。边区各级政府是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的并受参议会之监督。参议会选举政府委员时，代表们对候选人民主评议，热心为公者褒，以权谋私者贬，选优淘劣，扶正抑邪。参议会尽监督指导之责，对改进政府的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人民利益如受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同时，各级参议会派干部到群众中开座谈会、调查会，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一旦得到群众反映有公务人员违法乱纪以权谋私，便立即处理，决不姑息迁就。三是党内的监督。首先是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加强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中共中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其次是严肃党纪，从严治党，防止党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

最后，党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深入群众，艰苦奋斗。毛泽

东在延安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时常背上粪筐积肥。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也都能模范地遵守财经制度，不搞特殊化。

许多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了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无不为之感动，他们赞叹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官。”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感慨地说：“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

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与国民党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在七大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8、1049页）事实上，抗战后期国民党发国难财、贪污腐败，已经孕育着日后失败的种子。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变本加利，通过接收沦陷区敌伪财产等手段，竭尽全力对人民进行洗劫。据估计，1947年前后，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共达100亿到200亿美元。他们的财富不都在国内，很大一部分分散在美国、西欧、南美各处。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剥削压迫人民、只为一党一派谋私利的反动本质。毛泽东指出，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败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他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页）

1947年春，国民党集中23万军队向边区进攻，直逼延安。有的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安危，劝他离开边区。毛泽东说：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在战斗中，人民群众为我军封锁消息，保守秘密，蒙蔽敌人，侦察敌情。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在敌军尾追下，先后在陕北37个村庄居住，居然安然无恙。一次，毛泽东刚离开居住了58天的王家湾，敌刘戡部就开进了王家湾，司令部恰巧设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当地群众守口如瓶，刘戡始终不知道毛泽东就在此地住过。而刘戡部队一走，当地群众立即将其丢失的作战命令送给我军。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时，他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这里！

革命战争的胜利靠的是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靠的是人心向背。这种情况，连敌对营垒里的一些人也不能不承认。亲蒋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中说过：与国民党“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形成强烈对比，“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纪律严明”，“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

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克敌致胜的法宝。刘少奇说得好：“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34页）。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艰难困苦不可怕，残暴的敌人不可怕，经济封锁也不可怕，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就象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安泰，一旦脱离了生育和抚育他的母亲——大地，就失去力量的根基，而招致失败。由此可见，毛泽东培育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是党的生命线。

第七章　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发展和党的事业胜利前进的有力武器。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党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更加深化，实践经验更加丰富。经过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总结和概括，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和完整了。毛泽东把它与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相并列，称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从此，它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4页）。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勇于批评别人，而且欢迎别人批评自己。马克思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列宁也经常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大意义，他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

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早在党的初创时期，党的一大制定《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以及党的二大、党的三大讨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问题时，就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统一了大多数同志的思想，制定出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件，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在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激烈，把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曾对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论述了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依靠农民的重要性。但是，陈独秀却在党内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不允许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坚持右倾错误。在党的五大上，毛泽东、瞿秋白、任弼时等，都曾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陈独秀虽然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立场。他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进行坚决的斗争，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在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中国共产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彻底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认为，党中央犯的一个重要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全党“要非常注重军事，须

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 年 8 月 7 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示了新的出路。如果不是八七会议对过去的错误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批判，要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的转变，是不可能的。

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指出，必须着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路线来教育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具体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一是必须明确“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二是要严格区分党内批评与党外批评的界限，“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三是不要纠缠那些与政治错误与组织错误无关的个人缺点，“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四是“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90—92 页）毛泽东写的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初步形成。

1931 年 1 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为了贯彻其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在组织方面他们大搞宗派主义，对于坚持正确原则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使用对待罪犯和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对待党内同志，造成党内极为痛心的损失。第五次反“围

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重大挫折，标志着王明“左”倾路线的失败与破产。在1931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尖锐地批评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并阐述了正确的军事方针。经过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问题，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这次会议正确地运用党内批评这个锐利的武器，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在延安中共中央对于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及时的批评和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军队。1938年秋，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如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没能在抗日战争初期得到克服，中国共产党便很难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艰巨任务。

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在总结党内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批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和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著作。例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的《论干部政策》、《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等。这些著作，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以及开展批评的正确方法，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政治思想影响，

适应教育新党员和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42年春起，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延安整风的根本方法是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通过检查工作和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也是党内广泛而深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著作中，深刻剖析和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在党内普遍严重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有组织地反驳错误思想。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占多数的地方，错误思想一出来，居然没有人出来反驳。有了错误的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坚持原则性，应该立即起来反驳。允许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这是一，对错误的意见组织反驳这是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他又指出，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应当是：第一是团结，第二是有了错误要进行批评。（《红旗》1988年第23期第7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从中央领导同志到各根据地的领导干部，以至一般党员干部，都认真地总结了“左”倾路线的危害，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和相互间的批评，从而达到了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团结同志的目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党内扎下了根，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根据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做了理论概括，第一次明确地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七大党章也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

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第54页）党章在党员权利部分，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就以完整的形态形成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是伴随着党的日益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它又对党的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很难成熟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是相伴形成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我们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就能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延安时期的显著特征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从党成立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几年时间里，虽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准则，但还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作严格的论证，在行动中曾经出现过“左”的和右的偏差，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延安整风中，深化了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的认识。在理论上，对于马列主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理作了重要的发展和创造；在实践上，对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了更加完整的系统总结，其具体表现是：

（一）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把它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方法

毛泽东在七大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

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所特有的作风，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党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党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使我们党勇于接受各种批评意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坚强有力的表现，而资产阶级政党是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是既不敢又不可能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

共产党所以能够认真地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因为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政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要求用两分法来分析事物，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既要看到成绩的一面，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的一面，只有不断克服缺点和错误，才能把工作推向前进。历史唯物主义则要求认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具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不敢正视现实，总是歪曲和掩盖现实，在他们夺取政权时，需要利用人民群众，而当他们夺取政权后，就马上把人民群众一脚踢开。他们不可能真心诚意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政党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党内总是存在着先

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它们有的是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有的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有的则是认识上的矛盾。党的进步就是建立在这些矛盾的不断展开和不断解决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指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党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用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地清除和克服自身的缺点、错误和落后的东西，保持和发扬优点和先进的、正确的东西。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党就失去了活力，就会变质，以至最终停止自己的生命。

1942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中，曾经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上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说明和强调。他说，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分析。批评就是实行分析的方法。工作是一个整体，对它加以分解，指出成绩和缺点，发扬好的，去掉坏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对别人进行批评。如果自以为是，对自己的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不讲缺点、错误，这样就无法使工作进步。有些犯主观主义错误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红旗》1983年第23期第8页）在延安整风中，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

（二）提出了正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总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批评有两种。一种是符合实际并且用正确方法进行的批评，一种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且是用错误方法进行的批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同时又针对整风当中在批评

问题上出现的偏向，提出了关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一个总的方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以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和批判，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其二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要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真正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批评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是前提。但是，不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是非弄清，要达到团结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团结同批评的辩证法。这个方针提出通过批评来解决党内矛盾，而不是回避或调和矛盾。同时，这种批评是以团结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这样做就能达到既弄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正确解决党内矛盾。

毛泽东提出的总方针是我党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在回顾“左”倾教条主义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严重情况时指出：用党外斗争方法，“对敌人对异己分子斗争的方法，来向党内的同志斗争，用对付敌人与异己分子的办法，来对付党内的同志。一切挑拨离间，阴谋诡计都使用出来。把监视、逮捕、监禁、审判等办法也运用到党内斗争中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96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历史证明，在解决党内矛盾时，采用对敌斗争的办法，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企图压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这是完全错误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

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由于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党的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党达到了空前团结统一，党成熟起来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经指出：从延安整风的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伟大的成功。”（《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76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延安整风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提出了正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

延安整风的实践证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要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且要有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只有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才能保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贯彻落实。

第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必须弄清事实，以事实为依据，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掩盖。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

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

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石，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而且也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在开展批评时，必须“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问题弄清楚，实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因为，“只有客观的铁的事实，只有在实践中已证明了的经验，只有真理，才能够战胜一切。”（《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09、210页）

开展批评，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决不能凭主观臆想，凭个人好恶，或者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地看人看事。开展批评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错误的态度对待同志的缺点，不仅达不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而且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总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必须“要用对党对革命最高的负责态度来进行”（同上）。

第二，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是指批评的态度要好。对自己的同志必须是同志的态度，不能搞冷嘲暗箭，更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毛泽东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腐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也指出：“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的不对立，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

则上的一致。”（《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0页）

第三，充分说理。

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对待思想上的问题，要充分说理；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

开展批评时，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和环境。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责任。在延安整风中，处理历史问题时，不是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是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经过充分的说理，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收到好的效果。

刘少奇指出：“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为了要讲清楚道理，要能讲清楚道理，党内民主就是必要的，平心静气互相商讨的作风就是必要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6页）这些论述，都是历史经验的结晶。

第四，要抓主要矛盾。

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322页）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主要解决的是政治立场、政治原则、组织观念、群众

观念等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芝麻西瓜一起拣。”刘少奇说：“指出与批评别人的错误要抓住中心，要着重最重要的问题，给以系统的明确的解释，才能解决问题。而不要枝枝节节地搜集人家许多错误的现象，及似是而非的事实，简单给以暴露了事。”（《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2页）

第五，要适度。

刘少奇指出：“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尺度。”“适当的批评，适当的态度和适当的方式，反对‘过’与‘不及”，这就是我们在党内斗争中所应采取的方法。”（同上，第211、212页）任何事物，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有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即度，超过了度，就会发生质变。真理再进一步就会便成谬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言过其实，无限上纲是不行的；轻描淡写，不痛不痒也是不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适度，要坚持严肃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是延安时期的又一特征。

第六，允许申诉。

刘少奇指出：“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在给同志做鉴定和组织结论的时候，通常均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结论。如果他不服，在经过辩论之后，应向上级申诉”。“党员的上诉权不能剥夺。一切的上诉书，任何党的组织不能扣压，关于思想原则问题，党员并可越级直接向高级党委或中央上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3页）

允许被批评者申辩，这是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因为，就批评一方来说，他们的批评不一定都十分准确。不允许申辩，是不利于弄清事实，使批评收到好的效果。就被批评者一方来说，申辩得对，有利于弄清事实；如果申辩得不

对，并且无理狡辩，那就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缺点，有利于更好地对他进行帮助，这样，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分越清。允许申辩，这也是延安时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个特征。

刘少奇还进一步指出："在思想原则问题上，经过争论之后，如果还未在党内最后取得一致，是可以通过多数决定的。在多数决定之后，少数同志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在组织上行动上绝对服从多数的条件之下，是有权利保留自己意见的。"（同上，第213页）

第七，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

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指出，在整风学习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明哲保身，有话不说是不对的，"避开自己专攻别人的态度也是不对的。"这就是说，既要敢于开展批评，又要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批评重要，自我批评更重要。没有自我批评，批评就会落空，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这是因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延安整风中，党员干部严于解剖自己，主动地揭发自己的缺点错误，勇于进行公开的诚恳的自我批评，有效地抵御了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

第八，讲真理不讲面子。

妨碍自我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怕失身份，怕丢面子。因而陈云在党的七大发言中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218页）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有讲真理不讲面子，才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开展起来。“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同上）。假如不讲真理，只讲面子，为了保住面子而背弃真理，那怎么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起来呢？

讲真理，不讲面子，就是要破除个人私心杂念，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勇于为真理而斗争。陈云指出：“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么办。”（同上）毛泽东在七大发言中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1097页）讲真理，不讲面子，是延安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又一个显著特征。

第九，防微杜渐，勤于“洗脸”。

防微杜渐，勤于“洗脸”，就是指要经常地及时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

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这是因为“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所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935页）。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经常地、及时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而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使党的事业得到迅猛发展。

第十，领导带头，身体力行。

在延安的岁月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从理论上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大意义、方针方法，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3年在审干过程中，在康生主持下搞了个“抢救运动”，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立即纠正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在一些场合多次公开向同志们脱帽鞠躬，赔礼道歉，毛泽东诚挚的态度，驱散了罩在人们心头的乌云。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长江局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工作中也有失误，在党的七大发言中，周恩来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他又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引以为鉴，周恩来襟怀坦白，严于律己的自我批评精神教育和影响了与会同志。

刘少奇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

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相反，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肯或惧怕批评自己的缺点与揭露自己的错误，企图掩盖与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在别人批评后不表示感谢别人，不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而是面红耳赤，反口相讥，或寻隙报复，那么，那里的党员和人民中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开展，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内部团结就不能达到，缺点不能克服，工作不能进步，负责人的威信也就会丧失。”（《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64页）

领导带头做自我批评，使人们能自觉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是延安时期的又一显著特征。

综上所述，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既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一整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历史作用

延安时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在党的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纠正失误，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在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失。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我们党运用批评的武器，初步纠正了王明在十年内战后期的“左”倾错误以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在全党范围内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使广大干部进一步从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什么是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从而使广大党员的精神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也批判了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思想，克服了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样，就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

（二）加强了团结，克服了宗派主义

遵义会议以后，虽然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其残余依然存在，例如，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一部分干部与那一部分干部之间、这一部门和地区与那一部门和地区之间的不团结，等等。尤其是闹独立性的人，他们自以为比中央还高明，一心只想少数人的利益，忘记了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过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大家认识到要实现全党的统一，仅有思想上的统一是不够的，还需要组织上的统一，以组织上的统一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宗派主义是随着主观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反过来它又维护主观主义领导的统治，助长主观主义的发展。因此，宗派主义是应当坚决反对的，它破坏党的统一，损害党的团结，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是根本不相容的。这样，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存在于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问题得到了正确解决。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之间，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了正确处理的原则和方法，相互之间的团结大大加强了。

（三）培养教育干部，增强党性锻炼

延安时期的历史证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培养教育干

部、增强党性锻炼的有效方法。没有缺点和不犯错误的人是从来没有的。对缺点和错误加以揭露和批评，分析其产生原因和危害，指出改正方法和努力方向，这是非常生动实际的教育。这不仅教育了本人，也教育了其他同志，使大家都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犯类似的缺点和错误。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效地防止了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使广大干部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了有自知之明，绝大多数干部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自己，既肯定和发扬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又看清和克服了自己的短处和缺点，明确了今后前进的方向。这好比经过名医会诊，给自己的思想病开了一个对症的处方，对一生的健康成长大有好处。因此，有的干部深有体会地说："可以说以后大半辈子的工作，靠的就是这段学习得到的'本钱'。"（《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第86页）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经过他们，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使我们党能够经受得住任何艰难险阻的考验。

第八章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而得出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支援。但是，要完成这个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畏艰苦，顽强奋斗，把本国的事情做好。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中国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排除万难，同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同党内出现的阶级投降主义和党外出现的民族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领导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全国革命胜利。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建党以来革命斗争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环境的需要，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充分体现了延安时期一代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是延安精神的主要标志和根本内容。

（一）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南部近三十个县，土地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五十万。陕甘宁边区的北面和鄂尔多斯沙漠相连，南面伸延到渭河流域边缘，西面紧接甘宁高原和六盘山山麓，东面以黄河与山西为界，平均海拔高度达一千余米。

由于地处黄土高原，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大部分地区是漫漫黄土和滚滚流沙。这里气候恶劣，春季多风，夏季多冰雹，秋季降霜早，冬季冰雪覆盖。旱、涝、雹、冻等灾害接踵而至，连绵不断。再加上红军到来之前，军阀、官僚、地主、土匪的横征暴敛，造成了这一地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工农业生产很不发达。劳动人民终年辛劳，难得温饱，长期过着“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垒补钉”的艰苦日月。红军初到陕北后，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钱，一元钱的月薪，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毛巾、鞋袜等都无钱购买，并且还面临着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剿”。更何况红军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休养生息，而是北上抗日，这就需要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来进行英勇的奋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的进攻，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推行5次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的“总力战”，其目的是妄图隔绝和消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打击和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实力，以便牢固地控制它的占领区。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实行

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毁坏了大量的可耕土地，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以防人民军队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抗日根据地，采用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使华北一些抗日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于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进攻，以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2—943页）

与此同时，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虽未像汪精卫集团那样公开投降，但也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和动摇。他们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他们不仅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在陕甘宁边区集结了胡宗南部30万人，构筑了三道封锁线，一万多个碉堡，进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扣留海内外爱国人士支援边区的一切钱粮物资，阻挠边区的对外贸易，妄图困死、饿死边区军民，达到不剿自灭的目的。这些都给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穿的都是补丁衣，吃的都是黑豆、秕糠和野菜。许多指战员因饥饿引起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在寒冬腊月、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的战士们仍然穿着夹衣，打着赤脚。由于内部生活的

困难和外部敌人的进攻，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消弱。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到1942年的30万人，新四军由13万人减到11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大大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千万以下。这种严峻的困难局面，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二）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

中国共产党要在上述环境下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需要伟大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为此，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实际问题，在总结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了大量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一开始就表现得比较明显，并在重大的革命转折关头起到了伟大舵手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指导思想提出和运用是在延安时期。在这之前，由于王明的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还不能为全党所接受，我党也还不具备运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条件。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之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的问题才成为可能。特别是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规定今后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国情制定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有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贯彻到了各项革命事业之中，并在许多文章中进行了论述。1937

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军事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国共关系方面，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之后，为了从战略思想上批驳一些人轻视游击战之战略作用的错误，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集中而系统地论述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1938年9—11月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在1939年9月，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在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过程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文章，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已成为延安时期全体党员的共同行动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理论与实践在延安时期已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一致行动，在这之前尽管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号召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是，这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王明的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有统治地位，不少党员还在围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到抗日战争时期，王明于1937年11月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到延安，到延安后仍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提出一整套右倾投降

主义的错误主张。对此，毛泽东以及党内的其他同志给予了坚决的抵制、批评和斗争，很快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这充分表明毛泽东思想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和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已为全党所接受，同时也证明了全党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不仅为延安时期的全体党员所接受，而且成为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行动，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使之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成为伟大的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依靠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耕耘收获，繁衍生息，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以简陋的工具围猎捕食，与凶猛的野兽进行搏斗，以树叶岩洞遮风蔽寒。在我国文明的史册上，记载着无数艰苦奋斗的动人事迹。如：大禹治水、短衣草鞋，昼夜不息；张骞通西域，不畏艰险，含辛茹苦；郑和下西洋，前后 28 年，往返 7 次，纵横 10 万海里；唐玄奘取真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等等。尽管动机不同，但却反映了我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劳俭朴的思想品德。这种精神世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

基石。

自从1840年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便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着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斗争中，不少志士仁人为使祖国独立、富强，不远万里到西方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为革命在国外奔波劳碌了大半生，其结果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得而复失，并没有得到来自西方的“先生们”的支持。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既定方针是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而不是使中国走独立富强的道路。血的教训使我们终于明白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打败帝国主义，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这是对中国革命百年求索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下，在祖国沦亡的危难中诞生的。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确定了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否则只有失败。这一点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着成功的经验，也有着沉痛的教训。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完全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放弃了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看不起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妄图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其结果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那些意志薄弱、目光短浅者被反革命的屠杀政策吓破了胆，他们在艰苦和困难面前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的退党，有的投敌。大浪淘沙，真正的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在血的教训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于是南昌起义，秋

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各地武装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黑暗中国的夜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反对本本主义的呐喊，给在苦难中奋争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了各地武装起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独立自主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一条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但这条道路违背了国际指挥的原则，突破了城市暴动的样板，为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所反对。他们处处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满足于背颂马列主义的词句，企图依靠别国的经验和国际的指挥来进行中国革命，不研究中国的国情，不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其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险些断送了革命，断送了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血的教训，再一次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于是才有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革命危急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是独立自主原则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开始。

另外，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延安时期的实践特征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陕北十三年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和发展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久，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派往华北的侵略军，从15万逐渐增加到30万，是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并且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下，气焰十分嚣张。面对日寇的强大攻势，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的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军队打正规战，其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华北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这时八路军只有武器装备很差的3万多人，如果和敌人硬拼，打运动战必然会失败。因此，八路军开赴华北后不是集中在一起打大仗，而是遵照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组成许许多多的带工作队性质的游击队，深入敌后，动员和组织迫切要求抗日的群众，开辟敌后战场，进行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建立起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19块抗日根据地，建立起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使日本帝国主义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非烧死不可。到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发觉自己的后方遭到抗日游击战争的严重威胁，不得不把其主力转移到后方来扫荡各解放区。这样，解放区的军民在既无外援，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部侵华日军的60%以上，成为坚持抗日的中坚力量，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是我党独立自主原则在抗日问题上的充分体现。

（二）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并经过巨大努力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因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而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它关系到抗日战争由谁领导，依靠什么力量，能否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大原则问题。为此，我党坚持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由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促进了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发展，使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得以在八年抗战期间保持下来；使我党既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在抗战期间充分发扬了民主，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实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这一原则的提出、实践和坚持，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

（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一个党向另一个党发号施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更加成熟和发展，并为全党所接受。这期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蒋介石抗战的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才有力量抗战到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专门召开的关于中国抗战问题的会议上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王明

带着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政策回到延安后，便系统地提出一整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抹煞两条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完全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的结果，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思想路线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次党和毛泽东同志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同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并派人直接向共产国际申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使王明的右倾错误只在局部范围内影响了党的工作，并很快加以克服。到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的右倾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上来。很显然，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实际上是对共产国际错误指导路线的抵制。

还有，在延安整风期间，季米特洛夫根据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向莫斯科反映的大量无中生有和毫无根据的情报，给毛泽东写信，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要“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出在党之外”。对于这种歪曲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干涉我党内部事务的行为，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给予了正确的处理。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请他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做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的工作，向他说明中共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情况，不要做歪曲事实的汇报，不要干涉中国内

政。在这个问题上，党和毛泽东同志既坚持了原则，又维护了友谊和团结。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苏联领导人由于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性质，认为中共不应也无力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让我党放弃武装，加入国民党政府。而且为了寻求对美国的妥协，不断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要中国人民切勿进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仍持怀疑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面对着来自国际上的这种压力和迫在眉睫的国内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提出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顶着了"不准革命"的错误干涉，依靠人民的力量，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决战，终于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四）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

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而又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下，从1939年起、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大生产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到1941年形成高潮。这年初，八路军120师359旅的全体指战员在王震同志的率领下，开进了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这里是延安的南大门，方园100平方公里古木丛生，到处是一丛丛、一簇簇带刺的荆棘和盘根错节的山桃树，并常有野兽出没，给部队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然而，他们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响亮地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战斗口号。没有农具，就用废铁自己制造；没有房子，就地搭窝棚、挖窑洞，甚至野外露宿；没有粮食吃，就挖野菜，摘野果，打猎充饥。战士们每人只有一套破烂不堪的衣服和难以御寒的单薄被褥。就这样，他们起早摸黑，开荒种地，全旅上下，从旅长王震到公勤员、随军家属一齐行动起来，尤其是干部们的表率作用，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旅长王震吃苦在前，成绩卓著，被评为劳动模范；团长陈宗尧患了重病也要坚持完成开荒任务；政委左齐因在抗战中失去了左臂不能挖地，就帮炊事员烧水、做饭，并挑送上山……。在干部们的带领下，战士们你追我赶，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忘我劳动场面。他们早起晚归，披星戴月，每天劳动 10 个小时以上，使领导不得不做出“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的奇特规定。模范班长李位在一次开荒竞赛中，经过 11 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创造了日开荒三亩六分七的最高纪录。一位老农赞叹说：“二头牛一天才能耕二亩地，他一把镢头就能挖三亩多，真要气死牛了。”“气死牛”李位式的人物在南泥湾层出不穷，他们用惊人的毅力创造着非凡的业绩。

经过二年多的艰苦奋斗，到 1943 年，359 旅开荒 10 多万亩，种植了粮食、棉花和蔬菜，做到了粮、菜自给有余；还养了九千头的猪、羊和数百头的牛，平均每人每月可吃到 3 斤肉；建设了新窑洞和平房，并组织家属纺线织布；使全旅兵强马壮，衣食住行样样齐备，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稻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鱼鸭满池塘”的陕北江南。1943 年 9 月，毛泽东在视察南泥湾时高兴地说，同志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同志们越胖了。还说，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在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边区军民白手起家，先后创办了纺织厂、兵工厂、石油厂、化工厂、造纸厂、火柴厂、肥皂厂等许多小型工厂，使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1938年到1944年，边区的工厂由4个发展到77个，从业人数从65人发展到1.2万人，这些工厂的创建和发展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大光纺织厂厂房是木桩子和破帆布支起来的；机器除了从山西购买的四架铁机外，是边区修械所纺造老太太的纺车造成的小木机；工人是从部队抽调的一部分战士。炼铁厂也是自己动手打窑洞、盖厂房、修炼铁炉。没有耐火砖，就用陕北的白坩磁土代用，没有焦炭，就用木炭来烧。就这样在一无设备，二无技术工人的情况下，边学边干边试验，经过27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终于炼出了铁。

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生产的产品不仅部分或全部地满足边区军民和工作人员生产生活的需要，还远销外地，换回布匹、药品等，使延安的商店由抗战前的123家发展到1943年的473家。

在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劳动，亲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为军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他们的带动下，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

大生产运动是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凯歌。通过大生产运动，有效地克服了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物质困难，保障了抗日经费的供给，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显示了我党抗战建国的

毅力和才能，提高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建设工作的人才，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五）艰苦奋斗，转战陕北，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1947 年 3 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我军粉碎后，集中 90 个旅近 70 万军队向山东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集团调集 23 万兵力，在空军和地方军阀的配合下，向党中央所在地猖狂进攻，叫嚣三天之内攻克延安，摧毁中共指挥中心。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及延安军民在西北野战军的掩护下，有组织、有秩序地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同敌人周旋，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转战陕北的一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在这一年多的严峻日子里，党中央毛泽东和军民一道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几乎每天都是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度过的。白天行军，太阳象贴热膏药，紧紧贴在身上；夜里行军崖陡沟深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山涧里去；遇到暴雨，眼睛睁不开，气也喘不出来，衣服湿得贴在身上冷得发抖；并时常和敌人擦肩而过，有时竟与敌人同宿一山，山下是安营扎寨的数万敌军，山上便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他们和老乡一样吃整黑豆、整玉米、小麦粒、粗高粱、米糠做成的糠窝窝等。为了调动敌人，并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他们跋山涉水，穿越了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 12 个县行程 1000 多公里，先后在陕北 37 个村庄居住，胜利地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沙家店、宜川等战役。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彭德怀同志指挥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

人的鼻子爬山越岭，如蛟龙戏水，游行于千山万壑之中，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通过上述战役敌人被我军打得丢盔弃甲，我军取得了歼敌7万余人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重点进攻。

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又指挥人民解放军，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延安时期的理论特色

（一）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

独立自主强调的是事物的独立性、与它事物的区别性，即事物的特殊性。只有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掌握各个矛盾的特殊本质，才能科学地认识各种事物，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事物之间这种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决定了一事物与它事物既是联系的，又是独立的。因此，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根本性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自力更生与独立自主是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保持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执行。所谓自力更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希望

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也即是，客观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外部，而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是事物运动发展的第一位原因，一事物和它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还在《实践论》中强调，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中国人民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夺取胜利。

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所谓艰苦奋斗，即不畏艰难困苦，同一切困难作坚持不懈的斗争。艰苦奋斗的关键在于“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私利，甚至生命。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延安时期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二）从中国国情出发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了解和掌握国情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任何人背离国情去主观臆造各种美好的社会改革方案，都将会遭到失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坚持了以正确的国情分析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毛泽东对民主革命时期国情分析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

首要问题。”只有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明确敌、友，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延安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毛泽东对各个阶级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全面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在我党的推动下形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在统一战线内存在着两条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抗战指导路线。我党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路线，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军事战略策略上的独立自主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始终在敌强我弱、外援极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便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夺取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人们一提起延安精神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是在延安最困难的时期，在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的严峻形势考验面前的唯一选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伟大的延安精神，这是当时的国情决定的。我们必须牢记毛泽东的话：“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三）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党的群众路线，是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力量源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邓小平指出："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邓小平文选》第327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是正确处理阶级、政党之间关系的理论原则

在中国革命中，如何处理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这是为抗战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失败的教训所证明了的真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要取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要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统一与独立的关系，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阶层、政党之间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始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并"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不是执政党，不掌握全国的政权，但却在争取抗战的胜利斗争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关键就是因为共产党提出并贯彻执行了唯一能使抗战取得胜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看到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抗战的要求和行动，又看到了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未因抗战而改变。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仅是正确处理国内阶级、政

党之间关系的理论原则，也是正确处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因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主要任务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故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间，既有互相影响、互相援助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着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独立性。如何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对这个问题处理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对共产国际采取了尊重和团结的态度，对苏联党和政府采取坚决支持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把独立自主作为我们的国策，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322页）党的十四大再次重申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出："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总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和思想武器。

第九章　民主团结

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它不仅是指政体，首先是指国体，指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团结，可以说是一种力量的结合，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或完成共同的任务而实行的联合或结合。民主和团结是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团结，只有高度的民主，才能有广泛的团结。民主团结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理想，也是实现美好理想的路标。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封建专制为敌，为中国的民主团结而呐喊和奋争。到了延安时期，红军时期民主团结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完善，无论是民主团结的范围、内容、形式，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民主团结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时期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延安时期的团结，是以抗日为前提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最民主、最团结、最进步的地区，成为激荡全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

（一）民主团结是延安时期革命斗争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空前深重的灾难，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使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陷入破产和失业境地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抗日和民主。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日益衰落，迫使民族资产阶级也转变了政治态度，表现了对蒋介石反动政治的绝望，要求停止内战，保障人权，全国一致对外。国民党营垒内部也发生变化。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为此，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之后，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促成了民主精神的发展和成熟。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没有团结，便无从抗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真正的民主和坚实的团结是不行的。必须把政治制度上的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才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解放区战场成为民族抗战的主要战场。面对日伪的残酷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另一方面搞好根据地建设，通过延安整风，增强党内外的民主和团结，统一全党的思想，以便更好地战胜困难。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举国上下人心思安厌战，向往团结统

一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政策，为和平民主而斗争。

（二）民主团结是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

当资本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禁固的大门之后，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怒吼，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觉醒，也使人们呼吸到了一丝民主的春风。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的变法维新，要求以西方的君主立宪代替中国的封建专制，这无疑是开近代中国民主运动之先河。辛亥革命宣告了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治国方略，使中国有了总统、内阁、政党和国会。然而，封建专制的污垢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清除掉的，这些西方民主的形式很快成为徒有虚名的北洋军阀掌中的玩物。在为民主团结而呐喊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联合起来，掀起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使民主团结的大潮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呼啸着前进。不幸的是，这一革命的洪流，这民主团结的火花，又遭到了国民党新右派分子蒋介石的扼杀。蒋介石背叛了民主，分裂了团结，枪杀了大批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共产党人，关压监禁了无数爱国民主志士。“四一二”大屠杀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却无法阻挠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大革命时期“劳工神圣”、“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民主火花，在工农武装割据下的红色政权区域更加习习生辉。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的苏维埃政权，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但是，由于蒋介石百万大军对红色政权的一次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连续干扰，影响了党内的民主团结，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贯彻执行。不仅严重影响了党的发展，而且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遵义会议后，特别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全党为之奋斗

的民主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有了更大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民主团结的内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在延安十三年，我党始终高举抗战、团结、民主的大旗，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精诚团结，并肩战斗，无论是在边区的政权建设上，还是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都实行了广泛的民主，吸收各界爱国人士和开明士绅参政、议政，使边区政府成为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党内生活中，切实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使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党政军民相互之间，彼此尊重，密切合作，处处是一幅幅民主团结的画卷，事事都在演奏着民主团结的战歌。共产党人为之不懈追求的目标在这里真正地体现出来，并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毛泽东民主团结的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行动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民主团结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民主团结的论述在他的许多文章及书信中都可以看到。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强调了“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问题，指出：“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中

外人士访延安纪实——封锁线内的真相》第70页)。对于团结，毛泽东首先强调搞好党内的团结，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七大的召开，使我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另外，毛泽东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的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这一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也以他个人的影响，给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写了大量的书信，竭诚呼吁团结抗日。便如，在给傅作义的信中说：“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在给冯玉祥的信中说：“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希望他积极支持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希望他“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这些书信以团结抗日为主题，倾注了极大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为实现合作抗日的真诚努力。

毛泽东的民主团结思想，在延安时期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实践中形成了民主团结的延安精神。

二、民主团结在延安时期的体现

(一) 在边区政权建设方面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民主精神

首先，实行了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自由的民主选举制

度。从1937年7月开始到1946年初，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普选。根据有关条例，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因为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只要不反对抗日，不破坏抗战，不分阶级，社会和政治背景，一律享有民主选举的权利。在选举的过程中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制约。老画家彦涵的版画“豆选”充分体现了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精神：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各放着一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男女每人都攥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地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就把豆子放在谁的碗里，最后由得豆最多的人当村长。用这种简陋粗糙的方式表达了农民们几千年来渴望得到的权利。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高度评价了解放区的选举制度，他说：“当我把选举和旧日国民党统治下的选举比较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选举是诚实、自由、平等，绝没有旧日的贿赂、强迫、暴行等现象。”通过这种民主选举，使各阶层、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和公正人士被选举出来，使当选的参议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权威性。

当时的参议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级政权的最高机构，其职权：选举，罢免各级行政首脑；监察弹劾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公务人员；制定各级法规；审核通过各级政府预决算；批准各级政府的各项计划、措施。参议会既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组成参议会的参议员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每次民主选举，边区人民都象过节一样，隆重庆祝并积极参加选举，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

其次，为确保民主政权的广泛性，各级参议会和各级政府都严格实行“三三制”的原则。

为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推进全国的政治民主化，1940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提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机关人员的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对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充分体现我党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克服一部分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改善党内外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共中央强调：我们所要的是活泼的、有组织有能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受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多方。毛泽东也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60 页）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三三制”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一批党外有威望有才能的民主人士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如党外人士安文钦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选为副议长，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 29 个县中，有 3580 名党外人士担任了县长、科长、乡长等领导职务。在选举时共产党的名额若超过三分之一便立即退出，超几个退几个，严格执行“三三制”。如 1941 年 11 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 7 人，超出了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递补一名党外人士。1942 年，晋西北召开参议会，共产党员在 145 名参议员中占 49 人，超过了三分之

一，遂退出 2 人，为 47 人，不足三分之一。环县在 1941 年选举的 11 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有 8 名，在 1942 年改选时按“三三制”的精神退出 5 名，使 9 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 3 名，符合“三三制”。对此，李鼎铭先生很感动，他说：共产党方面限制自己的侯选人，并且反转来替各党派、无党无派提出侯选人，替各阶层提出侯选人，为他们竞选，外头哪得有这种情形？许多党外人士也都感动地说：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相让的精神。

第三，鼓励参议员和边区人民积极实行民主参政。

为使参议员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力，有关条例规定：参议员在会上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不受任何限制，在会议上发表的言论，对外不负责任。各级参议员在任期内，除现行犯外，不经各级参议会或常驻委员会的许可，不得逮捕或罢免。这就为参议员的民主参政提供了法律保障。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 页）。

起初，在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的思想，在和党外民主人士相处中，表面上敬宾以礼相待，思想上还是有些讨厌。在一些非党人士看来，“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基本群众在共产党一边”，存在着作客思想和观望态度，对是否有职有权，则拭目以待。如 1943 年上半年，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政务会上，总是很少发言。他不说话，其他党外人士也就默不作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每次都问他：“李老，您还有什么意见?”他总是说：“俺没意见”。但到批发行文时，他又不划行表示同意，反映出他口称“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林伯渠觉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让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 汉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李维汉和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李鼎铭坦率地说：

“任职后，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发表意见？政府要下达命令、指示，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怎么好划行呢？”林伯渠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党组会议，商定了改进措施；规定各厅、处、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每次政务会议前，提交会议的议题除交党组研究外，还需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如有意见便缓期开会；某些需李鼎铭副主席签署的文件，必须事先说明内容，征得同意，然后再办理划行手续；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这样做的结果，使李鼎铭很高兴，再不讲“你们党上”如何，而变成“我们政府”怎样了。这就使党外人士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中切实有职有权，不是当“花瓶”摆设。

此外，新的政权机构由选举产生后，人民对政权机关享有监督权，对政府工作人员享有罢免权。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边区政府制定了《选举条例》、《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土地条例》等，以确保民主政治的实施。根据这些条例，人民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对各级干部提批评意见，可以选掉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干部，以及撤换乡村干部或要求上级机关撤换某些不称职的干部。

（二）党内生活的高度民主与空前团结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讲了“党内民主问题”，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象钢铁一样。”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充分尊重每

个党员的民主权力，广大党员在党的生活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形成了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良好风气。凡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可能召开的会议和可能进行的选举，都按党章的规定进行了。在党的生活会上，每个党员都可以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有什么讲什么，牢骚也好，错话也好，怎么想就怎么讲，毫无顾虑，倾囊而出。没有人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集中体现。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健全党内生活、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方针政策，号召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求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参加整风的广大党员对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作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反省，找出差距，进行自我改造。同时相互之间开展批评和帮助，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对于原则问题毫不含糊。但是，批评和帮助又是诚恳坦白，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以理服人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大家的思想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团结和统一。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原则。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延安时期召开的一次充分发扬民主、团结胜利的大会。代表们在讨论中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既有坦率诚恳的批评建议，也有由衷的自我批评，充满了浓厚的民主空气和高度的责任感。大会最后选举中央委员

会时，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先由各代表小组提出最初名单，主席团以这名单为基础，提出预选的候选人名单，然后交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作为预选。大会主席团再以预选结果为基础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正式无记名投票选举。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集中体现，是党内民主生活的具体反映。

民主和团结是不可分的，互为依托，彼此共进，因为党内生活的高度民主，也就带来了全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精诚团结。通过整风，使全党更加团结和统一，特别是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党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31年至1934年间“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了共识，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地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到党的七大，使党内的民主和团结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延安时期党内的民主与团结，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之间体现得更加充分。他们胸襟宽阔，光明磊落，不仅是民主团结的倡导者，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实践，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例如，彭德怀和王震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友。彭德怀很关心王震，但批评起来也很厉害；王震十分尊重彭德怀，但给他提意见也毫不客气。彭德怀曾诙谐地说：“我和王胡子（王震）象一个槽里吃草的两头叫驴，吃着吃着就踢起来了，但我们拉起套来，使的是一股劲。”再如，1947年4月，胡宗南以20万大军气势汹汹大举进攻延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兵分三路：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因留在陕北危险比较大，大家都抢着留在陕北，朱德、任弼时要毛泽东过黄河到平山，刘

少奇考虑到任弼时重病在身，要他也到平山，毛泽东则坚决地说："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结果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其他同志到平山或晋西北。在战友惜别之际，毛泽东坚持把身边仅有的一辆吉普车让给朱德，让他带到平山去，朱德嘱咐中央警卫团长和政委，要把身强体壮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留在陕北，保卫主席，把年岁大的，身体弱的，战斗经验少的带走。还有朱德与周恩来之间转赠毛毯的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当时领导人之间这种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革命情谊，充分反映出党内民主团结的精神风貌。

（三）领导与群众之间、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民主平等和精诚团结

延安时期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是亲密无间、十分融洽的关系。领导没有"官气"，经常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群众把各级领导看成是自己的贴心人、"主心骨"，有意见主动向领导反映，没有任何顾虑。过年的时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主动去给区、乡基层干部和乡亲们拜年。1942 年的春节，毛泽东从杨家岭搬到枣园不久，在枣园礼堂请群众吃饭，亲自给大家斟酒，并对乡长说："我住在这里，是你们乡的一个老百姓，开会的时候一定喊我一声"。之后毛泽东还亲自给枣园 24 位 60 岁以上的老汉祝寿，使这些老人非常激动和幸福。枣园附近的乡亲们也在春节时纷纷带着自制的软米糕、油卷卷、油馍馍、芝麻糖、红枣、黄酒等来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拜年。这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阶级情感。

在延安，党中央及各级领导干部不仅和农民鱼水情深，和党外知识分子、学者、名流的关系也十分融洽，总是以商量的口气，诚恳地征求、倾听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每逢文化界知名人士到延安，都开欢迎大会，使他们深受鼓舞。1939 年 12

月，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对知识分子在生活待遇上给预一定的保障，发给津贴15—30元，吃小灶，每人一间窑洞，每年特制单、棉衣各一套，书刊配发，其家属待遇与本人相同；在政治上大胆提拔使用，尊重其工作经验，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除党的秘密会议外，有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及各种会议的权利，对专心技术而不愿参加政治活动的也一样尊重，并鼓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党内外一些学术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也有许多通信，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平等地谈心和交换意见，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工作，鼓励他们多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帮助他们思想上进步，并对学术、文艺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另外，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召开的，毛泽东作了总结指导性的讲话，为文艺队伍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

军事民主、官兵团结在延安时期也是非常突出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斗争就不患不能支持。"官兵之间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官长爱护体贴士兵，关心士兵的疾苦；士兵尊敬官长，服从命令，并能积极提批评建议，这是我军的一贯作风。这种作风在延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大生产运动中，都是官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士兵你追我赶，谁也不甘示弱，人人都把困难、危险和牺牲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官兵同心协力，团结战斗，奏出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例如，朱总司令所在的党小组响应总部和机关支部的号召，利用党日活动进行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当时朱德正在作战处忙着工作，党小组长没有通知他。事

后，朱德多次自我批评，认为总部机关的同志参加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是他提议的，理应带头执行，不去参加这次义务劳动是说不过去的。这种官兵平等的思想，给部队带来了民主协和的空气，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四）对外开放、来去自由的民主社会风尚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一道抗日，也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这一对外开放的政策，吸引了不少国际友人来边区工作和考察，使我党的抗日活动及方针政策得以广泛宣传。如，到红区采访的第一位西方记者斯诺，先后为英、美报刊撰写了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宣传中国的革命斗争和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美国进步作家路易丝·斯特朗抗战时期两次来华，并访问了延安，对解放区军民的抗日活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到边区工作、考察的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爱德华率领的印度医疗队，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的考察团，美军上校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等都为中国的抗战，为边区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1944年6月到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冲破了国民党特务领队的控制，对延安的党政军领导及各个方面进行了自由的采访和客观的如实的报道，使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捏造的种种谎言不攻自破。

国内的各方人士，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考察团、新闻记者等到陕甘宁边区来，我边区政府也是敞开大门，热烈欢迎。尽管到边区来的人政治态度不尽相同，目的也不同，我们都是让他们自由参观。正如美国记者斯坦因所说：“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

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

对于来延安的中外友好人士，以及凭着满腔热情或一时冲动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边区政府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这种宽松和谐的政策，使人切实领悟到了延安民主自由的社会风尚。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独裁专制及国民党大员的专横拔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

在延安，我党把廉政教育和廉政制度作为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历界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中都反复强调：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并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当时的党政干部大都是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比较注重通过法律手段从严治政，对于个别违法乱纪者，无论过去的功劳多大，官位多高，一经发现便严惩不贷。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引起极大震动的黄克功案件。黄克功少年当红军，参加过进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曾屡立战功，在延安为抗大第六队的队长。因其与陕北公学学员刘茜谈恋爱遭到拒绝，便反目为仇，开枪打死了刘茜，构成了杀人罪。案件发生后，一部分人以保护革命功臣和抗日人才为由为其说情，黄本人也曾幻想会因此对他从轻处罚。边区高等法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黄应判处死刑，并将此案上报中央。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会议对此进行了研究，同意将黄处以极刑。毛泽东在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

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共产党与红军，对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便一扫封建社会“官官相护”，“刑不上大夫”的旧习，维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体现了解放区的新风尚。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自由，民主与法制等方面都有着健全的理论和伟大的实践。这一时期是党内外空前团结的时期。

三、民主团结是党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

（一）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党的坚强有力是建立在党内民主团结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

延安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了根本的贯彻执行，使党组织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广大党员的革命积极性真正地调动起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真正的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完全摒弃了过去曾经存在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的个人专断作风。从而能够把握时局的发展，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使之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由于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内民主生活得以正常的开展，党内各种矛盾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各种关系得到了正确的处理，使全党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战斗，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种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之所在，是保证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十分重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团结和统一。他们说：“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页）列宁也曾反复强调：战

斗的无产阶级最亲密无间的团结都是绝对必要的。毛泽东也多次讲过：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革命导师的教诲正说明，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比钢铁还要强硬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增强了党的凝聚力

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大放异彩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威望有了空前的提高，党的队伍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有了极大的发展，这和民主团结的伟大实践是密切相关、同步发展的。

在八年抗战中，由于党坚持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坚持了民主团结的方针，并以高度的献身精神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就全国来说，在抗战开始时，多数人还是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共两党的抗日表现，使广大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才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抵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为此，把抗战胜利的希望转移到共产党身上。延安，便成了抗日的中枢，全国人民的希望。大批青年学生、爱国志士历尽艰辛，爬山涉水奔赴延安，使革命的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独裁统治，不给人民以抗战的民主与自由，压制民主，积极反共，排斥异己，引起了愈来愈多的人的不满，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国民党的力量不断削弱，拥护国民党的力量越来越少。而共产党不仅自身的力量不断增加，拥护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断增加。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中央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形成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基本方针，为保障人

民的自由权利，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蒋介石却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发动全面内战，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便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于彻底的孤立，使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扩大，因而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民主团结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使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为执掌全国一切的执政党。

（三）使党跳出了历史的周期率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代王朝的统治都没有能够摆脱始兴终亡的周期率。几千年来总是经过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跳出这一周期率呢？毛泽东同志给予了明确的回答。1945 年 7 月，黄炎培先生同其他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一道访问了延安之后，毛泽东问他感想怎样，他说："我生 60 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后信心百倍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外人士访延纪实——封锁线内的真相》第 347、348 页）毛泽东的话道出了"民主"一词的真谛。坚持民主，才能实现党的领导，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的风帆一旦搁浅，我们党，我们的祖国必将会出现灾难。

第三编

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实践

第十章　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延安精神的实践

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的司令部和大本营，聚集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高、中级领导干部和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新中国的诞生，在这十三年的艰苦岁月中，用革命斗争的实践，用鲜血和生命培育了不朽的延安精神。

一、毛泽东是实践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用他那光辉的思想，求实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成为实践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

（一）挽救了陕北的党和革命，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王明的“左”倾错误在这里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全凭某些人的主观臆断便被关押起来，白匪军乘机向陕甘根据地大举进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挑拨煽动，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根据地正在日益缩小。

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1935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一起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毛泽东通过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掌握了基本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任何逮捕，将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经研究很快释放了刘志丹等领导人。毛泽东对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十分关怀和爱护，安排他担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 28 军军长。1936 年春刘志丹在率军东征期间不幸牺牲，毛泽东题了挽词，称他是“群众的领袖，民族的英雄。”毛泽东的到来，挽救了陕甘地区的党和革命事业，并使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为革命事业，忘我地工作

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年富力强时期，他工作起来，往往是忘记了吃饭和睡觉，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有时连续几天几夜都不休息，大家都佩服他精力充沛。美国记者斯坦因第一次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从下午 3 点给他讲到夜里 3 点。斯坦因写道：一入夜晚，我几次提议告别，但他都不听。……直到早上 3 点钟，我最后决定要走，我已神色困倦，四肢发痛，眼睛发红，而他却是清醒活泼，谈吐不乱，一如昨日下午一样。那时，每天一早，当机要人员送来电报、文件后，他总要先看一遍摘要，如有急需答复的，就立即答复。如果急需处理的文件多，他就一直工作下去，连早饭也不吃，直到晚上才吃早饭。为了让他掌握工作时间，工作人员想给他搞个钟。而毛泽东却说，不要钟好，有了钟就不自由了，没有钟，自由。什么时候工作做完，就什么时候睡觉。

为了用革命理论指导斗争的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了大量的著作，每一篇都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经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写《论持久战》时，已经是一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眼睛布满了血丝，饭也吃得很少。身边的警卫员看到毛泽东这样劳累很耽心，总想瞅个机会劝毛泽东休息，可毛泽东的眼睛总是不离开纸和笔。半夜里，警卫员送来夜餐后，轻轻地说："主席，吃饭吧。您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毛泽东却说："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说着话，手中的笔仍没有停。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再一次恳请主席吃饭、休息，毛泽东才抬起头微笑着说："好，我吃过饭马上睡。"谁知，当警卫员来收拾碗筷时，看到毛泽东还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写着。桌上的饭菜，一筷子也没动，早都凉了。就这样，一连过了五、六天，毛泽东一直没有好好休息。

毛泽东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一天夜里，西北风刮得窗纸"哗哗"直响，警卫员生了盆火放在毛泽东的脚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警卫员正准备给毛泽东送水。正在这时听到毛泽东在喊他，跑进去一看，毛泽东正弯着身子脱棉鞋，两只鞋上冒着青烟，原来是毛泽东的棉鞋被烤着了。警卫员赶快过去帮毛泽东把棉鞋脱下来，随手把暖壶的水浇在棉鞋上，火灭了。拿起来一看，一双棉鞋烧着了好几处，棉花都露出来了。警卫员把单鞋找出来让毛泽东换上。毛泽东望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哈哈大笑着说："怎么搞的，我一点儿也没有觉得就烧着了"。警卫员这时趁机劝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还是那句话："好好，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儿就睡。"说完又继续写，一直到很晚才睡下。

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也是这样，一连几天都没休息了，警卫员几次劝他休息，他总是一面答应，一面仍继续埋头写作。看

着他消瘦的面庞，布满血丝的眼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着急，便想方设法劝他休息。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在写作。几个警卫员凑在一起商量，让年纪最小的，十几岁的勤务员小王去“强迫”主席休息，小王走到主席跟前，坚决地说：“主席，您该睡觉啦。”伸手把桌子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主席睡觉的炕头上。主席无可奈何地放下笔，缓慢地站起身来说：“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小鬼，快去休息吧。”小王坚持说：“我要等您上了炕再走。”主席看他那股认真劲，笑着上床躺下。大家见小王完成了任务，高兴极了，都放心地睡觉去了。第二天清早，当他们来到毛泽东办公室时，发现主席正全神贯注地在灯下写作，外边站岗的同志告诉他们说：“你们那个办法又失败了，昨天晚上你们刚走，主席就起来了，一直工作到现在。”

就这样，毛泽东从当时的革命斗争需要出发，写出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著作，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着。

（三）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延安时，毛泽东经常带着一两个警卫员，有时还带着女儿李纳，到处走走，到处看看，走到哪里，就调查到哪里，在同老乡的交谈中，详细地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问村里开了多少荒地，养了多少家畜，劳动力有多少，女劳力有多少，地犁了几次，犁得多深，谷子锄了几遍，洋芋种了多少，每亩上多少肥，水地、旱地各有多少亩等等。同时，还向老乡询问机关、部队和他们的关系好不好。问部队砍柴时砍了群众的树没有？机关的羊群吃了群众的庄稼没有？机关和部队对群众的态度好不好？等等。无论走到哪里，都随便和群众攀谈，重庆谈判归来后，他在柳村店原中央后勤疗养院养病，只住了一周

的时间，毛泽东就将柳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都跑遍了，和各村的群众都谈过话。

毛泽东时刻注意密切联系群众，无论他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王家坪，逢年过节总是将左右邻居们请来一起欢度佳节。在枣园时，毛泽东在元宵节为二十四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祝寿。毛泽东派人挨门挨户地去请他们，并早早地站在会议室门前等着迎接他们，酒菜端上来后，毛泽东亲自给老人们敬三盅酒，祝贺老人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还希望他们发挥种庄稼的丰富经验，教导和带领年轻后生，发展生产，丰衣足食，过更美好的日子。毛泽东还给他们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贺寿的礼品。饭后，又专门给这些老人放映了一场《列宁在十月》的电影。使这些种了大半辈子地，受了大半辈子苦的庄稼老汉，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姓刘的老汉拉着毛泽东的手大哭起来，说：“毛主席，你是咱们庄户人的大救星，你是咱们穷人的引路人，你对咱们太仔细了，把咱们的什么大大小小的事都办了。咱们祖宗三代都没有做过什么寿呀！”

毛泽东非常喜欢与农民交朋友。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的一次农业展览会上，毛泽东认识了劳动模范郝光华。参观之后，便邀请郝光华到边区政府进行座谈，以后又写信让郝光华来家里谈。为了让郝光华找着方便，毛泽东还特意写上他每天几时办公，几时休息。郝光华接到信，第二天就赶来了。毛泽东听说他来了直迎到山坡下，领到自己的窑洞里，非常兴奋，并仔细地询问郝光华所在的吴家枣园村里的情况，直谈到傍晚，毛泽东又留郝光华吃饭，而且让他坐在上首，亲自把菜给他夹到碗里，还一再劝他要多吃一些。临走时，毛泽东把郝光华送出了一里多路，还频频招手。

毛泽东如此密切地联系群众，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尊重群众，热爱人民。人民也热爱自己的领袖，称毛泽东为东方升起的红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毛泽东一直留在陕北，同群众一起坚持战斗，陕北的人民也用生命保卫毛泽东。一次，敌人抓住了一位70来岁的老汉和一个10岁左右的女娃娃，逼问他们毛泽东曾住在哪个窑洞里，到哪里去了？老汉和女娃都闭口不言。敌人把老汉吊在树上猛抽，女娃娃吓得又哭又叫，但他们始终没有吐露真情，其实，敌军长刘戡住的窑洞，就是毛泽东刚刚住过的地方，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绝不会有人告诉他们。

毛泽东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关怀备至，时常到警卫员的住室来坐坐看看，象父亲关心孩子一样问大家：政治课讲了些什么内容？有没有不懂的地方？家里来信了没有？生活有没有困难等等，并且经常鼓励他们学习文化，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学习中遇到的难题。看到警卫员的身上冷，毛泽东就把自己的毛衣脱下给警卫员穿。看到警卫员的被子单薄，就把自己的被子给警卫员盖。

（四）生活俭朴，作风民主

毛泽东的生活十分俭朴，他和大家一样，每天三钱盐、五钱油，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衣。不少同志多次提议给毛泽东增加伙食费，都被他谢绝了。他总是说："伙食标准是供给部的统一规定，大家都一样嘛！我怎么能搞特殊呢？"警卫员贺清华曾给毛泽东打过一双袜子，毛泽东一直穿着。天长日久，袜子都磨破了，上边补满了补丁，疙疙瘩瘩的，毛泽东还舍不得丢掉，一连穿了四年，直到无法再穿为止。在杨家岭住时，天已经很冷了，战士们都已穿上了新发的、又暖和又整齐的棉衣。可毛主席仍穿那件

已经穿了四年的灰土布破棉衣，两个胳膊肘上，也不知补过多少次补丁了。工作人员几次要给他换一件，他就是不肯，说现在边区经济很困难，大家的生活都很苦，我们应该省吃俭用。这件棉衣破了，洗洗补补还可以穿嘛。警卫人员看着毛泽东穿着破旧的棉衣，顶着刺骨的寒风，到各单位去开会、作报告，很过意不去，就搞了几尺蓝色的阴丹士林布，给毛泽东做了一件新棉衣，趁他休息的时候把旧的换了出来。哪知毛泽东起床后，说什么也不肯穿这件新的，仍要那件旧的。警卫员告诉他那件已经拆了，就是洗干净，也烂得缝不起来了。毛泽东无奈地说："那就给我领件普通的灰布棉衣，和你身上穿的一样就行了"。为了节约煤油，毛泽东每当晚上考虑问题时，总把灯芯拧得很小，写作时再把它拧大。毛泽东喜欢吃辣椒，但从不准伙房用油炒辣椒，并对管理员说，这是一条纪律。

毛泽东就是这样，从不搞特殊化，在大生产运动中，他虽然作为主席，日理万机，但和大家一样抽出时间开荒种地。身边工作人员劝他说："主席工作很忙，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毛泽东却笑着说："那怎么行，大生产运动是党的号召，我应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当毛泽东得知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主动帮助边区政府克服困难时，立即表示赞成，说我也缴一份。当有人说，您的工作太忙，公粮由大家代缴了时，毛泽东说，请客、看戏可以代替，缴公粮可不能代替，自从确定了公职人员要缴公粮后，毛泽东又增加了许多劳动时间，农忙季节，如锄草和秋收时，他一周常常参加三、四个下午的劳动。这些平凡的行动，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和教育着身边的干部和群众。

毛泽东在党内生活中的作风是十分民主的。他主持会议的方

针是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他常常不规定会议的中心议题，让大家随便发言，无论讲什么，他都耐心地听，从不打断。因而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都是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之后主席将大家的意见反复比较，吸收消化，集思广益，有了成熟的意见后再拿出来。毛泽东在考虑问题时，常常征求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把他正在思考的问题，他的分析及打算讲出来，听听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映，然后再做出决定。这就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总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谦虚谨慎，一心为公，身体力行，是全党、全国人民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

二、周恩来对延安精神的实践

周恩来在延安时期以革命的胆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党性的楷模，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化身，成为实践延安精神的光辉典范。

（一）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出入龙潭虎穴

众所周知，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抗日救国，一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时的西安成了举世瞩目的大风暴中心，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截然不同的两种前途。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到西安。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共中央决定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许多人对我党的决定很不理解，为此，周恩来要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要做留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的工作，也要做张、杨部队中不同派别的工作，还要直接同蒋介石的代表谈判。他为广泛争取抗日力量，白天黑夜地同各方不同意

见及各界人士进行交谈，废寝忘食，沉着机智。通过谈判，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

蒋介石把张学良扣押起来后，周恩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的互相残杀。当时东北军的一批少壮派军官主张与蒋介石决一死战，救出少帅。他们杀害了主和的王以哲将军，还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明白他们的来意，霍地站起来，大声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几个青年军官低头不语，气焰收敛。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地开导他们，直到他们跪下来，流着眼泪认错请罪。王以哲是东北军中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发，声称要为王以哲将军复仇。这时，周恩来毅然决定不避祖护少壮派之嫌，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样保护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避免了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与周恩来的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卓越才能分不开的。从此，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新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周恩来经常往来于延安和武汉、重庆、南京、上海之间，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开展工作。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出任了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分管政治部的宣传工作，这正是我们的优势。因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组织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队伍，动员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三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

延揽了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冯乃超等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工作。他们成立了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到前线部队和农村、工厂演出，把不同爱好的文化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工作。如他经常就时局问题同冯玉祥交换意见，冯玉祥很同情支持我们，不仅帮我们印了《列宁全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还向延安图书馆捐赠了大批图书。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在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经受了严重的考验，扩大了共产党员的影响，用他那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工作才能，正确地表达了我党的立场，不仅团结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而且也扩大了我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如，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后，经周恩来的介绍，到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根据亲身体会，赞扬在国内只有延安是廉洁的，在华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纷纷捐款给延安，支持延安的抗日斗争。许多外国评论家说，周恩来不仅是共产党派驻在国民党那里的代表，而且也是共产党派驻在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1946年5月，周恩来随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上海，一直到这一年的11月19日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7个多月里，周恩来一直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行着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斗争。

周恩来在延安十三年中，出生入死，深入虎穴，在险恶的环境中了解敌情，掌握斗争形势，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自遵义会议以来，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

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忘我工作的精神，具体组织落实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比其他同志都睡得更晚，起得更早，在毛泽东休息时，除了特急电报外，他都不去惊扰毛泽东。前线发来的战况情报，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和地名，他总是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毛泽东阅示，以减轻毛泽东的负担，使毛泽东能够集中精力考虑更重要的问题。他经常说，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不仅在工作上与毛泽东配合默契，融洽协调，在生活上对毛泽东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现出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厚而真挚的革命情谊。1945 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非常关心，他具体安排了谈判的有关事宜，亲自布置检查各项安全措施，并亲自保卫毛泽东。在毛泽东到重庆的当天晚上，国民党当局把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周恩来十分警惕，他没有到分配给他的地方去，而是坐在毛泽东卧室隔壁的房间里，名为办公，实际上是亲自保卫毛泽东，彻夜不眠，直到天明。之后，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他让人把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腾出来给毛泽东住，指定专人负责照顾毛泽东，组织办事处的同志日夜轮流值班。周恩来同毛泽东的亲密合作关系，不仅得到党内外同志的称赞，连美国记者约翰·吴德施都在他的书中写道："周这样忘我无私的品质，在同毛的关系上最后受到考验。""周、毛的合作关系，无论就经历年代、亲密程度、历史重要性来说，在中共党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他们的伙伴关系长达 40 年之久，这种关系是坦率的，也是有创造性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存在下来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周——中国传奇式人物周恩来非正式传记》）

周恩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事迹是屡见不鲜的。在艰苦的

1941 年，延安中央医院的同志听说周恩来要从重庆回延安，希望周副主席的工作人员从重庆带点伤寒杆菌的菌种回来。十几天后，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来到医院，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三个装着伤寒杆菌的小玻璃管，交给医务人员。在场的人都楞住了，因为这样贴身携带很容易传染上伤寒病。这位同志告诉大家，菌种是周恩来亲自要来的，他怕放在别处碰坏，一直十分珍惜地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亲自从重庆带到了延安。

周恩来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来关心和帮助其他同志，为大家排除困难，解决问题。他经常和干部、群众在一起交流思想，引导年轻的同志把自己的烦恼和个的愿望谈出来，用美好的建议，使你解开思想疙瘩，让你豁然开朗。所以，大家感到在周恩来面前无拘无束，同周恩来在一起工作永远不会感到枯燥、寂寞。周恩来就象冬天的太阳，给人以温暖，使人愿意和他接近。当周恩来知道警卫员小彭家有年老的父母，生活困难时，就亲自决定从救济费中拨出一点钱，每年由工作人员给小彭父母寄去。当小彭接到父亲的来信，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感动。当周恩来看到停在村头的担架，知道其中一名抬担架的老乡病倒后，便叫警卫员扶生病的老乡去医务所看病，自己和另一位老乡抬担架。当担架上的伤员知道抬他的是周副主席时，激动地流下热泪，发誓养好伤，马上回前线杀敌，就是流最后一滴血，也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安全。

（三）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周恩来不仅在行军打仗中和战士们一样，两身换洗的衣服，一床毛毯，便是全部的财产，就是在重庆、南京、上海的花花世界里也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

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因日夜操劳，身体更加消瘦，鼻子也

经常出血。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要乘火车到石家庄同卫立煌谈判。警卫人员为照顾他的身体，便想给他买包厢票，他坚决不同意，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象有钱人那样呢？"大家又想改买软卧票，又被他坚决制止，在他的坚持下只好买普通硬席票。火车到石家庄后，卫立煌对此很吃惊，认为作为一个高级将领，这样廉洁奉公，真是可亲可敬。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因兼任国民党政治部的中将部长，又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每月有几百元的薪水，加之写文章的稿费，收入很可观。可他对平时的日用品仍是能不买的就不买，能买次的就不买好的。出席会议和会客总是穿着那件穿了多年，已磨毛了边的旧裤子，工作人员多次劝他买一件新的，他总是不肯。每月的薪水，周恩来只用去很少的一点，剩下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在生活上，周恩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严格要求自己。他从西安回延安的途中逢天降大雨，道路泥泞，赶到洛川县城时天已黄昏，便临时决定住在一家旅社里。吃饭时，勤务员想买一荤一素给他吃，可他却说："来一个白菜豆腐汤，炒一盘豆芽就很好了。"勤务员说："你要的菜都没有，只有红烧肉、炒肉片和炒鸡蛋。"周恩来猜透了他们的心思，便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延安的同志都在吃黑豆，吃山药蛋，我们应节省每个铜板支援前线！"一天，他经常划地图用的半截铅笔头不见了，竟千方百计地让工作人员找回来，并对大家说："你们知道这些铅笔是怎么来的吗？不管是买的，还是领的，或是从敌人那里搞来的，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自己造出来，我们得靠金钱和鲜血去换来。我们进行过长征，吃过很多苦头，如今在陕北安了家，可不能大手大脚啊！这铅笔还可以用上几天，不要认为这仅仅是半截铅笔，这是我们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周恩来就是这样，与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在大生产运动中，为克服困难，他带头纺线，并被评为纺线能手一直传为佳话。

此外，周恩来在广泛团结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面也为大家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三、刘少奇对延安精神的实践

刘少奇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成为延安时期党的白区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的光辉典范。

（一）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

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派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当时华北地区经过多年的白色恐怖，党组织绝大部分已被破坏，只保存了河北省委、若干基层组织和几十名干部，而且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局面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重返虎穴，重整旗鼓，他首先在党内批判、清除“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大力恢复和发展各地的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使华北的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五千多人。其次，巩固和发展“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大力动员群众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当时刘少奇向华北地区的党组织提出两条：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十万。这个方针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成，也为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完全是正确的。

抗日战争一爆发，刘少奇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

攻，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失败的动乱局面里，刘少奇和北方局的其他同志一道，及时迅速地组织革命力量转向农村，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广大的华北敌后根据地。这就使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成了华北人民所依靠的，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因此，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称他是“白区工作的模范。”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派遣，赴华中局任书记。当时华中局受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较深，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没有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没有领导和组织这一地区的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刘少奇到华中后，认真调查研究，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分析了华中面临的困难和有利条件，明确提出了华中地区今后抗战的任务和方针。他亲自作了军事部署，调配干部到各地开辟工作，派遣李先念、彭雪枫等同志到湖北、豫皖苏、大别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皖南事变以后，他又担任新四军的政委，和陈毅一起奔走于大江南北，战斗在东海、黄海之滨，使新四军成为插在敌人心腹的一支劲旅。经过三年多的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伪军的“扫荡”，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大大发展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建立了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发展华中”的任务。

（二）对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是我党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 年，刘少奇回延安时，应党中央总书记和马列主义学院院长张闻天的邀请，就有关思想修养问题，在马列学院作了一场报告，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张闻天认为刘少奇的报告对于广大学员都是迫切需要的，便请少奇

整理成文，发表在《解放》周刊上，这篇文章就是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刘少奇根据自己多年领导党务工作的经验，对党内生活、学员种种表现观察的总结。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将这篇文章规定为整风的必读文件。除此之外，刘少奇还写了《论党内斗争》、《论党》、《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文章，在党内有着很大的影响和教育意义。尤其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热情地讴歌了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刘少奇对党的思想工作一直是做在前边，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新形势下，他提醒全党正确处理意见分歧，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帮派习气”等。使党成为一个团结统一，上下一致，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强大堡垒。在解放战争拉开序幕以后，为着提高党的战斗力，刘少奇再一次强调党的团结的问题，专门谈了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他指出，目前我们党内没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也没有出现任何分裂的苗头，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我们却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失去应有的警惕性。

刘少奇这种思想工作的方法，是我们每一个党务工作者的楷模。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都说：刘少奇是一位杰出的党务工作的领导者、精悍的组织者、意识形态方面的工程师。周恩来听了很赞赏这种说法，说她讲得准确、贴切、客观。

（三）忘我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1945 年 8 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去重庆谈判。

在谈判期间，以及后来毛泽东生病期间，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主持中央工作。他既要抓好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同蒋介石集团的谈判斗争，还要勾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我军的相互联系与协同动作，指挥好前线的斗争。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刘少奇一生中为党为革命事业，工作最繁重、最劳神、最紧张的一个时期。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有条不紊地处理了各个方面的一件件大事：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群运的全面工作；果断处理解放区附近地区的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坚持回击国民党的一切破坏和挑衅活动，并加强壮大我们的实力；依形势发展的要求，坚决迅速调整和积极布置我军主力，争取战略优势；大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努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尽力做好统战工作等等。另外，还要做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及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

1945 年 10 月，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健康状况一直不大好，直到 1946 秋，党中央的全面工作仍由刘少奇来主持。这一时期，是革命力量将在全国范围内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大决战的极其重要的准备和动员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势是非常严峻和复杂的，刘少奇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泽东对他的重托，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为全党树立了模范工作的榜样。

（四）关心干部，以身作则

刘少奇对干部的工作不仅作原则性的指导，而且切实地、具体地关心干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在 1946 年底延安的疏散工作中，他特别要求做好赵紫兰、帅孟奇等大姐以及老弱病残人员的疏散和安置工作，指出一定要给他们配备一个勤务员，行路时拨给一两匹牲口。刘少奇还对师哲讲：你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你如果这样想，那就一定

会出问题的。因为你只要一有这种思想，就会麻痹大意起来的。这样的思想方法和作风是错误的，危险的，会使你吃苦头的。你应该时时刻刻考虑，并细心观察，检查在某处、某一个环节上还可能会出现什么岔子，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堵塞漏洞，这才是有益的，有意义的。这些话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具体表现。

刘少奇始终表里如一，严于律己，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以身作则，首先做到。他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胃病，曾多次吐血。到延安后，他和大家一样吃粗米淡饭，总是默默地忍着因饮食不适而引起的胃痛，生活上从未提出过特殊的要求，而且在困难的时候，带头到地里去挖野菜充饥。一次，报社发给刘少奇二千多元稿费，勤务员拿着稿费心想，这回有了钱，该好好改善改善生活，给他补补身子了。

可当勤务员把钱交给刘少奇时，他说啥也要把钱退回去，说："现在敌占区的老百姓都没饭吃，解放区生活也有困难，咱们替人民办点事儿，不能额外再要报酬，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刘少奇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他到北方局时，中央交给他几万法币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自己没有多花一分钱，坚持按中央规定，每月只领5元钱的津贴，每天买些红、白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他吃剩的饭菜，从不允许倒掉，都是留着下次再吃。领到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再补。他穿的一件皮大衣，还是新四军时发的，许多地方都磨成了光板，布面上补丁摞补丁，破得几乎无法再补了，他仍然不让换。一次，后勤部的同志背着他，拿走换了个布面，他知道后批评这个同志说："现在前线战士爬冰卧雪，穿衣服都很困难，我们有这个穿就不错了，怎么还能搞特殊呢？"从这以后，刘少奇给身边工作的同志订了一条规矩：凡是他用的东西，不经他

允许，谁也不能随便拿去换新的。

此外，刘少奇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关心同志。他从不宣扬自己，总是把我们党的业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而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

四、朱德对延安精神的实践

在延安时期，朱德作为八路军的总司令，是一位非凡而又平凡的将军，他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一）是将军，又是普通一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朱德任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37 年 9 月，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向敌后进军的过程中，取得了平型关伏击战的胜利，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忻口会战，夜袭了敌人的阳明堡机场等。八路军指战员英勇杀敌，接连获胜，打击了日寇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意志，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11 月 9 日太原失陷以后，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开始进入主要地位。1940 年 5 月，朱德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

在抗日前线，朱德不仅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较量，而且领导太行山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并利用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接触的机会，揣摸和掌握他们的思想、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了解、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现象，深切地感到蒋介石国民党天天都想反共的思想本质。根据这些情况，和他

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这一时期撰写了许多军事著作，如《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等，对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治军方面，朱德始终把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对干部首先要信赖，放手使用，发扬民主，让人讲话，有机会施展才能，使人有用武之地，这是我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是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相互勾通联系，切实掌握情况，及时解决一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要彻底解决，不留夹生饭。指挥员应具备的条件是掌握情况准确、精明、果断。对战士的要求主要是勇敢、坚毅、忠诚、机敏，能吃苦、能耐劳、能坚持。他对任何犯错误的人，极少用军法制裁，总是采取教育的方式，以理服人。他说，如果不讲清道理，要人家盲目服从，结果总是压而不服，或貌恭而心不服。

有一次，一个战士向朱德报告了一个大家都不满意的炊事员的劣迹。朱德听了后有些生气，找来那个炊事员问："炊事员的任务是什么？战士们吃你做的饭满意不满意？"炊事员回答不上来。朱德又接着说："如果你的饭做得不好，那就是你把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粮食给糟蹋了、浪费了。按我们人民的习惯说法，糟蹋五谷是造孽的、犯罪的。再说，粮食能够增加营养，增进人的健康。可是你的饭做得不好，战士吃后得了病，这不是第二次犯错误，第二次造孽吗？总之，你的饭做得不好，你有过错，知道吗？"这种诚恳、真挚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方法，给全党全军的干部树立了榜样。

朱德既是一位叱咤风云、运筹自如、统率着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总司令，又是一位谦恭和气、通情达理，没有一点架子，象一名普通的士兵。例如，1937 年 9 月的一天，朱德率军东渡黄河，开

赴抗日前线。出发之前，驻在西安西北云阳镇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接到通知，知道朱总司令要来，便派出几名同志大清早赶了三四十里路，来到一条河的桥边等候。这几位同志以前没见过总司令，此时的心情是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猜想朱总司令一定是个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一派与众不同的将帅风度。中午，桥上走过来一批八路军干部，每人都穿着一样的红军衣服——普通的灰夹衣，衣领上缀着红领章，腰扎皮带，打着裹腿，头戴红五星的八角帽，每人还挎着一枝驳壳枪，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什么特殊。他们想，这一定是打前站的，总司令还在后头呢。于是，他们继续等，左等右盼地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不见总司令来，便派两人回去汇报情况，其他人仍在此等候。当这两人气喘吁吁地跑回司令部时，总司令早就到了，正在和其他首长谈话呢！

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他们在莫斯科的时候，由于大家都没有见过朱德将军，而且传说他是一位神秘人物，于是有人猜想，以为朱将军一定是一位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不苟言笑、高踞人上、傲慢自负、目中无人的旧督军式的人物。谁知相见之后，才知他竟是这样一位非凡而又平凡的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英勇的军事将领，同时又是普通的、不失劳动者本色的革命长者。

（二）深入调查研究，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朱德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的时候，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时候。为此，他对边区的经济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邀集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等，到延安西川视察了农具厂、难民纺织厂等几十个小厂；到杏子河川的茶坊、纸坊视察了第一、第二机器厂和八路军印刷厂；到延安以南的临镇、南泥湾、牛武镇等地作了考察。每

到一地，他都要召开座谈会，详细询问当地的生产情况，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还帮助解决了一些生活和生产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视察回来后，他写了《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完成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提出了解决边区困难的措施和方法。1940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的《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建设政策的指示》中，许多条款就是根据朱德的意见提出来的。

朱德根据党中央“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指示，号召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1940 年秋，他命令王震旅长率领八路军 359 旅进驻南泥湾，一面阻击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南线的进攻，一面开荒种地。这之前，朱德曾亲自到南泥湾考察、选点，并亲自拟定开发计划。他号召部队既能打仗，又能生产，“背上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多生产一颗粮食，多增加一份战斗的力量”。他还把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员组织起来，一半在机关工作，一半在南泥湾办农场。还把聂荣臻送给他的那匹大洋马和一头驮骡安排到运输队拉车，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年近六旬的朱老总，不仅号召部队“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革命家务，用自己生产的成果解决吃穿问题，不能有依赖公家的思想，更不能靠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过日子。”而且自己身先士卒，在日理万机中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位于八路军总部大门西侧有一块河滩地，朱德和康克清及身边工作人员一有空，就到地里拣石头，平整土地。朱德时常一大清早背着粪筐在路上捡粪，有时天快黑了，还在地里锄草、浇水、施肥等，常常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警卫员在田边放一个小板凳，不时劝他休息一会儿，他总是不肯休息，还说：“这不是爬雪山过草地，干这些农活累不坏人，心里高兴就会忘记疲倦，再说这也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在

朱德的精心耕作下，这块地种植的白菜、黄瓜、西红柿、土豆等蔬菜长势好，成熟早，产量也高。干部、战士都称其为“小南泥湾”。

朱德还带头纺线，他办公室里放着一辆纺线车，凡是来给他汇报工作的同志，他首先要问你会不会纺线，若不会，他就手把手地教，学会后再让汇报工作。

（三）虚心好学，生活简朴，关心群众

在繁忙的工作中，朱德从不放松学习。他常说：“学习好比人身上的血脉要流动一样，不能停息。只有经常学习，才能懂得如何革命。”他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意味深长地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可见，他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也正是不断深入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真理的过程。朱德还说过，他一生跟过三个领袖，一个蔡锷，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毛泽东是他跟过的领袖中最好的一个领袖，毛泽东真正精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为此，他勉励大家，要像毛泽东那样，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正确地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他给身边的警卫员规定每天识五个字的任务，并常常手把手地教警卫员写字，还利用上南泥湾的机会，上山剥了许多桦树皮装订成册，送给警卫员作为练习写字的笔记本。

他不仅关心战士们的学习，也关心战士的生活和身体，对战士们体贴入微。1941 年 5 月的一天，朱德带领几名警卫员和一个向导前往南泥湾视察。傍晚，走到南泥湾，朱德决定在两个破窑洞住宿，而不去打扰部队。他们在窑洞里搭起了简便的床铺，吃

了点干粮就休息了。朱德和警卫员小李睡在一个窑洞里，本来考虑总司令年纪大，又奔波了一天，怕他夜里着凉，让他睡在里边的床上，小李睡在洞口的床上，这样下半夜叫小李起来换岗也方便些。哪知朱德在睡觉之前跟小李换了床位，夜里换岗的时候，警卫战士来到朱德住的那个窑洞口，轻轻推了几下靠洞口床上的人，告诉他换岗了，便回到自己床上睡觉了。第二天清早，发现朱总司令不声不响地站了半宿岗，小李还在那边的床上睡觉。

为了让战士们吃好，朱德亲自参加机关食堂召开的伙食管理会议，并提出了用上山打柴代替上街买柴，以及自己生豆芽等方法节省开支，来改善食堂的伙食。当他看到猪养得不好，影响了伙食时，又亲自到猪场和养猪的三个同志促膝谈心，给他们讲养猪与革命的关系，和他们一起研究怎样养好猪。使养猪的战士十分感动，表示："总司令这样关怀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把猪养好！"其中有个战士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过来的，经朱德的教育，思想提高很快，工作越做越好，后来调到别的地方当了干部，还多次给朱德来信，说他从未听说总司令管工作管到猪场，管到饲养员这样的事，表示永远忘不了总司令对他的教育和帮助。

朱德虽然身为总司令，但生活是十分简朴的，始终保持着普通农民的本色。他坚持和总部的同志们一起吃大灶。有时吃顿白面，工作人员把饭送来后，他还要亲自去看看同志们是不是吃的和自己的一样，唯恐给他特殊照顾。一次，司务长搞来一些菜，考虑到总司令年纪大了，为了他的健康，想给他多吃一些。朱德知道后却严肃地说："人的嘴都一样，应该分给大家吃。"南泥湾打猎队打了不少野猪和豹子，他们听说朱总司令铺的、盖的都很单薄，就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他铺，结果被他断然拒绝，并说："你们这是做啥子嘛！给我进 啥子贡哟！我们党是不兴送礼这一套

的。”

朱德的衣服和鞋袜总是补了又补，不愿换新的。为了节约开支，他用马尾做牙刷，用盐水漱口。他的一床补满补丁的棉被，一直带到北京，用了 20 多年。他经常教导战士们：“我们军队要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要和人民一样生产和节约，不能搞特殊化。这样，我们的军队才有力量，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朱德衣着朴素，平易近人，所以当他和普通战士在一起时，人们很难辨认出他就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正如续范亭在《赠朱总司令》的诗中所写：“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五、任弼时对延安精神的实践

任弼时以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老黄牛精神，和坚持原则，敢于向任何错误倾向作斗争，从不考虑个人安危，为革命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延安时期党政军民的一直称赞。

（一）对共产国际的影响

任弼时 1936 年 10 月随红军二方面军到陕北，1937 年 8 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1938 年 2 月，任弼时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不久，他受党中央的派遣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直到 1940 年 3 月回到延安。这期间，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共产国际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清除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国内外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

任弼时一到共产国际，便立即伏案挥笔写报告，向共产国际

执委会和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介绍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在报告中，他着重介绍了党内斗争、长征经过、遵义会议的主要成就，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中共中央的总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策等。特别强调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他写到：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路线，才有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党和红军的发展，才召开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迅速纠正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才有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和长征的伟大胜利。由于毛泽东等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才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战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任弼时还强调：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是完全正确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革命就胜利，如果离开了他，革命就受到挫折，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任弼时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在共产国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驻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纷纷找任弼时交谈，或请他去各国代表团作报告。各兄弟党的代表团听了这些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的理论，感到十分新鲜，听了以后感到很有道理，他们纷纷赞叹：“毛泽东真伟大，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要虚心向中国同志学习。”

为了宣传毛泽东，宣传中国革命，肃清王明“左”右倾错误的影响，任弼时还在《共产国际》、《真理报》、《红星报》等刊物上撰写文章，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并组织编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写的文章。他看

到王明为了抬高自己，在许多地方都挂上自己的像，以及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也在宿舍挂上王明的像很生气，指示全部摘掉王明的像，挂上毛泽东、朱德的像。

由于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所做的大量工作，使共产国际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转变了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看法。再加上1939年下半年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病期间，再次向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谈了王明回国后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种种表现，使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的真实情况。

（二）对党的工作兢兢业业，正直公道，不徇私情

任弼时于1940年回到延安后，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还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会、青年团、妇联及西北局的工作。这期间，他的工作虽然繁忙，但却有条不紊。首先，他整顿和健全了中央机构和工作制度，成立了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干部供给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改变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的现象，大大提高了中直机关的工作效率。其次，抓了中央所属各部委的工作，将各部委领导都集中到杨家岭一带办公，使各单位的工作相互协调开展，很快走上正规化。第三，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号召、推动大家学习马列著作等。

任弼时不仅担负着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直接组织者的任务，而且后来还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直接主持者。他负责组织对代表的选举、审查、接待；准备大会的文件；选择大会的会址。任弼时还参加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开幕后又当选为大会的秘书长。

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任弼时任中央机关直属支队的司令员，负责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不仅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

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还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居住、物资供应、安全警戒、敌情侦察等工作。他为使毛泽东、周恩来集中精力指挥全局，把一些具体事情都考虑安排得很细致周到。有些同志对撤出延安思想不通，他还要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向这些同志讲清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的道理。他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但工作起来，常常忘记自己的病情。

任弼时一贯耐心、谦虚地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不管是反映情况、倾诉苦衷或提出建议，也不管你讲得正确与否，他总是诚心诚意地听下去，决不打断你。在他看来，听取下级汇报，反映情况，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之一。正因为他善于听取意见，同干部、群众商量问题，所以他的指示和意见较易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他信任干部，并放手使用干部，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发挥自己的才华和创造性。但是，如果发现干部有了缺点，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和错误时，他总是及时地从正面指出、纠正。对犯错误的干部从不恶言厉声地训斥，也决不冷嘲热讽，更不会斥责谩骂。在任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凡归他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不论给予何种处分，总是合理合情，恰如其分，一般都能使人欣然接受。无论干部和群众都乐意与他接近，说他和气、可亲、可敬、愿意把心里的话、难言的苦衷、不便向人透露的私话向他倾吐。所以大家称任弼时是“我们党内的妈妈！”

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工作中，任党中央书记兼社会部长的康生独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口号，擅自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十天大会”，进行逼供信。刚开了两天，任弼

时听到有关方面反映，立即到了会场，看到那里一片混乱，里里外外贴着一些醒目的大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台上站着几个神情紧张而又害怕的青年干部，台下与会者正吵吵嚷嚷地让那几个青年交代问题。任弼时把负责专案工作的人找来，逐个地询问那些挨批斗的青年干部的情况，他边听汇报边看案卷材料，越看越气，说："这是怎么搞的？连同特务一起坐过火车也要算问题，真是岂有此理！"还说："有的青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但他们同家庭决裂，到延安来，就很不简单，能把他们都看成是'特嫌'、'阶级异己分子'吗！"之后，任弼时来到关押人的地方，对管理这些人的干部说："你们要注意，这里的生活标准不能随便降低，仍要按干部正常待遇，即使问题严重的人，也要讲政策嘛！"并对几位"审查对象"说："我们党历来实事求是，你们的问题迟早是会搞清楚的。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要振作起来，不要着急，更不要悲观。这也是一种磨炼和考验嘛！"说得几位"审查对象"泪水夺眶而出，久久地拉着任弼时的手。任弼时通过调查，了解了基本情况后，便急步向毛泽东办公的窑洞走去，如实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提出应采取措施，纠正审干中出现的偏差，即使确有问题，采用逼供信的形式也是错误的。于是，毛泽东立即召开会议，批评了康生的做法。之后又经过多次研究，以党中央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并由陈云组成一个新班子，负责干部的审查和平反工作。

任弼时党性强，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一天，江青找任弼时，要求给她批一些布，准备在窑洞前搭个凉棚，供她休息用。任弼时当即拒绝了她的要求，并说："前方部队连穿衣都困难，怎么能拿出布来做凉棚呢？"江青在任弼时面前讨了个没趣，并不甘休，又找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求她向任弼时说说情。陈琮英很生

气地对江青说："我们共产党不兴枕头风。"江青两次碰壁，只好作罢。

（三）谦虚谨慎，带头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

任弼时总是讲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成绩，谈毛泽东建党、建军的光辉思想和成功经验，很少讲红二方面军的成绩，即使讲到红二方面军，也大多是讲红二军团的成绩，讲红六军团的不足之处。一次，一位同志要他谈谈红二方面军整党整军的经验，他却说：红二方面军工作中的成功经验不多，不太好谈。那位同志看他不肯谈，便说："要是您工作忙，您就给我们介绍几个同志，让我们去采访。"任弼时知道这个同志和原红六军团的一些干部很熟，耽心红六军团的一些老战士夸大自己的成绩。就说："你找关向应他们，他们对情况了解很多。"结果，几位原红二军团的同志把任弼时的事迹讲得更多，尤其是谈到任弼时抵制和纠正夏曦所推行的"左"倾错误时更是赞不绝口，说这是办了件天字第一号的好事。当采访的同志谈到任弼时总不愿意讲自己时，关向应笑着说："这是弼时同志的老作风。"

任弼时不论对干部战士，还是平民百姓，从不摆架子，都是虚心相待。他刚到解放区时，战士们不认识他。有一次，他让一位战士教他刺杀，那位战士教了几次，见他动作不准确，就竖眉瞪眼地批评他："乱弹琴，象你这样还能刺倒敌人？"任弼时虚心接受，认真听从教练。当他动作稍有进步，那战士又拍拍他的肩膀说："不错，长进很大，照这样下去，肯定是一个模范赤卫队员！"过了一会，通讯员跑来喊："请首长去开会。"那战士一听愣住了。他一问，才知道这学刺杀的人原来是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脸一下胀得通红。任弼时却大笑着说："你不仅是个模范战士，还是一个好教练员！"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带头解剖自己。尽管湘赣边区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成绩很大，但在原湘赣边区领导同志的座谈会上，他作了长篇发言，严格检查了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省自己过去同“左”倾错误斗争不够的地方。并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向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被批评错了的同志道歉。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畅所欲言，弄清了思想，达到了新的团结。

在大生产运动中，他既是领导者，也是普通劳动者。他和机关的干部一起，在岭下开了一片荒地。地整好后，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种辣椒，有的说种茄子。任弼时笑着说：“不要争了，辣子也种，茄子也种，再种点黄瓜，黄瓜又脆又嫩，才好吃呢。”大家说：“哪来的菜种呀？”只见任弼时不动声色，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有辣椒种，茄子种、黄瓜种、还有萝卜、白菜种。原来这是他从太行山带回来的，他笑着说：“这叫有备无患。”另外，任弼时一有时间，就向过去当过织袜工的妻子陈琮英学纺线。由于他虚心好学，反复练习，技术提高得很快。在他的带动下，机关里出现了纺线高潮，原来强调工作多、没时间、好懒贪玩的干部也都摇起了纺车。任弼时还对纺车进行了技术革新，在纺车轮子和锭子中间，安上一个加速轮，加快锭子旋转的速度，结果使纺线速度提高了一倍多。在任弼时的提议下，中央机关还展开了一次纺线比赛，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比赛，周恩来、任弼时均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

总之，任弼时是一位平凡的伟人，他无声地战斗，默默地献身，恰似一匹沙漠里的骆驼，为着民族和阶级的利益，永远向前。

第十一章　一代共产党人对延安精神的实践

延安时期的一代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用自己的青春、汗水和热血，在同日本帝国主义，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是他们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凝结成了不朽的延安精神，昭示和哺育着一代代后来人。

一、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

“四·八”烈士王若飞，因叛徒出卖，从1931年10月到1937年5月在敌人的监狱里渡过了六年的时间。尽管敌人施用了各种手段：严刑拷打、百般利诱、甚至押赴刑场假枪毙，都不能磨灭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强意志。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王若飞讲：我生为真理而生，死为真理而死。我能为真理，为广大劳动人民而死，这是最大的光荣。出狱后，他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期间，他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三次赴重庆谈判，表现了杰出的外交才能。

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后，蒋介石用尽了各种手段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曾多次派人送钱送物感化他，但丝毫未能动摇叶挺的革

命意志。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一切“恩赐”，而且谢绝了国民党中一切同学旧友的个人馈赠，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风亮节。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写成的《囚歌》，正是他英雄形象的化身。当 1946 年 3 月出狱的第一天，有记者问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毅然回答：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天后，党中央批准他为中共党员。他曾对妻子讲：马列主义给了我理想和信念，党组织不断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劳苦人民服务，还能有什么！这铿锵有力的话语，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正气。

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化身——张思德，1932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入伍后便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在长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都会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在右腿中弹的情况下，仍坚持冲入敌阵，刺死敌人射手，一人缴获两挺机枪。为使大家安全走出草地，他冒着生命危险为大家“尝百草”，并为此中过毒。在横渡葛曲河时，有人不小心落水，他不加思索地跳下去，从旋涡中奋力救出了自己的战友。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组织上考虑他几次负伤，让他到荣誉军人学校去治疗、休养，而他到那里后扫院子、刷便盆、背伤员上厕所、为伤员洗衣服等，主动帮助护理员料理一切事务。在任中央军委警卫营的通信班长时，凡是天气恶劣，道路坎坷泥泞或路途较远的地方，他都是自己去。在生活上，张思德也是处处关心别人，鞋子不够穿，他就利用休息时间为大家打草鞋；饭不够吃，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去挖野菜、采野果，交给伙房。每次开饭，为让同志们多吃一口，他总是吃到一半就不声不响搁下饭碗，提起水桶去打开水。

在带领一个班上山执行烧炭任务中，张思德处处干在前头。砍

树，别人一天砍十七、八棵，他砍二十多棵。出窑是最紧张的、最累的时候，窑里温度很高，稍慢一点，风一吹，整窑炭就会着火，化为灰烬。每逢出窑，他总是抢先进窑，最后一个出窑。下山送炭时，别人背一包，他总是背两包。1944 年春，张思德主动报名到安塞县垦荒种地。不久，组织上派他带队去石峡谷山中烧炭。9 月 5 日中午时分，眼看一孔炭窑就要挖成，张思德和另一战士小白正在修整窑壁，顶上突然掉下几片碎土。“快出去，有危险!”张思德大喊一声，随即一把将身边的小白推出窑口。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二米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小白在窑口被压着半截身子，张思德整个身体被埋在里面了，为人民的利益，为战友的安全，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还有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延安，来到八路军所在的抗日前线，以其精湛的医术，满腔的热忱，救活了无数名八路军的伤病员，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此，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白求恩的精神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王若飞、叶挺、张思德、白求恩以及千千万万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平凡岗位上的劳动模范

为了全面建设边区，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人，忠于革

命，精于业务，勤于学习，善于创造，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特等模范李树槐，是朱总司令的卫士长，他忠于职守，为保卫朱总司令多次立功。每当朱德亲临战场时，他始终守卫在身旁，寸步不离，一遇险情即以自己的身体来掩护。他怕朱总太劳累，常劝朱总利用空隙时间休息，而自己却常常通宵不眠。在晋东南的一次反扫荡中，他竟连续三天三夜未合眼。他虽是卫士长，但从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承担警卫工作中最艰苦的任务。朱总每到一地，他都亲自观察地形，及时了解掌握敌情，对警卫工作进行周密布置，不仅经常巡查周围岗哨，而且夜间还亲自参加守卫值班。朱总乘坐卡车时，他让其他警卫员坐在车厢内，自己则站在车前驾驶室门旁，饱吸风尘，一丝不苟地守卫着朱总司令。

一次，朱总到一所抗日军政学校做报告，有个被日寇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提到讲桌上，请朱总喝，企图谋害他。但李树槐早有戒备，他机智地为朱总准备了一壶开水，亲自将桌上的茶水换下来，使朱总免遭毒手。后来，那壶水被四个不知内情的同志分喝了，结果都中了毒，经紧急抢救方脱险。李树槐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朱总日常需要的食品，他总是亲自筹集，细心检验，如发现可疑食品，自己先尝一尝，然后再请朱总食用。

李树槐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名誉地位观念，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同志都提升了职务，而他对长期从事警卫工作毫无怨言。正是有像李树槐这样的忠心耿耿，忠于职守的警卫战士，才有中央首长的安全，才能保障党和军队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新闻战线上，延安《解放日报》社的编辑吴冷西的事迹是当年人所共知的。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对我根据地实行野蛮

残酷的“三光”政策，一面在新闻广播和报纸上攻击共产党，宣传什么“日中亲善”等，便提出利用我们的新闻工具对日寇进行反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敌人的谎言及其罪恶行径加以揭露驳斥，大大提高了新闻宣传的战斗力。

报社的编辑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冬季的陕北异常寒冷，上夜班和早班的人，冻得实在难熬。但吴冷西在编报时曾经连续早晨上班三个礼拜，编完了报，又到印刷厂看校样，两三个人做的事情，吴冷西一个人便一声不响地做了。有时因工作时间过长，眼睛发红了，别人劝他歇歇，他只是微微一笑，仍埋头工作。

吴冷西不仅对工作认真负责，刻苦耐劳，且而为人真诚热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处处关心爱护同志，把别人的难处视为自己的困难，千方百计地帮助一些同志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难题。所以大家称他是“一匹精力饱满的战马，成日在战场上奔驰。”

中央警卫团有个模范排，排里有劳动英雄十三名，人称“状元排”。排长计应昌保卫中央首长立过功，曾获得战斗英雄光荣称号。他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总是吃苦在前，身先士卒，处处做表率。他们驻大台沟村的一年，参加生产劳动 250 天。他从未睡过午觉，天天写日记，安排战士们的生产和生活，晚上睡觉时常不脱衣服，一会儿察看岗哨，一会儿为战士理床盖被，早晨又去帮助炊事员做饭、烧水。他爱护战士亲如兄弟，为给大家改善伙食，他一天来回跑 120 里路去担蔬菜。他挑担上山为战士们送开水，水少时，自己一口也不肯喝。他把公家发的新鞋子、新衣服分给战士，自己穿破旧的。战士们看到排长处处带头，比大家的生活更艰苦，很受感动，对工作都抢着干，对困难都争着上。这个排在完成警卫、军训任务外，还办了两个农场，共耕种土地 1779.19 亩，连同副业生产共收获粮食（折合小米）352.97 石，可供近 200 人

一年的吃粮。他们开荒的速度快，质量也好，每人每天平均开荒二亩多。

这个排里有一个特等劳动模范杜林森，创造了一天开荒 6.35 亩的惊人成绩。1944 年，他一人开荒地 90.5 亩。

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领导身先士卒的作用下，劳动模范层出不穷，除上边所列之外，还有：烧炭英雄吴国俊，捞纸能手王国初，特等纺织能手杜河堤，模范会计员聂长林，种菜能手姬仲飞，等等。这些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英雄，集中代表了延安时期一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

三、廉洁奉公，艰苦奋斗

延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大家节衣缩食，勤俭办事，充分体现了革命者艰苦奋斗的本色。

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腹部受了重伤，弹片打进右侧肚子里长期未愈。按中央组织部的规定，凡一等残废军人每月发给残废金 30 元，可王稼祥却坚决不要。他说：我的生活和陕北贫穷的老百姓相比好多了，可以把这些钱省下来给有困难的同志嘛！由于王稼祥的伤势时常复发，再加工作很劳累，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军委后勤供给部批准他的伙食费可以实报实销，但他仍是每餐一菜一汤，很少吃肉，每月报伙食费，他都要亲自过问详细情况，绝不准超过伙食标准。

“彭总罢宴”的故事很多。一次，彭德怀到太行山区八路军某连检查工作，当时部队生活很苦，连队干部想给他弄点好吃的东西。于是，司务长从柳梢上捋点树叶当馅，把高粱面里加点榆皮面当皮，包了 100 多个饺子，准备给彭总和警卫员吃。彭总见了

后，问连里干部，战士吃什么？连干部照实说了。彭总严肃地说："为什么要给我单做呢？我到连队里来，应该和战士一样，战士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说完，就叫连干部把战士集合起来，当面把饺子分给战士尝尝，他和战士一样吃窝窝头。

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部队爬山越岭，行军打仗，很费鞋子。可彭总穿的那双布鞋，八九个月中一直没有换过。春天，鞋前头磨破了，两个大姆脚趾都要露出来了，走起路来，沙土直往里灌。警卫员要给他换一双新的，他风趣地说："穿着露脚趾头的鞋通风凉快，不长脚气，好处多着呢，换它干啥。秋天，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彭总的鞋底又磨穿了个洞，走起路来鞋里就灌满了泥水。警卫员又要给他换，他却说："鞋底穿了个洞又一条好处，里边存不住泥水，走起路来方便。"冬天，大雪纷飞，可彭总还是穿着那双破布鞋，坚持不换，说："运来的东西不多，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行军打仗，没有鞋穿怎么行啊！"

在延安，彭总的廉洁作风是出了名的，从不搞一点特殊。一件棉大衣穿了七、八年，补了三四个补钉，两处露出棉花。司务长拿着一件新大衣让他换，他就是不换，说："你们调查一下驻地老百姓的棉衣穿几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现在是战时经济困难时期，军民要同甘共苦，才能团结一致，坚持长期革命战争。你看，我穿着棉衣棉裤，还有一件棉大衣，比老百姓和战士好一倍，你说对吗？"

当年的中央党校，集中了大批党的高、中级干部，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边学习，一边生产，自己动手解决衣、食、住、用等问题。他们开办了农场、手工工厂、作坊、运输队、骡马店、供销合作社等。学员和职工毫无例外地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每人还配备一架纺车，

利用业余时间纺线。他们不仅生产自给绝大部分粮食、蔬菜和油肉，而且自己挖窑洞、建房子。开始没有床铺，就割草晒干铺在窑内睡觉；没有炭火盆，就用砖石垒土火盆；没有桌椅，就自制小木板凳，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记笔记。为了节约纸张，常常先用铅笔写，再用蘸水笔写，这样一个本可用两次。在1943年，他们苦干了一百天，建起一座可容纳2600多人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毛泽东为礼堂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成为全体学员和职工的座右铭。

王家坪抢种队，是一支冲锋陷阵的突击队。他们当中有高级作战参谋，有久经沙场的领导干部，还有机关商店的“买卖人”，在春耕大忙季节都成了开荒种田的“庄稼人”。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不仅能率军打仗，而且带领学员出色地完成了生产自给任务。

由于一代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使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抗日民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四、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

贺龙是延安时期联防司令部司令员，兼管财经方面的工作。一次，他召开会议解决两个大干部在工作中闹矛盾的问题。在会上，双方各自都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和问题之所在。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展开讨论后，大家都觉得问题越谈越多、越复杂。其实，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只不过是相互之间有意见，各不相让，使问题不好处理。最后，贺龙讲话了，他说：“你们双方谈的都是自己对，对方不对，而且是自己一切都对，对方却一无是处。你们两个都是我领导的，现在发生了问题，这首先是我的责任，我

应该对你们双方负责。事实上，这只能说明我不好，我有责任。”这么一讲，闹意见的双方都坐不住了，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会议的决定，使问题顺利地解决。这正是毛泽东曾指示的，工作中发生了问题，领导首先应多负责任。贺老总在自己的实践中身体力行了。

彭德怀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更严。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比起批评别人来还要令人感动。他常说：“‘吾日三省吾身’，究竟做到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一个古人都能这样要求自己，我们是共产党人，应该比古人高明些吧！我是一月一省吾身。不管工作怎样忙，每月总要抽出半天时间把自己做过的事认真地检讨一番，看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以便少犯错误或不犯严重错误。”

1947 年 6 月的一天，炊事员上集市去买菜，看到新鲜的黄瓜，就请示管理科长同意买了 20 条黄瓜，用围裙包着，高高兴兴回来，正巧让彭总碰上了。当彭总听说两千块（边币）一根时，没说什么，气呼呼地走了。第二天，是党的生日，彭德怀在干部会上专门讲了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讲着讲着，他作开了自我批评，说：“大家都说我彭德怀艰苦朴素。其实呀，名不符实！我昨天一下子就买了 20 根黄瓜。一根两千块，20 根四万块。我一下就化掉四万块钱啊！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老百姓舍得吃黄瓜吗？舍不得。那我们这些人就应当吃吗？战争打得这样苦，二纵队过沙漠的时候就渴死 3 人，我们应当多为战士们想想呀！老百姓自己勒紧裤带来支援我们，他们的负担已经够重了。多浪费一分钱，我们都应当觉得惭愧！可是我买黄瓜却化了那么多钱。我现在向大家作检讨，并保证今后一定改正，请大家都来监督我。”

彭总时时刻刻想着广大战士，想着广大人民群众，为了他们

的利益，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进行自我批评。

王稼祥一向谦虚、谨慎，从不贪功诿过。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他参加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胜利，都起过重要作用。但他从不对人讲自己的历史功绩，却经常在同志们面前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常说自己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和教训。

人都会有缺点、错误，可贵的是敢于正视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叶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勇敢地告别过去，走向未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海外回来，在延安的欢迎大会上，他说：“过去的那一段，好比爬高山，朱总司令等同志不怕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我呢，只爬到半山又折回来了。今天，我愉快地来向同志们学习……”

延安时期的一代共产党人，心怀坦白，从不讳疾忌医，尤其是在整风运动中，他们从思想、工作、历史等各个方面完全地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错误，认真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

上述可见，延安时期的一代共产党人抱着远大的理想，为着人民的利益，在各个岗位上脚踏实地地工作着，不畏强大敌人，不怕艰难困苦，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他们的精神，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延安精神。

第 四 编

在新的历史时期
要继承发扬延安精神

第十二章　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它发端于井冈山时期，形成于延安年代，发展于建国前后，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延安精神的价值是永存的，表现形态则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延安精神所以能够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汇集，它有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给延安精神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研究延安精神的历史发展，把握延安精神的新内容、新特点，对于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和实践

延安精神的发展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任务和党内外状况，延安精神的发展又呈现不同的状况和特点。

从全国解放前夕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是我们党继承和发展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

展主要表现为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所走的道路和所处的国情，深刻地总结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建设的经验，并针对全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主要是：建立和运用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脱离群众等等。这不仅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延安精神在新形势下赋予了新的内容。

（一）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全国胜利以后，我国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权？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了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八年的经验，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1369页）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二者相结合的制度。并"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同上书第1635页）根据这一思想，全国胜利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建立和强化了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且还依靠政权的力量，完成了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后期作战任务；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大运

动；进行了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和建设，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完成了“一化三改造”的任务，从而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使中国逐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必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6页）鉴于党的中心工作由农村转入城市，由战争转入经济建设，毛泽东向全党同志发出努力学习经济建设工作的号召。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同上书第1417、1418页）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需要，全国胜利后，我们党抽调了大批思想政治素质好、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充实到经济战线和城市管理部门工作，并通过大专院校和党校、干校、工农速成学校培养了一批懂经济、会管理的干部，同时还启用了一大批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城市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我们党根据任务的变化及时转变了自己的工作重心，狠抓经济建设工作，所以，我们仅仅用了三

年的时间，就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八百万增加到一千六百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了，到1957年底，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完成原定计划的101%。五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这期间城乡人民的生活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三）必须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

全国胜利前夕，针对我们党即将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及时提出把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思想。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滞起来不求进取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因此，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1949年10月，毛泽东复电延安人民，号召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由于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加上解放之初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急剧变化，致使党内一部分人逐渐滋长了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的作风。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金钱美女的侵蚀和利诱下，陷入了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的泥坑。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迅速腐化堕落的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针对这一情况，1950 年，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1951 年春天，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整党从 1951 年下半年开始，并分期分批进行。在进行“三反”的单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单位结合“三反”进行，到 1954 年春基本结束。在总数为六百五十余万的党员中，共有四十一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这次整党，加强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纯洁了党组织。

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为此，从 1955 年底到 1956 年 3 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听取了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1956 年 9 月 15 日到 27 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的思想路线，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大会指出，我国的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上来。党的“八大”提出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它不仅给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也给党的各方面建设，给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党的“八大”全面总结了我们党执政七年来的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八大”的预备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一项长期任务的观点。他说，党的“八大”应该继续发扬我们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则比较全面地提出执政党建设的新理论、新观点：一是报告总结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正确分析了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二是报告指出，由于我们党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因此，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三是报告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报告还分析了在目前，党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缺点，在总的方面说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

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因此，必须正确地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调动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报告指出，集体领导的问题，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会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并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出发，在提出要爱护党的领袖的同时，强调“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五是报告指出，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帮助党员和党的干部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同时，要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并经常地进行整党整风。

党的“八大”提出的这些党的建设的新观点、新理论，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从党的“七大”到“八大”，我们党取得了两个伟大胜利：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一个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胜利。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由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深入广泛的继承和发扬，全国也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蓬勃向上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延安精神的曲折发展，延安精神发展的典型形态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经过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失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

下，延安精神也只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1957 年至 1959 年，延安精神有发展也有挫折，其表现是：1957 年 2 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所阐述的十二个问题，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其中，关于社会主义阶段主要矛盾的观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方法，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关于“双百”方针，关于勤俭建国、励行节约，关于造成“一种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要求，等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原则，都对社会主义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搞好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1957 年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次运动和斗争却扩大了敌情，扩大了打击面，在全国划定了五十五万个右派分子，误伤了一大批党内外同志和朋友，使这次整风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应该指出，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指导整风运动，无疑是对延安精神的一个丰富和发展，然而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尤其是用“四大”形式代替和风细雨式的思想教育，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损害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错误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不良作风在全国严重地泛滥起来。所谓“三面红旗”运动是理论脱离实际、政策超越阶段的典型产物，它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9 年的庐山会议，原是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而举行的。然而会议期间毛泽东错误地改变了会

议的方向，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使党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一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残酷打击。庐山会议的中途转向，使延安精神在五十年代的后期发展又一次遭受挫折。

1959 年至 1966 年，我们国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随后又进行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这一阶段，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未得到彻底纠正，但在经济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党开始清醒起来，并逐渐对“左”的错误开始加以纠正。在此期间，延安精神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共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1959 年至 1961 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对此，党和全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节衣缩食，奋发图强，一手抓粮食，一手抓石油，终于渡过了难关。著名的大庆石油会战所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就是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写照，就是这一时期延安精神的反映。1964 年 10 月，我国自行研究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谱写了一曲国防科技战线自力更生的凯歌。二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由于三年“大跃进”，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到 1960 年下半年，我们党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端正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1961 年要搞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年 3 月广州会议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下乡搞蹲点调查。全国省、地（市）县领导

同志也都纷纷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建国以来最广泛的一次调查活动，是贯彻“八字”方针，克服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大举措。这一年，仅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就派出十多个工作组，深入农村和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农业六十条》之后，又制定了《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这些条例草案，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对理论结合实际纠正“左”的错误，贯彻“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发扬党内民主，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几年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着重讲了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动员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并请同志们“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深入到各组参加会议，听取地方同志对中央工作的批评。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66年至1976年，我国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十年间，党的各项事业受到巨大的损失，延安精神的发展也遭到严重的挫折。当然，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文化大革命”这

场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区别开来。“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从内容到形式对延安精神都是否定的。但在这一期间，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共产党员，在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中，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导弹试验成功，人造卫星上天，对外工作打开新局面以及“四五”运动，表明了在“文化大革命”这块历史怪石的重压下，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抗争，并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回顾我们党从 1956 年到 1966 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实践，虽然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工作有“得”有“失”，但“得”是主要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期间，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党中央的号召和身先垂范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的身体力行下，我们党不仅继承了延安精神，而且在实践中发展了延安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延安精神形态，这就是大庆铁人精神、雷锋精神。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由大庆油田和这个油田先进工人阶级的代表王进喜创立的。大庆油田位于黑龙江省松辽盆地中部。大庆石油会战是在 1960 年我国经济极端困难，而会战的地区和条件又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开始的。当时，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造成的危害，加上自然灾害和原苏联中断对中国的援助，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十分困难。1960 年，国家给石油工业的投资只有十亿元，1961 年又减少了 52%。大庆处于边远牧区，尤其是会战开始，几万人拥到茫茫的大草原上，头顶蓝天，脚踏草原，天寒地冻，既无房屋，又缺少运输工具，甚至连锅灶、用具也不

齐全。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庆人坚持用“两论”（《矛盾论》、《实践论》）统一思想，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没有房子，就住“干打垒”和地窝子；没有运输工具，就靠手拉肩扛；没有粮食吃，就自己开荒种地。大庆人就是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大庆油田从1960年会战至今三十年来，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坚持用“三老四严”（三老，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即对待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作风培养管理队伍，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中，锻炼出一支有政治觉悟，有一定技术素养，干劲大，作风好，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职工队伍，造就了一代新人。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促进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大庆是中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大庆精神是中国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

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是密切相联系的。“铁人”王进喜是大庆石油会战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的最突出代表。王进喜出生在甘肃省玉门赤金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八岁时便开始给地主放羊、放牛，以顶租还债，十五岁到玉门油矿做苦工。全国解放以后，他迅速成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钻井队长，并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60年，他奉命从玉门油田带领1205钻井队来到大庆油田后，一不问吃，二不问住，以“宁可少活几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气概，投入了大庆石油会战。王进喜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象炽烈的火焰，燃烧在百里油田。钻机到了，但没有运输工具，他就带领职工肩拉手搬，硬是把五、六十吨的钻机部件御下火车，运到现场，并竖起了井架。开机时，需

要大量的水调泥浆，但当时既没有铺设供水管线，水罐车也很少，他不等不靠，带领职工从一里外的水泡子里，用脸盆一盆盆地端水，争时间提前开钻。为了防止井喷，急需加大泥浆比重，但现场没有搅拌设备，他就带头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防止了井喷事故的发生。王进喜有句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1205 钻进队从安装第一台钻机到第一口井钻完，他连续七天七夜不下"火线"。当地老乡感动地说："王队长可真是铁人啊！"以后王进喜领导的 1205 钻井队年年月月超额完成钻井任务，被树为油田标杆钻井队，王进喜被树为油田第一个标兵。从此，学"铁人，做铁人"的活动在油田开展起来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王进喜的带动影响下，大庆油田涌现出许许多多象王铁人这样的先进模范人物，铸造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铁人王进喜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的集中体现。1990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1 日，江泽民在视察大庆时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大庆精神。他在看望铁人的家属和子女时说："王进喜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铁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仅石油战线要学习，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各行各业都应该学习。有了这种精神，任何人想压垮我们都是不可能的。"

雷锋在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先后题词赞扬雷锋精神。从此，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为什么一个普通战士能够引起领袖的注意，并号召向他学习？这是因为雷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看似平凡，实则不平凡的业绩，所以才能在千千万万平凡人的心里产生

共鸣，激起时代、民族精神的波澜。雷锋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出生不久，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哥哥、弟弟等亲人就先后被旧社会贫困疾病折磨死。雷锋从小就饱尝了旧社会的苦难。1949年家乡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送他免费上了学，戴上了红领巾。新旧社会的对比，使他从小就无比热爱党，热爱人民政府，热爱社会主义，并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政府。雷锋高小毕业后，曾先后当过乡通讯员、县公务员、鞍钢推土机手。1960年雷锋参了军，在沈阳部队工程兵某团运输连当汽车兵。雷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当县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当推土机手，曾先后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十八次被评为标兵，五次被评为红旗手；当汽车兵，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多次。他被沈阳工程兵党委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并是抚顺市人民代表。雷锋从出生到1962年因公牺牲，仅仅走完二十二年的生活历程，但他的革命精神，却永世长存，永葆青春。雷锋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的钉子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螺丝钉精神；不知疲倦，孜孜进取的精神；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精神；生活低标准，工作高要求的精神；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精神；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等，曾教育了几代人，鼓舞了几代人，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雷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平凡，就在于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雷锋精神更贴近生活和时代，更容易被人感受和学习，也更应该被普遍提倡和学习。这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谁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从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号召向雷锋学习至今已有三十来年了。三十年来学习雷锋的热潮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一浪高于一浪，全部道理就在于此。

除此之外，五、六十年代，还涌现出人民公仆的杰出代表——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焦裕禄领导兰考县人民治理风沙盐碱的艰苦奋斗业绩，他那种心里只装着兰考县人民而唯独没有自己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也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总之，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些精神是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延安精神的典型形态。这些精神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体现了延安精神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使之更加典型化、具体化，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些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它所体现出的爱国求实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永远不会过时，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鼓舞我们克服困难、奋勇向前的巨大精神支柱和动力。

三、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中丰富了延安精神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为恢复、发扬和光大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可以这样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探索、形成的过程，就是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的过程；没有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继承和发扬光大，就不可能产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主要表现在：

（一）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破坏，针对当时“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如果不破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中国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为此，他反复强调，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两条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在邓小平的关心支持下，1978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禁锢，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次讨论，基本达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那几年，邓小平还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定。同时，在全党全面开展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的形式和确立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把延安精神从党的作风问题提高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并对延安精神的实质和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决议》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个论断第一次揭示了延安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关系，是对延安精神的内容和实质的高度概括。

（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对延安精神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发展。从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科学概念，到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表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理论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一起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成为一项长期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它不仅从根本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确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同时，也丰富和拓宽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全社会理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内容和道路。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延安精神也将会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重大发展。

（四）把党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陈云同志在1980年11月谈到党风问题的重要性时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

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一观点提出后，引起了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并被全党同志所接受。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了这一观点，党的“十三”大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党的建设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一观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建设的理论，是对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这一观点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对党风问题的认识、立场和态度，为克服和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和各种脱离群众的腐败现象，继承和发扬包括延安精神在内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五）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基本路线，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里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把它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提倡的，从而使我们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实现“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争取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必须要有一种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精神，并把它作为一种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并不排除对外开放。应该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建设，无论在科学技术、资金设备、科学管理方面都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国通过

扩大开放，扩大国际交流，引进他们的资金、设备、人才，引进他们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为我所需、为我所用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建设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进行，可以避免我们走弯路，甚至不走弯路。因此，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扩大对外开放是不矛盾的。应该说，对外开放赋予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新的高度和内容。当然，在二者的关系上，我们应该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上。江泽民在建国四十周年前夕视察延安时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

（六）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一是靠教育，二是靠制度。制度建设是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端正党风的重要途径。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的"十三"大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党的"十四"大则进一步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这就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实践也反复证明，在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等方面，一是离不开宣传和教育。否则，再好的传统和作风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二是离不开制度。因为如果没有制度做保证，就没有对人行为的约束，就会放任自流，再好的传统和作风也难以坚持。只有把教育和制度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从思想和组织行为两个方面保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的继承和发扬。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在很多方面继承、发扬和光大了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回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延安精神，没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不可能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这一理论和实践又必将为延安精神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和用武之地。我们坚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延安精神将会更加发扬光大，并结出累累硕果。

第十三章　延安精神的现实意义

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和延安时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国人民的优秀品格在革命实践中的升华。在延安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伟大胜利。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弘扬延安精神，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十分重视革命理论的研究和创造。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也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全党，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的时期。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教育党员干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学习和借鉴延安时期的经验，对

于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会有重要指导作用。

（一）充分认识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重要性

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大力开展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总结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规律，写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内容，明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样，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任务和方法有了一整套原则。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的问题摆在了全党面前。七大正式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使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阐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基本路线、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上做出了理论的回答。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概括了我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的最重要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它所回答的、解决的都是关系全面、决定全局、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补充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这个理论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理论基础和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最重要的是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一经同群众实践相结合，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

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党的十四大确定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必将使全党达到新的统一和团结，引导我们党和人民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二）改造全党的学习，确立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民主革命时期，在一个长时期中，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的不正派学风。在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中，王明的教条主义最为严重，对革命的危害最大。这种教条主义抽象地、无的放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是掌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在党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主观主义是我们的大敌，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以后，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他把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称为科学的态度，称为“有的放矢的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只有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叫做“理论联系实际”。著名的延安整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党史上的大是大非，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分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下解放出来，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坚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书本出发。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书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的产物。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在全党树立一个正确的学风，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工作，边学习边贯彻。任何正确的理论，只有结合实际，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和威力。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落到实处，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实际行动，切不可搞学习上的形式主义，走过场，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背离。

（三）党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中级干部要带头学好用好

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中级干部要带头。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因此，"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4、119页）领导干部学习掌握得如何关系到能否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物质力量，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命运。

当年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但它的重点，是当时党的高中级干部，对此，毛泽东同志有非常明确的指示："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要"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指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致聂荣臻》，《延安整风运动》第30—31页）鉴于以往的错误主要发生在领导机关，鉴于高中级干部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在延安整风中始终抓住领导干部这个重点。

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的高中级干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的，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和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就会有一个新提高，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就会取得更大的主动权。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和运用，还会促进广大党员和群众更好地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变成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

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认真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在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根本，在变幻莫测的事物发展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要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中形成的，离开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样，毛泽东思想也是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1941年8月，中共中央为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就边区发展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盐业和发展军队生产事业，以及机关学校的生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写出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文章，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公私兼顾等一整套解放区经济建设和生产运动的措施，保证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邓小平同志正是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系统周密地调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对它作出新的总结和概括，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任务。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今天，问题多，情况复杂，更需要我们深入实际，到群众中和实际中去，扎扎实实地进行调查，认真听取实践的呼声，把调查、研究、督促和总结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们的工作就一定可以做好，就可以把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落到实处，就可以开创新局面。

二、实事求是，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延安精神的精髓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找到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精神对王明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胜利。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进一步从思想上理论上与王明路线划清了界限，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武装了全党。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改革开放方面的每项重大成就，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延安时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一）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

延安时期，由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党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中国人民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延安精神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时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由此得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为此，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

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确立起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突破；改革开放的实行，是对高度集中的僵化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的突破；“四项基本原则”虽然不是新提出来的，但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强调并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因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党的基本路线渗透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是经济建设。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必须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创造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来保证最大地限度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因此，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党的凝聚力，这就是有力的证明。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更不能离开和放弃这个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要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党是否牢牢抓住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成为能否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凝聚起来的关系战略全局的中心问题。我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清楚表明，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我们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发展经济，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了，就能进一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正是我国加速发展的好机会。要紧紧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使我国经济更

快更好地发展。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二）坚持实事求是，才能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实事求是是防止和克服“左”和右的错误的思想武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在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上，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既反“左”也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反对那种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由于克服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使党的政治路线得以正确贯彻执行。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过程中，也存在着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要保证，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社会就会动荡不安，社会主义现代化难以建成；不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活力和生机就会被窒息，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也建立不起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如既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则，又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又允许

多种分配形式存在。既引进外资扩大对外贸易，又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些政策防止了“左”的或右的偏向。

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过程中，我们反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错误倾向，同时反对思想不解放，用僵化的思想对待改革开放的“左”的错误倾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今天，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思想方面的深刻原因。在我们国家，封建统治有着悠久的历史，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的眼界狭窄，容易狂热，产生唯意志论。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左”的错误连续发生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错误不断重复的社会历史根源。在社会主义时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只强调反右，不注意纠“左”，似乎越“左”越革命。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揭示了“左”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与右相比，“左”具有迷惑性和恐吓性，它涂着很“革命”的色彩，摒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它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用僵化的教条扼杀社会主义的生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能正确判断出一个时期，什么是主要倾向，就能从认识论的高度彻底揭露“左”或右的错误本质，就能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会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开拓新局面

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对国内外、党内外的形势做了深入分析后做出的

战略决策。当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党在敌后根据地站住了脚根，在人民群众中扎了根，对国民党顽固派及其反人民的活动，也有了斗争经验，日本帝国主义尽管还是把侵华兵力大部分用来对付解放区战场，但是他没有力量把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吞下去，而我们战略反攻的时机还没有成熟。1941 年和 1942 年，解放区虽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是暂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区就处在时局较少变化的时期，为了战胜困难，积蓄力量，迎接大发展局面的到来，迎接革命事业在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制定了十项政策，这十项政策中又以生产和教育两项是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实践证明，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展自己这一战略决策是高瞻远瞩的。革命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善于从战略高度出发，实事求是，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就会加速胜利的到来。

现在我国又面临一个抓住有利时机发展我们自己的战略性问题。目前，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使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邓小平同志从整个战略出发，提出抓紧利用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看准了就大胆地闯，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如果错过时机，就要误大事。这是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提出的问题。目前，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加速了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尽管世界依然不安宁，但短时期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和一些近年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与地区，面临着经济结构新一轮调整，资本在寻求新的出路。从国内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在国际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

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国际竞争十分激烈，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也较快，我们的市场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内再上一个新台阶。

延安时期，由于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开拓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新局面，直到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现在，我们同样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必将迎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三、结合新的现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党的思想建设的问题，就是党员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的问题，其根本任务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改造党员，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使党员的思想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延安时期，我们党创造了党的思想建设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当前，我们党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思想建设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研究延安时期思想建设的经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具有重要作用。

（一）坚定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不动摇

理想和信念是人们创造生活、创造历史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当年的延安，是革命的熔炉。来自各地的革命青年，有出身贫苦的工农子弟，有出身豪门的富家儿女，有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有志之士，能

够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而顽强奋斗呢？这就是理想和信念的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岁月里，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无论受到什么挫折，广大党员和群众，能够同仇敌忾，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充满必胜信心。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集中解决好对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的认识。延安时期，我们党深刻论证了中国人民对新民主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前途选择的正确性。毛泽东同志不仅论证了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同时指出，由于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力量状况，特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把革命前途引导到社会主义前途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在哪里呢？它就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它就新在农民在民主革命中不是资产阶级的附庸，而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成了革命 的主力军；它就新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不是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建立起一个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中国革命必然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延安时期，集中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因此，坚定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胜信心。今天，我们党深刻论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的正确性，系统地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方面，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加强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加强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对于消除在当代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些困惑和疑虑，对于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提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另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行动纲领的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指出："在现实，毫无疑义，应当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实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同时又指出要注意"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把观察问题、研究学问、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同做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区别开来"。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搞好思想教育工作很有启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教育党员正确认识党的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关系。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了全民族所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成为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开拓前进的精神武器。这可以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个共同理想和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它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的奋斗目标，我们共产党人把实现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当做是实现

党的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因此，共产党员在今天，就必然为实现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而奋斗。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真正的共产党员，既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充满必胜信念、胸怀宽广的革命乐观主义者，又是最富有创新精神，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必须教育党员正确认识共产主义理想和执行现行政策的关系。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党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总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各项具体政策。在现阶段，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是全党的根本任务。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党制定了改革开放中的各项政策，如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首先富裕起来，其目的是为了推动和促进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而不是搞两极分化。因此，在执行现行政策中，只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才能抵制错误思想的干扰，正确地理解和执行现行政策。

（二）坚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全党的唯一宗旨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活动的目的，是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作为党的宗旨，并且作为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标准。这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先后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强调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共产党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

级立场上，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应当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5—996页）毛泽东同志还以白求恩、张思德这些光辉形象，谆谆教导人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倾听人民的呼声，和人民打成一片，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下，培养出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有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放松警惕，不能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危险会更大。从我们党目前的状况看，大多数党员、干部都在积极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这是主流，必须肯定。同时，也确有一些党员背离了党的宗旨。有些党员不从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出发，搞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有些党员滥用手中的权力，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当作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损害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有的党员贪脏枉法，实际上已堕落成为腐败分子。这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我们必须认真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的教育，把它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

内容，使党员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摒弃一切从个人及小团体私利出发的种种行为。党员干部更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全体党员必须明确认识到，无论形势、环境、任务发生什么变化，工作方针和具体政策有什么不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能改变。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呢?

第一，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民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抵制个人主义价值观，在人类历史上，不同阶级、政党、国家，它们的价值观念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把个人主义作为基本评价标准，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则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基本评价标准，形成以人民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核心。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表现为个人至上、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等。共产党员坚持以人民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就必须自觉抵制那种以个人为本位，以自我为核心的，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价值观。坚持以人民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就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利益也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共产党员不仅要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实际工作，去促进这种利益的实现，而且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二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集体的利益体现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要关心、爱护集体，乐于为集体做贡献。当党员所在集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党员要带头并说服群

众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三是贡献和索取的关系。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这决不排斥和否定共产党在政策、制度范围内所许可的个人利益。党员可以在现行政策的范围去获得合法的个人利益。但是，党员本身的活动不能仅仅以是否符合现行政策的要求为依据，而首先必须以党对自己的要求为依据，不能以现行政策为借口，降低对自己更高的要求。党员的真正价值在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之中。为人民服务得越多，越好，对人民的贡献就越大，就越有价值。

第二，必须增强公仆意识，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增强公仆意识，是党的干部坚持宗旨的关键。它包括增强把人民给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办事的意识，一切向人民负责的意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意识。如果只看到自己是领导者，忘记了自己是人民公仆，颠倒了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在增强公仆意识的基础上，要自觉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有着多方面的要求，衡量一个党员干部能否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主要标志就是看他能否带领广大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本部门，本单位做出实绩，开拓出新局面，把第一流的工作成绩献给人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就要做到为政勤勉，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真正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第三，必须在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党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识到，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而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站在群众之上。在领导工作中，发扬民主作风，广开同群众联系的渠道，善于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加以引导，不能强迫命令，搞家长制。党的干部对上级决议、指示负责同对人民群众负责是一致的，不能分割，对立起来，搞官僚主义。党的干部只有始终保持同广大群众血肉相联，息息相关的紧密关系，我们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才能依靠群众的力量去实施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也才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

（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积极的思想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解决党员思想入党的一个主要方法。任何事物都是在自身的矛盾斗争中发展和前进的，党是这样，党员的思想也是这样。不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党员之间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势必使党内生活庸俗化，甚至窒息党的生机。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的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必须从思想上整顿，开展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说："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延安整风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首先着重思想教育，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思想上分清了辩

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界限，全党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今天，在党内认真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仍然是党的思想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遇到很多复杂的情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的对立和斗争，经常考验着每一个党员。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非无产阶级思想乘机侵蚀党的肌体，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又放松了党内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这就要求我们要自觉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搞好党的经常性的思想建设。但是，目前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党内思想斗争却出现一种疲软状态，思想斗争难以开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回避思想斗争，不管遇到什么矛盾，问题多么严重，有的装聋作哑，不过问，不兜揽，能躲就躲，甚至互相隐瞒、庇护；二是忌怕思想斗争，一谈思想斗争就“谈虎色变”心有余悸，产生一种感情上的厌烦与恐惧，甚至逆反心理，把正常的思想斗争同过去的“整人”联系起来；三是不善于思想斗争，在思想斗争中缺少方式方法，达不到思想斗争的目的，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阻碍了思想斗争的正常开展；四是空谈思想斗争，往往是在上面的督促下，形势的迫使下或制度的约束下才进行，应付交差。讲官话、套话、空话、不着主题，不接触实质性的东西，不触及个人的思想，隔靴搔痒，不疼不痒，空对空，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五是庸俗斗争，把党内思想斗争庸俗化，互相猜疑，纠缠旧账，无休止地“搞内耗”“打内战”，歪曲党内斗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思想认识上有问题，有的对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意义及必要性不了解或了解不够，认为有没有关系不大，无关紧要，有的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栽花，少栽刺”，

有的怕日后遭“冷处理”，打击报复，穿小鞋等等，使相当一部分党员对党内思想斗争采取消极态度，另外，缺乏必要制度的制约，缺少保护批评者的具体制度，对打击报复者缺乏遏制措施，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

怎样才能正确地进行党内思想斗争呢？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是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办法。毛泽东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统一思想认识，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同志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方面，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以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和批判，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另一方面，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要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了错误的人，只要真正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把它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的目的，科学地体现了党内团结斗争、巩固发展的辩证法。这个方针的提出和实践，既克服了党内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倾向，也纠正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斗争的倾向，使延安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天，我们党已成为执政党，如何继承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党能够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政治生活就正常，我们的事业就蓬蓬勃勃地发展。什么时候，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被消弱，党的政治生活就不正常，我们的事业就受到损害。我们要真正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还需要做出很大努力。要认识到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和新的环境里，党内总会滋

生各种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需要经常“洗脸”、“扫地”，以保证党的肌体健康。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坚持并改进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提高组织生活的政治性、思想性、原则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还要带领广大党员通过批评错误，澄清思想和明辨是非，统一党内认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

四、艰苦创业，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

艰苦奋斗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品格，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传家宝。把艰苦奋斗归结为延安精神的是毛泽东。他在《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电报中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坚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于端正党风，密切党同群众的关系，保证改革和建设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艰苦奋斗，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势力特别强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艰巨的，历程是曲折的，斗争是残酷的。我党扎根延安之时，正值民族危难之际，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

战争及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拯救中华民族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然而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当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之时，蒋介石集团却公然连续掀起反共高潮，并对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严峻形势的考验面前，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投入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在艰苦奋斗中，有效地克服了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物质困难；在艰苦奋斗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工作人才；在艰苦奋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风格和作风。艰苦奋斗精神全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肩负历史重任面前应有的高贵品格和精神风貌。今天，我国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物质生活水平远非延安时期可比。应该看到，我们在一个拥有 11 亿人口的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困难是很多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比别的国家付出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来解决人们的衣、食、住、用、行的问题。我们在人口多，底子薄，起点低，问题多，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重任。在这个重任面前，我们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经过长期奋斗，才有希望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要求

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从生与死的抉择中迸发出来的，而且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必然升华而来的。它作为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激昂的革

命热情和求实的科学态度融合于伟大革命斗争实践的具体体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自强不息，开拓进取，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虽苦犹荣，乐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的综合显现。中国共产党是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有着根本区别的新型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决定了全党同志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腐化堕落。在历史上，革命阶级通过革命取得政权之后，都要经受拒腐防变的考验。旧时代的革命者由于受自身阶级局限性的限制，一旦政权到手，必然反过来剥削压迫人民，因此他们都不可能摆脱从艰苦奋斗到腐化堕落的历史周期。无产阶级政党与此不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新型政党，党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和特权，而是为了彻底解放全人类。这种特有的先进性决定了党能够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能够防止重蹈旧时代革命者成功后走向腐化堕落的覆辙。需要指出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要特别注意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重视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和克服腐败现象。党执政以后有了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也还是存在着腐化变质的危险。对于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我们党不是束手无策。党的先进性赋予党一种自我净化的能力，即依靠自身的力量扫除一切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刘少奇同志说："如果把我们的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末，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肌体，它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后，更会增加身体的免疫力。"（《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15页）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充分发挥自我净化的能力，采取果断而有效的措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就

一定能够消除腐败现象，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作风。

（三）艰苦奋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的创新事业，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更何况我们国家面临着新的世界挑战，如果不能把握时机，改革自强，中国就很难在未来时代站稳脚跟。如果离开了艰苦奋斗精神，我们的改革开放不可能成功，甚至会把已经取得的成果丧失掉。因此，为了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为了国家的强大昌盛，为了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在改革和建设中带头艰苦创业，发扬民族精神，不屈不挠，顽强奋斗。

值得深思的是，有些共产党员，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对党一贯倡导的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却逐渐淡忘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逐渐丧失。有的吃苦精神没有了，工作不求进取，不负责任，松松垮垮，得过且过；有的贪图安乐享受，追求的是舒服，工作条件要好，生活条件要阔；有的为追求享受和安逸，竟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吃请受礼、游山玩水，为满足个人享受，不惜挥霍国家资财；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已腐败堕落，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践踏党纪国法，铤而走险。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条件看，一是对艰苦奋斗的宣传教育少了，薄弱了，使艰苦奋斗精神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逐渐淡薄了，以至丧失了；二是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在是非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党员对自己要求放松，各种不健康的思想乘虚而入；三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缺乏免疫力，以至于迷失方向，经不住改革开放的考验。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扬延安艰苦奋斗精

神，一方面，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绝不能靠幻想、靠空话、靠发议论，而要靠发奋图强，埋头苦干精神。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是由千千万万平凡的工作汇集而成的。只有每个共产党员都一步一个脚印，立足本职，认真扎实地做好各项工作，用我们的双手去开拓，创新，艰苦奋斗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要廉洁奉公，反奢崇俭。经济要繁荣，干部要廉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今天，党政机关能否保持廉洁，关系到人心向背和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这是每个党员、干部必须清醒认识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政府是廉洁奉公的政府。但是，在党政机关中，却有腐败现象存在，这些腐败现象，腐蚀着党的肌体，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社会风气。因此，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不以权谋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为群众作出表率，培养和树立时代需要的奉献精神、拼搏精神和创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同心协力，共同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艰苦奋斗。

第十四章　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延安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它留下的宝贵时代遗产——延安精神并没有过时，仍然熠熠生辉，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视察延安时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曾经哺育了几代人，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精神支柱。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它仍然是鼓舞我们开拓进取，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大胜利的巨大精神动力。

一、时代呼唤着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延安时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近代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产物。同时，它又总结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成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又把这种精神变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精神武器、克敌制胜的法宝，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历史和现实是相通的。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代中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所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延安精神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干部，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团结友爱、顾全大局的精神，等等，永远不会过时，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巨大的精神动力。延安精神在今天，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具有强大、广泛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延安精神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属于未来，这正是人民呼唤延安精神，时代需要延安精神的根本所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人们为什么对延安精神如此关注？道理显而易见：面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面对现代化建设光荣而繁重的任务，面对改革开放中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使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在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真正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了。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个系统工程，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性的伟大事业。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什么“特色”的话，那么，这种特色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个开拓、创造性的事业，它没有什么前人或外

国人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开拓前进；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里进行的，人口多，底子薄，起点低，起步晚，包袱重，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乃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就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而最根本的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同时，还要看到，改革开放这十四年来，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发生过失误和偏差，现在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人民群众还有不少意见和一些不满意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要完成十四大提出九十年代的十项建设任务，还要靠党的正确领导和全体人民的艰苦努力。党的十四大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历来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事实证明，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走自己的路。这就需要大力弘扬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党培育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样，才能始终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去夺取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二）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也是加强党的建设，培养一支又红又专、高效廉洁的党的干部队伍的需要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

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还指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领导力量，而党的干部又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肯定，我们党从总体上讲是坚强有力的，党员和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由于种种原因，党内还严重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有些党员和干部经受不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在糖衣裹着的炮弹打击下打了败仗。他们或者动摇信念，搞自由化；或者思想僵化，怀疑否定现行的方针政策；或者以权谋私，甚至腐化堕落，违法犯罪，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干部队伍的形象，败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们走到这种地步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不懂得或者忘记党的包括延安精神在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事实给我们从反面敲响了警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党员、干部必须切实加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以增强抵御腐败现象侵蚀的能力。这对于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极端重要的，非常紧迫的。

（三）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和国内复杂的情况，要求我们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以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精神长城

自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后，国际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从50年代后

期开始，他们制定了“和平演变”的战略，利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暂时差距，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改革开放的机会，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去毒化、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经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的人”，他们尤其寄希望于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三代人、第四代人身上，使之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还在继续加紧对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和平演变。在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仍然存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还有一定的市场。这种思潮主张以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以私有化取代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以思想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恰与国际上和平演变的图谋遥相呼应。因此，我们在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抵御和平演变，已经成为我们最现实、最迫切的任务。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杜勒斯当年为什么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而不是寄托在第一代、第二代身上？其中原因十分明了，这就是，他们考虑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和思想因素。他们认为，在中国老一代革命者身上体现了十分强烈的延安精神，他们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传统作风，这正是抵御他们搞和平演变的精神长城。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当前，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和国内背景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效地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战略，防止“和平演变”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就必须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坚持用延安精神教育党员、干部，教育人民，尤

其是教育青少年，以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精神长城，消除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总之，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困难与希望并存的复杂国内外形势，遇到许多以往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顽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意志和廉洁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而延安精神正是包容这些精神、适应这一需要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在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实作用重大，意义深远，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二、为弘扬延安精神鸣锣开道

前些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和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受到了冷淡、讥讽，甚至无端的攻击和否定，而延安精神则首当其冲。什么宣传延安精神是搞夸大精神作用的“唯心论”，延安精神“过时论”，延安精神是一种狭隘意识”，延安精神很难被两代人同时接受的“代沟论”，等等，一时甚嚣尘上，不一而足。它严重地破坏了延安精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影响了人们的视听，成为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思想障碍。为此，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就必须剖析和回答种种淡化甚至否定延安精神的论调，理直气壮地为弘扬延安精神鸣锣开道。

（一）宣传延安精神不是搞夸大精神作用的唯心论

现在，有人认为我们宣传延安精神是在那里搞夸大精神作用的唯心论。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对于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讲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分界线不在于承认或否定理想、道德的精神的巨大能动作用，而在于这种精神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是物质变的。用这一基本理论观点衡量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则恰恰是来自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结晶。正因为这样，它可以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正象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我们现在之所以大力弘扬延安精神，道理就在于此。其目的是为了发挥精神的巨大能动作用，使之变成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要去搞什么"精神万能"的唯心论。

（二）延安精神没有过时

时下，有一种议论，什么延安精神是困难时期、封闭条件下、战争年代的产物；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年代，人民生活水平也今非昔比，言下之意是延安精神过时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延安精神是否已经过时，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和现实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延安精神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其基本点有二：第一，从事物的本质看，延安精神没有过时。什么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

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延安时期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所形成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思想道德、优良的品质作风的综合结晶。而它的实质，就是毛泽东同志一再倡导的，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一再强调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一再要求做到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延安精神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在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全部活动中的集中体现。它不仅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回顾建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成功；反之，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可以说，没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延安精神，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我们党的性质不变，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延安精神就不会变，就不会过时，正如江泽民同志题词所述："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第二，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运动看，延安精神没有过时。世间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延安精神也不例外。延安精神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延安精神的本质内容。而且还在于延安精神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它超越了时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和表现。如张思德精神、董存瑞精神、黄继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作为延安精神的典型形态，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教育人、鞭策人、鼓舞人的强大精神力量。可见，延安精神的本质是永存的，内容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表现形态是丰富多样的。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丰厚沃土，具有勃发的生机与活力，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当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同延安时期相比，有了翻天复地

的变化。我们今天强调要发扬延安精神，绝不是让人们再去住窑洞，去纺线织布，去开荒种地，而是让人们把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和作风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统一起来，以更好地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概括地说，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同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积极引导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勤劳致富、共同致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同努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进一步扩大开放结合起来；把提倡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同实行按劳分配的政策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延安精神，就能更好地发挥延安精神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能动作用。

（三）延安精神不是一种狭隘的“经验论”

有人认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时期的决策，属于局部、地区性的经验型决策，带有非科学性，至多表现为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天才艺术的决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知道，所谓经验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它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谬误性；另一种则强调对我们的实践经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加以分析、概括、抽象、总结，便成为了科学的理论和决策。它带有很大的科学性和指导意义。离开了历史实践经验讲什么科学理论，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先验主义的模式论。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派别，甚至比黑格尔都爱历史。延安精神、延

安决策之所以是科学的、正确的，主要鉴于两点：一点，我们党从成立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井冈山时期，直至长征到延安，有着非常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再一点，我们党的理论和决策不是这些经验的简单重复和反映，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高度概括、抽象和总结的结晶。我们仅从具有代表性的毛泽东同志的著述看，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中的158篇文章，其中，有92篇是在延安写的，如连同在陕北其它地方写的，共达112篇，竟占到全部文章的三分之二以上。事实说明，延安精神（包括延安所形成的理论和决策），绝不是什么狭隘的经验论，而是对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所得出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四）延安精神反映的不是农民的狭隘意识

有的人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革命，党的工作重心长期在农村，而中国又是一个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党内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和成分的人比较多，因此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延安精神反映的是农民的狭隘意识。

延安精神究竟是不是农民的狭隘意识？这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延安精神，还关系到如何看待党的性质。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客观事实。一个事实是：尽管我们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和成分的党员占绝大多数，但并没有改变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刘少奇同志指出："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5页）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根据自身的特点，历来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要求党员不仅在组织

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为此，中国共产党不但制定了严格的党员标准和入党手续，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不断加强对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克服和改造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使我们党在农民和其它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再一个事实是：延安时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时期。延安精神的形成、确立，延安精神的最大功绩，就是把农民的狭隘意识引导到无产阶级轨道上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党的建设的理论著述，而且在实践中培育出一整套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延安精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无产阶级精神、道德的集中体现，它对于改造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把它引导到无产阶级轨道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正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五）学习、宣传延安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两代人的"代沟论"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延安精神老年人能接受，年青人难以理解。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符合实际。我们认为，所谓"代沟论"是西方社会学中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观

点，至少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应该明确，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两代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灵魂是相通的，接受真理的愿望是一样的。但是，也应该承认两代人各有特点，各有长处和短处。如在接受延安精神方面，老年人由于自己的经历、阅历和多年受党的传统教育的原因，可能接受起来更亲切、自觉一些；青年人思想活跃，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但由于受经历、阅历所限，接受起来可能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和时间。这是正常的，是毫不足怪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正视两代人的共性和特性，做到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青年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忧虑所在，但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所以，我们迫切希望能够在老年、青年之间架起一座相互联系的桥梁。两代人的息息相通，团结无间，是巩固政治上的安定团结，粉碎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战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可靠保障。正因为如此，我们应针对青年的特点，采取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坚持不懈地进行延安精神的宣传和教育，使延安精神真正和青年融为一体，并代代相传。这样，我们的事业就有了无限的希望。

综上所述，延安精神没有过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延安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已愈来愈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一个学习、研究、宣传延安精神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具体表现为：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下，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身体力行下，一些老革命、老延安、老同志或为延安精神题词，或写回忆录，或亲自撰写文章，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在全国及各地区成立了各种研究延安精神的学术团体，一个以老革命、老延安、老同志，以及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教授、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组成的研究群

体正在形成，并先后多次召开延安精神学术讨论会，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一些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及党校、干校把延安精神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或学员进行深入的延安精神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延安大学、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和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如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坚持用延安精神教育人，以史为镜，以史明理，以史知今，切实打牢学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思想根基，提高了学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与坚定性。这个学院从 1978 年开始，在学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先后挤出 70 多万元，在延安北郊选地盖起 2600 平方米的窑洞式楼房，建立了一次可接纳 400 人食宿的教学基地，并专门组织力量编写了教材和教学大纲，制定严密的教学实施计划，坚持把延安革命传统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纳入正常教学。14 年来，这个学院采取实地考察与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共组织 41 批学员赴延安实地学习，培训学员 12000 人。14 年来，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的学员，人人都受过延安精神的洗礼。在一大批成为功臣模范的学员中，有 11 人被中央军委或大军区授予荣誉称号，478 人走上从团到军的领导工作岗位。一些地区十分重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努力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张家口市 1985 年开始抓青少年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1989 年下半年更明确提出向青少年进行延安精神的教育。这个地区的第六中学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延安精神的典型。该校自 1988 年以来，曾组织了“京张铁道行”、“长征古道行”、“黄河东西行”、“求索延安精神”等四次夏令营；举行过多次弘扬延安精神的讨论会、讲演会；在学生中成立了延安精神学习小组，并到其他学校、工厂、机关、部队去宣传延安精神，取得了教书育人的显著成果。有些地区、单

位还把学习、弘扬延安精神同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努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如1992年4月22日，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首钢总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有全国数十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参加的“职工当家作主与搞活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研讨会”。会议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结合学习弘扬延安精神，围绕职工当家作主与搞活全民大中型企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在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延安精神具有巨大的威力，它不仅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波及到深宅大院的高等学府。1992年署假，清华大学工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21名青年教职工前往延安参观学习，实地考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并写出高质量的考察报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北京大学于1992年成立了北大延安精神研究会，并对研究会未来发展作出了初步建议。在研究会的推动下，这所大学结合改革开放和学生的思想状况，多次召开各种类型和内容的座谈会，使青年学生更加了解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和任务，更加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

除此之外，延安精神还跨越了国界，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从本世纪30年代后开始，美国著名学者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就开始研究和介绍中国的红色革命。以后，在世界各地，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还有日本、印度、西欧等，都有研究中共党史和延安学方面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并相继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尽管这些研究成果有的客观公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的失之偏颇，甚至是歪曲诬蔑，但它表明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这就是：延安精神的价值是永存的。延安精神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已走向世界。

三、全部的工作在于教育和实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遵循两点：一是要按照灌输的思想，深入广泛地进行延安精神的宣传和教育。因为延安精神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它不是自发产生的，更不会在工人和人民群众中自发地得到继承和发扬，而必须象列宁指出来的，要依靠灌输的力量。你不灌输，延安精神就会被人们所遗忘，延安精神就会中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延安精神的中断就意味着变色。二是要本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结合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去实践和探索延安精神，以增强延安精神的生机与活力，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具体地讲，学习、研究、宣传延安精神要搞好三个结合。

（一）要搞好理论和实际的有机结合

首先要大力加强对延安精神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应该看到，解放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延安精神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而“文革”十年，延安精神又遭到了严重的歪曲以至抵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虽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扬，但是近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加上我们对革命传统、革命精神的宣传教育抓得不够有力，以致现在的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延安精神不十分了解，甚至有各种不正确的认识。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必要大力加强对延安精神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通过学习、研究和宣传，澄清人们对延安精神的各种模糊认识，加深对延安精神的内容和

实质的理解，提高人们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重要性的认识，从而使广大党员和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真正了解延安精神，接受延安精神，并在实践中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去，努力在实践中学习、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的丰富和发展也必将有赖于新的历史条件和斗争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对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而且也为延安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道路。比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它必将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千百万人民群众自觉参加的群众性事业，它必将要求我们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四化大业而奋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是一项长期的光荣艰巨的事业，它必将要求我们继续继承和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夺取现代化事业的最后胜利。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善于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在实践中去厉行延安精神，发扬延安精神。

总之，我们只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弘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才能发扬光大，发挥其巨大的能动作用。

（二）搞好领导和群众的有机结合

这是我们党的领导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

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既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需要，也是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弘扬延安精神的最有效的手段。搞好领导和群众的有机结合，一是在领导和群众的相互关系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延安精神，为广大党员和群众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是各项事业的带头人，他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广大党员和群众。现在，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是，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看领导，下面看上面。领导干部做出表率，党员、群众就能跟上来。当年，延安精神就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身体力行中形成的。今天，延安精神能否继承、发扬，并落到实处，关键也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因此，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发扬延安精神，努力做到：让群众振奋精神，坚定信念，自己首先要振奋精神，坚定信念；让群众遵守纪律，服从大局，自己首先要遵守纪律，服从大局；让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自己首先要苦奋斗，无私奉献。只有这样，延安精神才会得到继承和发扬。否则，发扬延安精神就会流于形式，成为空话，甚至出现讽刺、反差，造成更为不良的影响。

二是在一般和个别的相互关系上，我们既要重视一般号召，更要重视个别典型的发现和培养。典型，无论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一般都具有时代的特点，并代表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着形象化的教育和号召的力量。利用典型来进行教育，推动工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就是这个道理。过去，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日子里，正是因为涌现出象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王进喜、雷锋、焦裕禄这样许许多多的代表时代精神的典型，才给了人民以奋发向上，战胜困难的

信心、勇气和力量。今天，我们弘扬延安精神，进行现代化建设，仍然需要努力发现和培养许许多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典型，以使延安精神的宣传教育更形象，更典型，更具有时代气息，更乐于被广大党员和群众所接受。

三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关系上，要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坚持从我做起，自觉地为弘扬延安精神而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延安精神是时代和任务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而我们要真正使延安精神发扬光大，并蔚然成风，推向全国，固然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做出表率，但归根结底，有赖于全体人民的努力。我们每个同志都要以主人翁的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从我做起，从每一件事情上做起，努力为弘扬延安精神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样，就能极大地振奋党心和民心，调动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三）搞好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有机结合

进行延安精神的教育，不仅要注重教育内容，而且要注重教育形式。教育形式一定要适应教育内容的要求，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们在不断深化教育内容的同时，一定要探讨并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努力做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为内容服务。

首先，要深化延安精神的教育内容。过去在延安精神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表层化、静态化和单一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研究、宣传和教育的深度、广度上，还停留在感性的经验层面，缺少深层次的理论研究；还沉醉于静态的、回忆式的故事教诲上，缺少动态的、开放性的研究；还着眼于单一化的道德教育上，缺少多维的全方位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有的

人认为延安精神的教育（包括革命传统和作风的教育）是老生常谈，既没有理论，也不新鲜，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当然，这种认识不一定全面，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在教育内容上所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就必须首先深化延安精神的教育内容。为此，我们在延安精神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中，应该引导人们理论联系实际，侧重对理论和规律性问题的探讨；引导人们把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找准历史和现实的适度点与结合部，力争为现实服务；引导人们把重点研究和多方位的研究结合起来，同具有时代特点的典型教育结合起来，开掘延安精神的内涵及意义，这是恢复、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不可忽视的基本前提。

其次，要探讨并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延安精神的宣传和教育。要把延安精神的学习和教育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结合起来，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结合起来，同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同各种寓教于乐的活动结合进来。

总之，我们要通过深化延安精神的教育内容，改进延安精神的教育形式，使内容和形式有机的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扬和光大延安精神。

后　记

《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出版了。本书由吴木教授策划并审定。主编：罗忠敏、崔岩。

参加各章编写的有：

张彦玲：第1、2、3章

李　洛：第4章

罗忠敏：第5、6、7章

李淑荣：第8、9、10、11章

崔　岩：第12、14章

黄敦弘：第13章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中央党校教授王仲清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做了许多工作，给予积极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借鉴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著，吸取了其中一些成果，难以一一注明，特此郑重公开致谢。

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及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作　者

1993年4月